

目次

武夷文化研究

- 论朱熹的易学与诗学 黄 娟 (1)
风土的吟咏：竹枝词中的武夷茶
..... 叶国盛，程 曦 (5)

政治·法律研究

- 种姓制对印度民主的影响 何焱森 (9)
泉州侨力资源培育研究 张亚宏 (15)
行政诉讼撤诉中不良博弈产生的后果及克服
——以涉税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的考察
..... 吴玉婷 (21)

语言·文学研究

- 多义语境成因机理分析 刘甜甜 (29)
情态动词 must 多义性特征生成的认知心理分析
..... 连燕华 (33)
论郭松棻小说的多重书写 唐铭康 (37)
论家庭教育对身份构建的影响
——以李健孙小说《支那崽》《荣誉与责任》为例
..... 王 倩 (44)

历史·经济研究

- 后藤新平与日据初期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
..... 倪 霞 (50)
古江黄史考 陈亚琳 (56)

武夷学院学报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2109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293/G4
第 37 卷 总第 166 期
2018 年 第 8 期(月刊)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 任：吴承祯
副 主 任：刘用麟 (常务)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道明 叶琪瑛
刘用麟 刘清华
许亦善 李宝银
李远华 吴承祯
陈 铎 陈荣村
陈宗道 陈良壁
沈慧芳 杜江伟
杨 昇 张品端
张乔根 林 超
郑细鸣 郑向敏
赵升云 郭翠莲
徐颖惠 路善全
蔡明田

编辑部

- 主 编：吴承祯
副 主 编：刘用麟 (常务)
沈慧芳
责任编辑：陈 果 叶丽娜
华伟平 陈 虹
白 琳 冯起国
夏婷婷 苏娟娟
英文审译：魏景春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共享经济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 田 樱 (60)

艺术·文化研究

浅谈当代中国水彩画的本体语言和多元化
..... 李振超 (66)

范式视阈下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
..... 陈文华 (73)

福建古村落文化意象的影像建构 蔡 鹏 (78)

高等教育研究

基于教师职业生命周期理论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思考
..... 林立达, 马莉婷 (83)

基于语料库建设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策略与实践
..... 黄静雯 (89)

论朱子读书法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借鉴意义
——以《武夷文学读本》为例 王志阳 (9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总结和反思
——以武夷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教学与活动为例
..... 宋大伟 (100)

福建省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运行现状分析
..... 李 林 (104)



论朱熹的易学与诗学

黄 嫻

(闽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既是易学家的代表,也是诗家的代表。朱子以理学立论发挥了《周易》形上学思想,深化了理学易;朱子还以理学思想融入诗歌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理学诗。朱熹《易》中有诗,诗中有《易》,融合易学与诗学,宣扬《易》之理体,体现了易学本体论。

关键词:朱熹;易学;诗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01-04

宋代既是理学兴起的阶段,又是文风璀璨的时期,同时也是易学哲学史上的“高度繁荣时期”^[1]。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多名声斐然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哲学家偏重于道,文学家偏重于文。宋人在对《周易》经典的解读上,出现了理学易,同时在诗文创作上也现理学诗。南宋理学家朱熹深刻阐述了《周易》的理体思想,同时创作了宣扬《易》之理体的理学诗。本文拟通过对南宋朱熹易学与诗学的内涵及其思想关系的研究,深化对中国古代易学与诗学关系的探究。

一、朱熹的易学——理学易

宋代的理学家们对传统儒学经典进行改造,从《易》的道器观、宇宙观,《孟子》的心性观,《中庸》的天命观等挖掘原始思想资源,通过“六经注我”的诠释学方式,以形上哲学作为理学基石的理论架构。而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则被加以理学化的创释。这个时期易学则被称为理学易。于维杰先生认为:“宋明诸儒皆基于《周易》之宇宙观,以演示其性理论。”^[2]《易》的道器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周易·系辞上传》),以及《易》的宇宙发生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传》),是理学宇宙本体论哲学极为重要的思想源泉。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二程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采北宋五子各家所长。朱熹的易学著作颇丰,撰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文公易说》《著卦考误》等。其中,《太极图说解》和《通书解》是朱熹对周敦颐易学的解释。另外,《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中卷六五至卷七七收集了朱熹有关易学的言论。朱熹的思想后来成为统治中国近千年的官方儒家哲学。

朱子好《易》可从其书信中体现出来。他因病卜卦,说:“病中痊发狂疾,欲舒愤懑,一诉穹苍。既复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遁》之《家人》,为‘遁尾好遁’之占,遂亟焚稿齧舌,然胸中犹勃勃不能已也。”(《与刘德修书》)。朱熹还有《玩易斋》一诗,诗题是以《易》为名,诗云:“竹几横陈处,韦编半掩时。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玩易斋》)这也是一首五言绝句。“韦编半掩时”句用典于孔夫子晚年因好易而“韦编三绝”的成语。对于轩、斋的描写虽然是应景之作,但从中透露出《易》对朱子生活态度的影响。朱熹的题记、诗词有不少是来自《易》文典。例如朱熹的《复斋偶题》《复斋记》来自《复》卦。朱子诗云:“先生湖海姿,蒙养今自

收稿日期:2018-06-17

作者简介:黄嫻(1981-),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易学与诗学比较研究。

闕。铭坐仰先贤,点画存彖系。”(《蒙轩》)这首五言绝句是对《蒙》卦和《象传》《系辞》的联想。

朱熹把《易》的“太极”与“理”会通为一。太极作为宇宙最高的理学本体范畴,朱熹直接把《易》的“太极”解释为“理”。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13]还说:“所谓太极者,只二气五行之理,非别有物为太极也。”^[13]

朱熹强调“理一分殊”的命题,认为“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源,把物理、人理均统一为一个“理”。这个“理”就是“太极”,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太极图说解》);“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程子遗书》又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朱熹释之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理之体质也。”黄寿祺先生曰:“观此诸说,可知程、朱二子,盖皆尝以宇宙之本体为易矣。”^[14]

关于宋代其他诸家对《易》理解的差异,朱熹自有一番评论。他比较了程颐和苏轼的易学,说道:

程《易》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极处,好看。(《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谓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他(伊川)说道理决不错,只恐于文义名物也有未尽。(《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认为程颐(伊川)的易学优势在于宣说“道理极处”,其劣势在于“不说《易》文义”“只恐于文义名物也有未尽”。苏轼(东坡)的易学优势在于“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而缺点是在儒家的教理的理解上“大体最不好”。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具有偏好的评论,也可反映出文学与道学之间的差异。

二、朱熹的诗学——理学诗

宋代理学家理学诗中蕴含的《周易》性理思想,倾向于对天理道体的哲理反思。朱熹既是理学易的典型

代表,同时也是理学诗的代表。朱熹的读书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不过,在道学与文学关系的抉择上,朱熹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前者。

对于诗文的创作,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见解,抨击当时的文坛,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作,要何用?”“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作,就到极处,当自知无益。”(《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在文道关系上,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个“道”也就是理学家之“道”、宋代儒学复兴之“道”。朱熹称程颐和自己的经学是“儒者之经”,以别于文坛的“文人之经”。

朱熹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检讨说:

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怨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15]

所谓诗作要“善”是理学家为学的道德判断。从纯粹理学家的立场来看,吟诗作文对道德追求是有害的。所以,朱熹言“诗本言志”,其志不可拘泥于文,而在于道。“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句通于易道变化。朱熹的思想明显受到了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影响,周敦颐在《通书》中即言“几微故幽”“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通书·圣第四》)。

基于理学家的立场,朱熹借用诗歌说理以明志。例如朱熹在《水调歌头(联句问讯罗汉同张敬夫)》中云:

若向乾坤识易,便信行藏无间,处处总圆成。^[15]

乾、坤为《易》之门户,是万物之总。可从乾坤入手,识得万物之理。行藏无间,乃是万物与我为一,虽万物分殊而实合于一理。这个理也就是“太极”,它的

象可用圆来描画。

朱熹在《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之二中言及了理本体“太极”义,诗云: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6]

这首诗是朱熹与张栻相会的互赠诗中的一首。朱熹谦逊地表达了对张栻的钦佩,与张栻神交之后,他才领悟了“乾坤”的奥义;同时也知道了“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能化生万物的妙蕴,这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钱锺书先生曾指出:“盖宋儒论道,最重活泼泼生计,所谓乾也、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皆指此而言。春即其运行流露也。”^[7]道出了宋代理学“理”本体之宇宙衍化、大化流行的天道观的特点。

三、朱熹的“《易》中之诗”与“诗中之《易》”

(一)《易》中之诗

朱子把诗歌的创作用于对《易》哲学的理解上。作为易学家,他的任务不是一般的诗匠,更多的是以诗论道。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载有《八卦取象歌》: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8]

朱子所作的《八卦取象歌》简明扼要、朗朗上口、便于识记,流传至今,被许多易学家和《易》爱好者作为学习易典的必诵口诀。

此外,朱熹为了使初学者易于把握《易》之结构,将六十四卦的卦名编成了一首七言诗,辑入《周易本义》卷首,题目为《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咸恒遯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8]

朱熹用了“兮”“及”“与”“兼”等卦名之外的虚词,虽有衍句,读时有拼凑之感,不过能够将卦名重新排列,联成了一首七言诗。陈良运先生发现全诗“可押大致相近的脚韵”^[9]。

(二)诗中之《易》

朱子创作了不少诗歌,他的道学和诗学的主张在于是否能够体现出“理”字来,并且处处用典于《易》。《斋居感兴二十首》是朱熹最著名的哲理诗,这是朱熹理学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他完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该组诗以诗言理学,主旨是要表达其宣扬的理学思想。

朱熹在《斋居感兴二十首》中的第一首诗写道:

昆仑大无外,磅礴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皇羲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9]

元代吴师道所著的《吴礼部诗话》对朱熹的《感兴》诗篇有着深刻的探讨。《吴礼部诗话》载:“北山何先生曰:‘此篇三节,首尾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间,别无物事,一阴一阳,流行其中,实天地之功用,品汇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观象设卦,开物成务,建立人极之功。无极翁只是举濂溪之号,犹昔人目范太史为唐鉴翁尔。此篇只是以阴阳为主,后面诸章,亦我是说此者,而诸说推之太过。’蔡仲觉谓:‘此篇言无极、太极,不知指何语为说太极,况无极乎。太极固是阴阳之理,言阴阳则太极已在其中,若强摭作太极说,则一章语脉,皆贯穿不来。此等言语混糅,最说理之大病。’”^[10]以上记载的讨论出现了有关理学、易学的几个重要的关键字:“阴阳”“理”“无极”“太极”。讨论的焦点在于朱熹这首诗篇并没有出现《易》“太极”一词,那么怎么肯定朱熹这首诗一定是论道的呢?作为诗作,或许只是诗人单纯的偶发感触,并没有后人所想象那样有着多么艰深的哲理。但是,对于理学信徒来说,朱熹是处处言“理”的。

朱熹创作的诗歌,反映朱熹理学思想以及《易》性理观的诗篇是比较丰富的,例如诗句中常出现“阴阳”

“乾坤”“太极”等用语。试举一些诗例为证。

例如,《斋居感兴二十首》之二,云:

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
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6]

再例如,《斋居感兴二十首》之十一,云:

吾闻包牺氏,爰初辟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协地文。
仰观玄浑周,一息万里奔。俯察方仪静,贲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门。勤行当不息,敬守思弥敦。^[6]

此类理学诗,大谈理学与易学哲理。《斋居感兴二十首》之二的“至理谅斯存”句宣说理本体。《斋居感兴二十首》之十一诗文第一句“包牺氏”为画《易》八卦之伏羲。诗第二句之“乾”“坤”为《易经》六十四卦之门户,故而有开辟其余诸卦之玄妙。后面几句诗分别对前面几句的补充和解释。“仰观玄浑周”“俯察方仪静”则是描述伏羲氏“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画八卦的过程。贲然:柔貌。《周易·系辞下》:“夫坤,贲然示人简矣”意为:坤的特征,就是柔顺且以简约显示于人。最后两句“勤行当不息,敬守思弥敦”则又是对《乾》《坤》二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诠释。

总而言之,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士,他既是著

名的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易学家,还创作有不少的诗词。理学的兴起,使“穷理尽性”的易学之风盛行于宋代,朱子从《周易》的思想资源中建构出儒家形而上的理本体哲学,其宣扬的易学是为理学易。而理学家的诗则被称为理学诗或道学诗,朱子创作的理学诗是诗学与易学相互融合的典范之作。本文对朱熹易学与诗学思想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文、道交叉现象。

参考文献:

- [1]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
- [2] 于维杰.《周易》与宋明理学[J].福州师专学报,1999(2):18-19.
- [3] 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365.
- [4] 黄高宪.黄寿祺论中国古典文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170.
- [5] 朱熹.朱熹集[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4208-4029,435.
- [6] 朱熹诗词选注[M].杨青,等选注.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155,106-107.
- [7] 钱鍾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0.
- [8]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5.
- [9] 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11.
- [10]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589.

(责任编辑:冯起国)

Chu Hsi' Studies of Yi and Poetics

HUANG X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Neo Confucianist Yi and Neo Confucianist Poetics appeared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is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Neo Confucianism. Chu Hsi, a master of Neo Confucianism, is not only a representative of Neo Confucianist Yi, but also a representative of Neo Confucianist Poetics. Chu Hsi gave full play to his theory of metaphysics in Yi studies and deepened Neo Confucianist Yi. Chu Hsi integrated his ideas into poetry and formed a unique style of Neo Confucianist Poetics. There are poems in Chu Hsi's "Yi" and there are "Yi" in poetry. He integrated Yi-principle and poetics, and promoted the ontology of Yi studies.

Key words: Chu Hsi; Yi studies; poetics

风土的吟咏：竹枝词中的武夷茶

叶国盛^{1,2}，程曦^{1,2}

(1.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武夷学院 中国乌龙茶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竹枝词吟咏风土,是社会文化现象的真实记录,有历史学、方志学、民俗学的意义。以竹枝词中的武夷茶为考察对象,择取蒋蘅、许赓皓、周亮工、查慎行等人创作的竹枝词,分析与研究诗作记录的武夷茶进贡、种植、采制等史实。竹枝词对于研究武夷茶史具有文献价值。

关键词:竹枝词;武夷茶;北苑贡茶;茶文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05-04

竹枝词,是我国古代具有地方特色、乡土风味浓郁、情韵悠长的诗歌体裁,“志土风而详习尚”,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它常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它是“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的宝库”^[1],具有历史学、方志学、民俗学的意义。以福建竹枝词为例,涉及地方历史诸多面貌。周亮工《大清明》的“孤坟亦识岁时更,短竹齐挑八月簫。赤壤青松雪色纸,镛州独作大清明”^[2],言将乐、归化人以三月为小清明,八月为大清明之俗。黎士宏《闽酒曲》的“长枪江米接邻香,冬至先教办压房”^[3],记汀州风俗:冬至时,家家户户造酒。曾懿《闽南竹枝词》的“纸鸢掩映碧天心,稚子欢呼闹隔林。三月薰风春画静,市声高卷女儿音”^[4],酷热早至,儿童每于清明时以纸鸢为戏,使得清灵之气,以免疾病。刘家谋《泉州竹枝词》的“渠侬得似粘桥蛎”^[5],说的是泉州洛阳桥的“种蛎固基法”:在基石上养殖牡蛎,使之胶结成牢固的中流砥柱。这些竹枝词作品涉及面广,可信度高,可以与其他

文献互证,有补正史、地方志书不足之功。

基于对竹枝词价值的充分认识,竹枝词中的武夷茶值得关注。位于北纬28°左右的武夷山秀甲东南,碧水丹山,气候条件、生态环境极其适宜茶树生长,是茶树种质资源基因库。它传承于建州北苑贡茶,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产茶历史悠久。武夷茶品质优异,苏轼赞它“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乾隆喜欢它的“气味清和兼骨鲠”。武夷山是文人荟萃之地,他们创作竹枝词吟咏风土,涉及茶叶的采摘、制作、品饮,反映文人生活。风土生活和竹枝词的创作风格契合。因此,可以从中窥见武夷茶的历史。解读蒋蘅、许赓皓、周亮工、查慎行等人创作的竹枝词,从它的进贡、种植、采制等方面探究武夷茶史。

一、武夷茶的进贡

北宋时期,建安北苑制造团饼茶以供贡,宋徽宗赵佶推崇之,北苑贡茶盛极一时。《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东溪试茶录》等茶书应北苑贡茶盛名之势而出。赵汝砺《北苑别录》:“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方其春虫震蛰,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观。”^[6]吴越间,时人认为闽中无好茶,却夸尽北苑茶,然不知北苑就在闽中:“龙焙泉清

收稿日期:2018-03-29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8C062);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80513);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乌龙茶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专项(2015-75)。

作者简介:叶国盛(1987-),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古文献、三礼学、茶史研究。

气若兰,土人新样小龙团。尽夸北苑声名好,不识源流在建安。”^[4]

北苑贡茶工艺繁复,精益求精,花样丰富,成为地方官员进贡之物。时任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创造小龙团进贡,苏轼作《荔支叹》褒贬:“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5]团饼茶制作的模具花样多,形状各异,印龙纹、凤纹显其贵。茶品名字有无比寿芽、瑞云翔龙、万春银叶、宜年宝玉、长寿玉圭等。同时,模具的材质与尺寸,据《宣和北苑贡茶录》载,有竹、铜、银等材质,以银为主。制作侈丽、讲究,是贡茶制度与文化的集中表现。

元代,武夷贡茶产地从建州北苑迁至武夷山九曲溪畔,周亮工《闽茶曲》云:“御茶园里筑高台,惊蛰鸣金礼数该。那识好风生两腋,都从著力喊山来。”^[4]浙江省平章事高兴于武夷山九曲溪畔,设御茶园,制“石乳”进贡。每年惊蛰日,在喊山台上扬声同喊:“茶发芽!”通仙井水盈满,用以制茶上供。朱彝尊《御茶园歌》也有相关的描述:“五亭参差一井冽,中央台殿结构牢,每当启蛰,百夫山下喊,搥金伐鼓声喧嘈。”^[6]古时的“喊山”是地方官和贡茶监制官“以口腹媚至尊”的仪式。茶农参与其事,为的是场面造势的需要。现今,武夷山茶农为祈求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而自发举行喊山仪式,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

“元人特设御茶园,山民终岁修贡事”^[7],武夷茶充当联系中央与地方的角色,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北苑享誉朝野,而御茶园贡茶的造办,武夷与北苑并称。后则“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矣”,武夷茶之名盛矣。至明代,朱元璋废团茶,改制散茶,以致“御茶园废已多年,凤饼龙团制不传”^[8]。

二、武夷茶的种植

得益于优质的生态环境以及茶农的辛勤耕作、培育,武夷山茶树种质资源丰富,种植历史悠久。宋代朱熹《次秀野闲居十五咏》:“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根手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9]描写了武夷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徐惟起、朱彝尊的竹枝词更为细致描写地理风貌。《武夷采茶词》:“荒榛宿莽

带云锄,岩后岩前选奥区。无力种田聊蒔茗,宦家何事亦征租。山势高低地不齐,开园须择带沙泥。要知风味何方美?陷石堂前鼓子西。”^[10]奥区,深处、腹地之意。鼓子,指的是武夷山的鼓子峰,又称并莲峰。武夷茶生长与种植环境处于坑涧这样的地理风貌,其微域气候与烂石沃土滋养茶树。《御茶园歌》:“云窝竹窠擅绝品,其居大抵皆岩壑。兹园卑下乃在隙,安得奇茗生周遭。”^[6]壑,山多小石貌。《武夷茶歌》:“凡茶之产准地利,溪北地厚溪南次。平洲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赋。”^[7]九曲溪北的土壤优于溪南一带的土壤,洲地的土壤较为贫瘠。正岩地区的幽谷高崖云雾、雨水足。竹枝词言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影响茶叶品质。竹枝词中出现的云窝、竹窠、鼓子峰、溪北,是武夷茶的核心产区,出“绝品”之茶,产“风味美”的茶。至今,武夷山的竹窠肉桂,仍是岩茶上佳之品。溪北茶区的“三坑两涧”,即牛栏坑、慧苑坑、大坑口、流香涧和悟源涧产的茶,受茶客追捧。竹枝词记载的武夷茶种植区域,生动地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关系。武夷山人用自然智慧孕育“灵芽”“瑞草”,是武夷山生态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

竹枝词不仅描写武夷茶的品种,还写出了武夷茶种植兴衰之大端。首先,武夷山茶树种名目众多,从蒋叔南游武夷山时所记,可知“岩岩有茶”:

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鸟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名目诡异,统计全山,将达千种。^[11]

民国时期,林馥泉著《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调查武夷茶品种,仅慧苑一岩即达280种以上。竹枝词中亦有相关记载,许赓皓《武夷茶歌》:“梅花香里逢开土,雪满空山餽木瓜。困炉石铫斗清新,肉桂红梅品最真。欲识人间辟支果,更教一饮不知春。”^[8]可知武夷茶品种的有木瓜、肉桂、红梅、不知春等。蒋蘅《武夷茶歌》:“奇种天然真味存,木瓜微醪桂微辛。”^[8]指出

奇种、木瓜和肉桂的香气及滋味特征,并写到它们的产地和状貌:“名种之奇者,红梅、素心兰及木瓜、肉桂。红梅近已枯,素心兰在天游,其真者予未得。肉桂在慧苑岩。木瓜植弥陀大殿前,其本甚古,枝干卷屈,类数百年物。”^[6]“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7]记的是宋树、雀舌这样的茶树名。这些是武夷茶品种的历史印记,是武夷茶品种丰富的表现。但这些资料需辩证看待。茶叶命名方式多,依据了树形、叶形、色香味之特征等,名字纷杂。蒋叔南说的“半天摇”,也有“半天鹞”“半天妖”“半天夭”“半天腰”的别称。这些花名或名目,或是文人僧道的即兴之作,或是商人的巧立名目。而且,茶名与相对应的品种有些是杂乱的。武夷山茶树育种专家罗盛财老师直言清代、民国年间关于名丛的记录,是“故纸堆”。而今茶叶科学家开始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整理与认定、保护与推广。

竹枝词还记录了武夷茶种植衰落的历史。明嘉靖年间,官府催贡太紧,茶农不堪负重。“崇安仙令递常供,鸭母船开朱映红。急急符催难挂壁,无聊斫尽大王峰。”^[8]崇安县令催令尽快生产茶叶。武夷山的道士不堪其催逼,砍尽所种的茶树。当时,起初道士因茶获利,砍尽了影响茶树生长的松树,遍地种茶。今为茶所累,又铲除了茶树,故有这样的历史情景:“一曲休教松栝长,悬崖侧岭展旗枪。茗柯妙理全为崇,十二真人坐大荒”,“桥门石录未消磨,碧竖谁教尽荷戈”。^[9]碧竖,制茶人之意。茶树被砍,造成“景泰年间茶久荒”的衰败景象。到了清代,“不团小凤不团龙,细色如今免上供。见说田家愁水旱,好充茶户莫为农”^[10],贡茶的角色式微。

三、武夷茶的采制

武夷茶采摘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如高崖、坑涧,路途遥远坎坷,采茶难度大。朱熹《云谷二十六咏》之一的《茶坂》:“携簏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跣趺谢衾枕。”^[11]朱子写到了采茶的地理环境,更关注饮茶的滋味,弱化采茶的艰辛,诗情直抒深夜啜茶的悠然。与此关注点不同的有查慎行与徐惟起的竹枝词。查慎行探访武夷山竹窠茶区,描述山人采茶、制茶的情景,作《武夷采茶词》:

荔支花落别南乡,龙眼花开过建阳。行近澜沧东渡口,满山晴日焙茶香。

时节初过谷雨天,家家小灶起新烟。山中一月闲人少,不种沙田种石田。

绝品从来不在多,阴崖毕竟胜阳坡。黄冠问我重来意,拄杖寻僧到竹窠。

手摘都篮漫自夸,曾蒙八饼赐天家。酒狂去后诗名在,留与山人唱采茶。^[12]

查慎行好游历,常以诗为事。1715年,他重游福建闽北作《武夷精舍》《崇安梅谷山明府貽武夷山志》《朝发小浆村暮抵紫溪途中口号四首》《建溪棹歌词十二章》《武夷采茶词》等诗作,关心民众生活。查慎行的采茶词概括性地讲述了武夷茶的采制。“澜沧东渡口”的“澜沧”亦名兰汤渡,位于武夷山一曲三姑石下。龙眼开花时,谷雨时节正是采制武夷茶的时间,家家开焙茶叶。

徐惟起的《武夷采茶词》也细致地描述武夷茶的采制与烹饮。“万壑轻雷乍发声,山中风景近清明。筠笼竹筩相携去,乱采云芽趁雨晴。竹火风炉煮石铛,瓦瓶磈碗注寒浆。啜来习习凉风起,不数蒙山顾渚香。”^[13]清明前后,正是茶季忙碌时节,趁着晴天采茶。而所制之茶不亚于蒙山茶与顾渚茶。

竹枝词对采制过程的写作,凝练简洁,如李卷《茶洞作武夷茶歌》:“荡涤灶釜取冰洁,旋摘柔条爨火烈。轻揉急扇火候宜,香比兰芬色似雪。”^[14]武夷茶入锅炒青,控制火候,不令焦,色香俱佳。再如阮旻锡的《武夷茶歌》:

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

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

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15]

武夷茶采摘,以晴天最佳。当今的武夷岩茶制作仍有“看天做青,看青做青”之口诀。晒青工艺,需要适当的日光。若遇到阴雨天气,直接影响成茶的品质,色

香味减弱。“武夷焙法,实甲天下”^[15],竹枝词“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是它精妙的表现。

竹枝词未见武夷茶制作过程完整的描述,也无法如近现代茶叶科学的规范表达,这与古人认知水平以及竹枝词表达风格有关。总体来说,武夷茶采制的时间,制作中如炒青,特别是焙火的微妙之处,都呈现在竹枝词中。

古代文人饮茶,其文学作品赞美茶之色香,抒发饮茶的感受,著名者有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和袁枚《试茶》等。明清以后,产茶区扩大,饮茶风俗更为普及,文人笔下茶的形象愈加饱满,更多地从饮茶阶段回溯到采制的细节,这符合竹枝词吟咏风土的范畴。

关于武夷茶的文献资料,陆廷灿《续茶经》、董天工《武夷山志》有部分资料可资,其它如文人笔记、诗词文作品,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竹枝词展现了武夷茶进贡、种植、采制等历史风貌,是对武夷茶史呈现。竹枝词具有这类体裁真实感、弥漫风土气息的特色,对于研究武夷茶史具有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竹枝词”的文化意义[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9(2):6-7.

[2] 雷梦水. 中华竹枝词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2291,2297,2308,2310.

[3] 赵汝砺.北苑别录[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 周亮工.闽小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6-67.

[5] 钱时霖.历代茶诗集成(宋金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496.

[6] 朱彝尊.曝书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八).

[7] 刘枫.历代茶诗选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79-180.

[8] 潘超.中华竹枝词全编(5)[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69-170.

[9] 吴之振.宋诗钞[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十).

[10] 徐惟起.鳌峰集[M].明天启刻本(卷二十五).

[11] 蒋叔南.蒋叔南集[M].卢礼阳,编校.合肥:黄山书社,2009:80-81.

[12]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十四).

[13] 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

[14] 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60.

[15] 梁章钜.归田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145.

(责任编辑:冯起国)

The Wuyi Tea in Zhuzhici

YE Guosheng^{1,2}, CHENG Xi^{1,2}

(1.School of Food and Tea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ese Oolong Tea Industry,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Zhuzhici which portray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are real record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y are meaningful to history, local record and folklore studi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oetries written by Jiang Heng, Xu Genghao, Zhou Lianggong, Zha Shenxing, etc., analysed the history of Wuyi tea as a kind of tribute, and its planting, picking and processing history in these poetries. Zhuzhici have some literature value to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Wuyi tea.

Key words: Zhuzhici; Wuyi tea; tribute tea of Bei Yuan; tea literature

种姓制对印度民主的影响

何垚森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当今学界在研究印度民主问题时,依然绕不开印度的种姓制度。这是因为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受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的经济和民主政治产生了独特的发展模式。结构失衡且增速缓慢的印度经济以及印度民主政治中出现的政治种姓化倾向都与种姓制密不可分。而种姓制之所以在现代印度依然拥有着如此的影响力,与印度未经革命的建国历程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传统性;种姓制;民主发展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09-06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度独特的民主模式一直被世界所关注。许多人在观察印度民主时都会觉得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印度社会是个语言、族群和宗教极为多元的社会,这种多元性势必导致社会内部会持续存在一种较为激烈的族际间的对立形势,并为国家的分裂埋下伏笔。阿伦·利普哈特曾在他的著述中有如下论述:“社会同质和政治共识是稳态民主的前提,或是稳态民主重要的推动力。反之,多元社会中深刻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差异,则会带来民主政权的动荡和崩溃。”^[1]因而,在印度独立之初就有许多学者预言印度的国家统一性将不会持久,其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性将最终导致印度的分裂。^[2]

尽管印度的统一性自独立以来便一直为人们所怀疑,但是在这种多元的环境下印度及其政治制度却

一直运行良好,这是令人惊讶和不解的一点。本文便是抱着这些疑问来对印度建国初期前后的一些社会变动进行观察并结合其对印度产生的一些现实影响来简单探究印度的政治制度以及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印度的政治发展。

一、种姓制下的印度

在传统的印度社会,种姓制度是维系整个印度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宗教的影响力,印度的统治阶层将各种姓按照宗教层级、职业等进行归类划分,这种建立在宗教体系下的社会结构为印度文明的延续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

但是在民主思想的潮流席卷世界之后,这种以阶级统治思想为基础构成的国家-社会结构便与时代特征发生了冲突。随着印度殖民史的开端,印度的种姓体制开始出现裂痕,在印度被西方国家殖民的时期,殖民当局也多是通过与本地高等种姓的合作,并以维持种姓制度的稳定为前提来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但是

收稿日期:2018-04-28

作者简介:何垚森(1993-),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随着印度独立运动的兴起,低种姓运动伴随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逐渐壮大。

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中,种姓制度是一个垂直的,用洁与不洁的宗教价值来区分的阶序系统。^[3]在这个系统中,不少低种姓群体属于印度教教义中的不洁群体,生来就属于不可接触的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以外。但是在印度教主导的时代,低种姓阶层并没有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种姓对集体身份的认同。但在殖民时代到来后,以个人主义为根本的价值体系的输入对印度教影响下的种姓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伴随着19到20世纪的独立运动,种姓制度在近代印度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上半叶,种姓运动在安倍德卡尔领导的解放印度贱民的活动中达到高潮。安倍德卡尔受到了为数众多的低种姓群体的拥护。当时,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也在尽力争取低等种姓的支持,但是甘地关于贱民阶级问题的思路是运用宗教的力量来进行改造,他从印度教内部改革的立场出发,赋予贱民“神之子”的称呼,并希望通过宗教自我进化的方式来解放贱民。在甘地的思路中,他反对贱民制度,但是却不反对种姓制度。因为甘地认为种姓制度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存在证明其社会分工的属性能确保社会的稳定。这种对待贱民问题的观点与安倍德迦尔的观点相冲突,因为安倍德迦尔的观点是从现代国家与公民所具备的特点出发,反对种姓制度,主张贱民也拥有单独的选举权,并能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4]

在此期间,甘地和安倍德卡尔虽在有关贱民问题的思想上有所冲突,但是为了印度的独立事业双方选择了合作。之后,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政治层面开始瓦解。在印度建国之后,安倍德卡尔主持制定了印度的新宪法,新的宪法否定了印度的种姓制度,明文规定不再实行种姓制度,并明确将选举权扩大到全印度人,将在印度传统中的低种姓人群也纳入到选举政治中来,这种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在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英国也仅仅给予印度不到10%的人以选举权,其划分标准是识字及有一定财产。这种划分标准下便造

成了其所谓的选举只是拥有财产和高水平教育的高种姓阶层的特权,所以在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代表英国殖民当局统治印度的仍是印度的高种姓阶层。而新的宪法的颁布,意味着那些在传统印度社会中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广大普通民众也有权参与到政治中来,这也标志着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其政治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从印度建国后的历史来看,虽然种姓体制在宪法中被废除,印度的种姓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种姓制度虽在法律意义上被终结了,但是基于传统种姓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却在实质上控制着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如印度的婆罗门种姓,在传统印度掌管印度教的祭祀事务,该种姓位于印度传统社会的最高层,而在建国之后,印度的政治权力依然被这个群体所牢牢把控。究其缘由,这与婆罗门种姓垄断印度文字和知识传播所导致的该种姓阶层与其他种姓而言极高的受教育水平有一定关系。

这种特征在其他种姓中也得到体现,商业种姓凭借其原始资本上的积累垄断了独立后印度的资本市场,广大低种姓群体由于缺少各种资源而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的低种姓群体仍然住在落后的农村和混乱的城市贫民窟。虽然印度政府在建国初期为了照顾低种姓势力而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如政府职位预留政策。该政策是印度政府推行世俗主义政策中的一部分,通过在大学招生、政府岗位招聘上特意为低种姓群体保留一部分席位来提高低种姓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5]但是,从之后的政策效果上来看,该政策对国大党世俗主义政策的推行并没有起到多少推动作用,保留制逐渐变成民选政府为了保证稳定选票的获得而采取的拉拢性策略。就保留制本身而言,其实际的效果也仅仅是为低种姓群体中的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群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并且这些工作也多是政府中低层级的且没有多少话语权的职位,对于整个低种姓群体的发展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

于是,在这样一个依然被传统种姓体制所支配的

社会,其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定会遇到许多来自社会层面的问题,旧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利益格局对一个试图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形成了阻碍。受此影响,印度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为人所诟病的一个方面。

二、种姓制约下的印度经济

一个世俗的、民主稳定的社会最离不开的恰恰是完善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来进行支撑,这一点在印度却难以体现,独立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被人们所诟病,有人形容印度的发展模式是1%模式,几十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平均之后几乎是按照每年1%的速度进行增长的,这与其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印度独立之初,其人均生活水平与韩国和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但是在之后的发展中,印度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被逐渐拉大,甚至还不如许多东南亚国家。有限的经济发展则必然使印度无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来培养一批富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

印度建国初期的经济策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印度的农业体系却十分落后,在没有较为完善的农业体系的支撑下,印度的经济在尼赫鲁政府时期一度遭到重挫。印度政府并非没有进行过农业体系的发展,但受限于土地改革政策在印度地方被大地主势力抵制,因而印度始终无法将农业生产力进行释放。土地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尼赫鲁时期软弱、保守的政府,尼赫鲁虽然在全国统帅着国大党,但是印度地方的政治权力却被地方精英所牢牢把持。在一些触犯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事情上,中央政府往往不得不向地方势力低头,因为这关乎到国大党是否能获取足够的选票来维持其国内统治的优势地位。

另外,印度的工业体系也极不健全。一个例子是印度法律规定企业不能解雇雇员,这就造成了企业都尽量少雇佣正式员工,在印度4.7亿的劳动力大军中,只有3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其中有相当大

的比例是政府雇员。^[2]这种劳动力比例使得印度有大量的空余劳动力无处安置,只能呆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在这种体系下,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会倾向于扩大就业岗位,而是集中发展优势产业,印度的IT产业占据了印度产值的一半,但是其雇员却仅占据劳动力总数的0.25%。在这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下,印度农村地区的经济得不到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因此只能停滞不前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也就进一步造成了印度经济的整体失衡。

总的来看,印度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上而言,阻碍印度发展的是滞后且充满保守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多元且权力分散的民主体制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种姓传统所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所决定的。这也就导致了印度无法通过快速的经济的发展来促使印度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进而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居多的现代社会。而且缓慢的经济的发展也无法给予印度充足的资源来构建国家向心力,现代国家的一大重要特征便是国家将原来从属于地方宗族的一些职能转移到了国家机器的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对国家的依赖逐渐增加,公民归属感逐渐增强,地方社群的向心力开始逐渐瓦解,于是社会便向着国家化的、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印度,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其国家的构建便十分缓慢,国家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职能,多数情况下人们还必须依靠地方社群才能维持其生存所需。这就使得印度传统的社会模式依然得以继续留存。于是,在一个传统性缓慢转向现代性的国家中,一种特殊的民主现象便产生了。

三、印度民主政治的种姓化

上世纪80年代起,印度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印度国大党一党体制遭受冲击到索尼娅甘地的威权统治,最终印度的政治局势随着印度国大党一党体制的崩溃而进入了多党竞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印度的选举政治开始出现强烈倾向的种姓政治色彩,即民众投票选举所依照的主要因素不是一个政党或候选人的执政理念,而是根据该政党所推出的候选人的种姓身份以及该政党代表的是哪些种姓的利益。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大量的占人口多数的低种姓群体和政党在选举中脱颖而出,政党之间的较量慢慢变为了种姓集团之间的较量。如在印度的北方邦便出现了具有鲜明种姓利益倾向的政党差别,有代表低种姓利益的民众社会党、代表中等种姓的社会主义党以及代表高等种姓的印度人民党。

受此影响,印度的选举不仅出现了种姓化倾向,还出现了种族化倾向。因为印度还有为数众多的穆斯林群体以及其他非印度教群体。在印度政治种姓化趋势的影响下,这些原本便与主流印度族群有文化和宗教差异的族群便更加强了其选举投票中的基于族群身份认同的投票倾向。于是这种基于身份认同而进行的政治选举便构成了近些年印度政治的基本态势。

可以论断,印度种姓政治崛起的一个因素在于印度大量贫困的低种姓群体,在无法求助于一个完善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那么人们便只能通过种姓的团结、运用选举的方式来操控政治、获取政府政策以及资源的倾斜,从政府体制中获取利益。因为在印度,政府可以运用合法的政治权力来汲取社会资源,通过选举上台便意味着能从这个体制内运用政府的能力获取大量的社会资源。因此在地方上,种姓群体间围绕选举而进行的竞争十分激烈,一些候选人甚至通过引起种姓对立的手段来强化种姓意识,以此来获得种姓群体的支持。

因此,基于种姓制度的传统性对印度发展的影响可谓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建国后糟糕的经济发展政策导致了印度没有快速地摆脱传统的影响进而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还有一方面则是由于印度特殊的建国历程导致了印度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的同时也建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民主国家。

四、种姓制何以留存

印度独立运动自19世纪中叶便已经开始,早期独立运动多是伴随着零星的暴力冲突来开展,这个时期印度的独立力量还较弱,英国殖民当局还能对印度实行有效统治。但到了20世纪初期,印度独立运动的形势发生了转变,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独立运动在印度成燎原之势。甘地结合印度宗教思想和印度民族主义成功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运动在印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印度的各民族主义团体并使之为了民族独立而奋斗。在甘地去世之后,国大党继续沿着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前进,最终迫使英国殖民者在1947年退出印度,在经历了三年的过渡期后,印度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

论及印度的独立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其他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过程有很大的区别,一是运用非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达成独立的目的,整个过程中并未与殖民当局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二是在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直接在印度确立了民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局势并没有产生大的动荡。三是一个以世俗化为导向的国家却在拥有广泛宗教影响背景下建立。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印度独立道路。

我们认为,印度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拥有自身独特的民主特性,与其在建国时候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和对内的武装革命有一定的关系。印度的独立一方面与甘地主义凝聚起来的印度民众以及印度各地区高种姓形成的联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英国殖民当局已经无力对印度施加太大的政治以及军事压力有关。这种态势下的印度独立运动,其组织力、社会动员力以及受此影响的社会整合程度也较为有限。对比历史上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出差别,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之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崩离析,因而新建立的国家得以运用国家机器迅速地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而反观印度则在独立之

后依然深陷传统性的泥沼之中。

独立后的印度更像一个各地区高等种姓的大联盟,在一个温和的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地区的冲突被划定在限定的范围之内,利益格局的变化便以此而放缓。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得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利益格局也并未发生大的变迁,各种姓依然处在自己原有的社会层级,此后印度的发展策略也证明其更倾向于以社会精英来带动社会发展的模式。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进步缓慢,并且只能利用民主制度的规则并通过抱团投票的方式来改变命运。

另外,虽然尼赫鲁奉行的是世俗主义,但是,最终在印度的社会进程中却体现着宗教对社会强大的控制力。因为尼赫鲁政府一方面在推行其笃信的世俗主义,另一方面却对宗教团体持以宽容的态度,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各宗教团体保留自身宗教法律的权力并且其温和的政策推行方式使得政府对改变传统习俗无能为力。这种政府温和的行为方式或许是印度民主得以建立并持续运行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被保留的差异性也成为日后印度各族群和宗派间冲突的根源。

因此,在一个未经历大规模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社会里,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没有受到剧烈冲击,所以其文化是偏保守的、变化缓慢的,其传统性是存续的,体现在印度便是传统的种姓制度以及受这套制度影响的文化以及社会模式在实质上的延续。受这些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行政官僚体制以及选举政治体制在印度便演变成为了各大高阶种姓的分肥体制以及为拉拢人口规模庞大的低级种姓的政府职位保留体制。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印度低质量的现代化教育普及程度也使得种姓制度能够保持生命力。亨廷顿曾引用勒纳的观点:持现代观念的人,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换性人格”。这些变化要求人们把自己对具体和与己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社的忠诚及认同扩展成为对更大和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6]这句话在印度的体现便是印度人民对印度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不足,相比较而言印度人民更认同自

己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地方社群。这种情况下,基于身份集体所构建的种姓制依然具有生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印度民主发展的历程引人深思,在这个国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传统所束缚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并没有让印度社会和人们得以挣脱旧习俗的枷锁并获得个人的自由,反而在传统的强大阻力下,印度民主成为了一种有着深刻地方特色的投票民主模式。

总体而言,印度民主政治的特点突出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一心谋求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印度却被诸多传统遗留问题所困扰。其中,种姓制度和印度教对印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因为它们虽经变革但都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如今种姓制度的特征虽与印度建国前的模式大不相同了,但是其阶级分层的核心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印度人,这体现为印度低种姓阶级的“梵化”倾向。而印度教的影响也在近年印度的政治局势上得以体现,以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为核心的印度人民党依靠宗教将分散对立的种姓在印度教这一框架内进行了整合,这也影响着印度今后的发展。另外,随着印度经济发展,其中产阶级将进一步扩大,印度的民主也将发生新的改变。

参考文献:

- [1] 阿伦·利普哈特.多元社会中的民主[M].刘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
- [2] 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M].张淑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76,33.
- [3] 吴晓黎.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7.
- [4] 周骅.宗教净化与公民权利:甘地和安倍德卡尔贱民立场比较[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4):95-100.
- [5] 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64.
- [6] 塞繆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

(责任编辑:陈虹)

The Influence of the Caste System on Indian Democracy

HE Yaos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When studying democracy in India, the academic circle still cannot get around 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 This is because the caste system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in Indian society. Influenced by the caste system, India's economy and democracy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development model. The unbalanced and slow-growing Indian economy and the tendency of political castefication in Indian democrac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aste system. The reason why caste system still has such an influence in modern India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India's unrevolutionary founding process.

Key words: traditional; the caste system; democratic development

泉州侨力资源培育研究

张亚宏

(泉州师范学院 图书馆,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泉州是著名的侨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丰富的侨力。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海外华侨不仅热衷家乡公益事业,对家乡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在新的形势下,泉州以先行先试为导向,通过政府、民间等多种渠道,积极探索培育侨力资源之路。培育泉州侨力资源,关键在于增进文化认同,拓展沟通交流渠道和打造经济文化合作区域。

关键词:泉州;侨力资源;闽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15-06

侨力资源是一种集人力(劳动力、智力)、资金、文化、科技、信息及网络等资源于一体的资源系统。^[1]侨力资源是一种独特的重要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如今,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华侨华人的身影。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脚步,泉州经济开始发展,率先打开局面的是侨力资源的进入和利用,拥有丰富侨力资源的乡镇,成为“先富起来”的典型。晋江、石狮、南安等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是得益于当地充裕的侨力资源。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以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作为与居住国连接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海外华侨华人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历史上曾经发挥重要作用。海外泉籍华侨在民族独立、祖国建设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打好侨牌,挖掘和培育泉州侨力资源,对促进海外统战工作的开展,落实“一带

一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泉州海外华侨华人情况

泉州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是著名的侨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泉州侨办统计,泉州海外华侨 948 万人,约占全国华侨总数的 15%、福建省的 60%。其中 90% 主要侨居东南亚等海丝沿途国家。^[2]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拥有泉籍华人超过 100 万;世界闽商 100 强中,泉州籍约占 2/3。^[3]在泉州,归侨、侨眷人口约 254 万,全市 150 多个乡(镇)中,重点侨乡占 75%(见表 1)。

一直以来,泉州华侨华人以闽南人特有的敢于冒险、爱拼敢赢、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居住国闯出一片天地。他们创办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政坛精英、经济人才、学术专家。比如,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著名实业家、银行家李光前,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菲律宾“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陈永栽,2013 年《福布斯》富豪榜印尼排名第二位的黄奕聪及其家族,马来西亚最年长 CEO 李深静,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高武图,艺术家蔡国强,等等。

当前,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倡议,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构建发展海洋经济蓝图,得到大

收稿日期:2017-12-22

基金项目:泉州市社会规划项目(2017D34)。

作者简介:张亚宏(1975-),女,汉族,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研究。

表 1 海外泉籍华侨华人祖籍地与居住国分布情况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Quanzhou and the country of residence

	晋江	永春	安溪	惠安	石狮	鲤城	泉港	洛江	丰泽	德化
人数/万人	112.90	107.33	93.11	75.05	29.26	26.31	22.67	16.14	15.93	13.22
所占比例/%	15.03	14.29	12.40	10.00	3.90	3.50	3.02	2.15	2.12	1.76
主要居住国	菲律宾	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尼	菲律宾	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注:资料来源于泉州外事侨务办。

多数国家的支持,但也受到一些国家的排挤。因此,挖掘培育侨力资源,发挥海外华侨在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一份力。

二、海外华侨华人对泉州社会经济贡献

泉州海外华侨在祖国独立、民族解放战争和经济发展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继续造福桑梓,积极捐建学校、医院、祠堂,回乡投资办厂,为泉州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海外泉籍华侨捐资兴办家乡公益事业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明代后期,到 19 世纪后期捐赠逐渐增多。据统计,1978 年至 2016 年,海外泉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赠兴办公益事业总额高达 113 亿元。从 2012 年开始,海外泉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每年捐赠总金额高达 5 亿元,这些捐款主要用于文化和社会事业,帮助家乡兴办学校、奖励莘莘学子、修桥铺路、扶危济贫。其中,侨捐大户主要是晋江、南安两市(见表 2)。此外,南安市还是全国唯一侨捐连续 23 年超亿元的县级市。

表 2 海外泉籍华人捐资兴办家乡公益事业情况

Tab.2 Chinese ethnic group in Quanzhou donated money to start their own public welfare business

年份	总额/亿元	文化教育	社会事业	侨捐超 1 亿元以上县市区
2012	5.0	2.88	1.41	晋江、南安
2013	5.0	2.5	1.29	南安
2014	5.24	3.64	0.86	南安
2015	4.66	2.32	1.46	晋江、南安
2016	5.02	2.2	1.64	晋江、南安
改革开放至今			113	

注:资料来源于泉州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侨乡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侨资的注入。改革开放以后,泉州更是依托侨乡资金、市场、人脉和资源优势,兴办一批批民营企业。据统计,1978-2016 年,泉州累计批准设立侨(外)资企业达 13201 家,开业投产数 9102 个,总投资额 599.8304 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 364.6775 亿美元,外商实际到资额 263.8674 亿美元;2014-2016 年,外商实际到位资金总体呈高位稳定增长(如表 3)。有稳定的侨资加盟,泉州经济发展优势充分显现,涌现出一批泉州龙头侨资企业,如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恒安集团、福建泰克通信有限公司、鸿星尔克有限公司、南益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等,助力泉州 GDP 的增长。2016 年,泉州市生产总值(GDP)达 6646.6 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 1541 亿元,经济总量连续 18 年来位居福建省第一,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典范地区之一。

表 3 泉州利用外资情况表

Tab.3 Statement on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Quanzhou

年份	批准企业数/个	投资总额/亿美元	合同外资/亿美元	总产值/亿元	开业投产数/个	外商实际到资额/亿美元
2014	126	33.7507	15.4609	3556.9233	41	14.8950
2015	102	20.6195	9.9498	3934.6394	29	15.8036
2016	124	23.4824	13.5553	3939.6070	12	16.2780
1978-2016 累计	13201	599.8304	364.6775	36659.5103	9102	263.8674

注:资料来源于泉州外事侨务办。

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一直是泉州进出口主力军。在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海外华侨华人一直充当“领路人”。近年来,泉州进出口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主要出口市场为东盟、欧盟和美国。其中,

泉州对东盟的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见表4),这与东盟国家拥有大量泉籍华人有很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菲律宾关系改善后,拥有泉籍华人优势的菲律宾,贸易迅速升温。仅2016年,菲律宾一跃成为泉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地区)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泉州与菲律宾进出口值达125.3亿元,较前一年增长35.8%。

三、泉州培育侨力资源实践

泉州拥有丰富的侨务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泉州重视打好“侨牌”,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做好海外统战工作。

(一)积极做好“寻根之旅”工作

国侨办副主任赵阳说:“‘寻根’活动是弘扬中华

表4 近3年来泉州市进出口主要国别(地区)情况表

(单位:亿美元)

Tab.4 The ma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Quanzhou's import and export in recent 3 years(unit: billions of dollars)

国家和地区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港澳台	22.4132	8.4428	22.1479	4.6374	20.4349	3.5465
亚洲						
东盟	26.8139	7.0293	32.5759	4.4583	38.7798	3.9858
日韩	7.2201	3.6685	6.6156	2.7739	8.0898	2.2184
其他	26.3846	76.6818	29.0125	47.3649	24.7687	38.9702
欧盟	37.3137	5.5881	32.0465	4.4089	30.2618	4.6262
俄罗斯	3.2290	0.8554	2.0868	0.4499	2.0439	1.9671
美国	23.3713	6.2813	24.6697	6.6727	22.8356	4.7799
非洲	14.6048	12.8140	14.0577	10.6159	10.6419	12.2015
合计	181.8067	126.7545	182.9320	88.1124	162.4565	77.9359

注:资料来源于泉州统计局。

文化、涵养海外侨力资源的最佳形式,也将收到最好效果。”^[4]东南亚泉籍华侨有着强烈的故乡意识,他们始终保持着闽南古朴的生活习俗和传统理念,不管身居何处,心一直向往家乡,这样的想法代代传承下来。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原因,加上老一辈留下故乡的信息不全,给他们寻找家乡留下巨大的困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通过民间询问方式,委托回家乡探亲的邻居、朋友打听自己的老家,这种“寻根”方式难度可想而知。近年来,泉州市侨办协调各个相关部门,认真抓好“寻根之旅”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一些华侨寻找到自己的“根”。

首先,侨联牵线搭桥,助力侨胞寻亲。如德化县侨联,仅仅依据一个人名,帮助马来西亚侨胞林道成找到失散百年的亲人,仅凭一个地名,帮助马来西亚章氏侨亲寻找到亲人;南安市侨联,借助一本族谱,圆了马来西亚侨胞林忝成的百年寻根梦,仅靠一个名字,

帮助马来西亚侨胞苏立言找到家乡,通过各种形式,帮助等了85年的马来西亚侨胞许建福三代人圆了回乡梦;安溪县侨联,帮助马来西亚“侨三代”建筑师黄剑威一家寻到了“根”。据统计,仅2014年,泉州接待来访侨亲团达1100多批6500多人次,举办“泉籍精英故乡行”活动10多批200多人次。

其次,建构寻根数据库。如2016年,石狮彭田村开展“寻根小平台”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接着,晋江、石狮等15个重点侨村推广寻根数据库建设,极大方便海外华侨寻根谒祖。

第三,做好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华裔新生代是未来海外侨力资源支柱。为了让更多华裔新生代亲历闽南环境,感受家乡变化,触摸实实在在的“根”。从1986年开始,泉州30年来不间断组织开展海外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活动,对办营目的、课程安排、活动内容、管理跟踪等逐步规范完善,让活动更具针对性。其

中,组织接待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夏令营人数最多,从2001年开始,连续17届,参与人数累计超1.3万。

(二)积极开拓海外统战工作的新途径

2011年,为加强海外泉籍华裔青少年联谊工作,泉州市成立首个海外华文教育基金,基金用于发展泉州海外华文教育事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和家乡的感情。同时成立华文教育中心,选派华文教师赴外支教工作,至2016年,泉州已经先后选派14批189名华文教师赴外任教。这些工作对传递中华文化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东南亚地区是海外泉籍华人社团最集中的地方。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强盛,海外泉籍社团活动空前活跃。据泉州侨办统计,从1574年,泉州人在泰国北大年建立第一家泉籍同乡团体——清水祖师庙开始,至今与泉州侨联建立联系的港澳台侨社团达10000多个,分布在近50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社团架起祖国与当地国、世界联系的桥梁,维系着华侨对泉州的祖籍认同。泉州侨办加紧与各地华侨社团联系,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泉州各级侨办、侨联先后组团200多个(次)赴港澳台和海外参加同乡会、社团庆典活动,开展统战工作。首先,积极促成华侨青年团的设立,加大力度鼓励和吸纳青年侨裔加入,避免社团成员“老龄化”带来的联系断层。其次,通过社团开展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比如,2017年8月13日,泉州市侨联与马来西亚华社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等在吉隆坡举办“根脉寻踪——泉州百个家族移民马来西亚族谱展”,让更多华裔青年了解自己家族历史。第三,搭建服务平台,组织侨亲组团返乡活动。近年来,泉州与海外社团不断深入交流合作,通过打造恳亲大会、青年联谊会、泉籍精英故乡行等系列活动品牌,吸引海外侨亲,特别是青年华裔参与到活动中来。比如,2017年5月,组织泉籍马来西亚艺术家朵拉回乡办画展。

(三)促进民间交流

民间交流是政府对外交流的重要有机补充,它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泉州与海外侨胞之间的民间交流从未中断过。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的南音,一直以来是海内外民间交流的纽带。东南亚

各国华侨华人聚居地,纷纷成立华侨南音社团,他们一方面聘请家乡南音艺师传授技艺,另一方面积极与家乡南音社团切磋交流。如晋江的高铭网、吴萍水、高文伟、丁信昆等人,相继应邀到菲律宾、印尼授课;菲律宾长和郎君社、金兰郎君社、国风郎君社、南乐崇德社以及新加坡传统南音社、湘灵音乐社等先后参加了泉州市政府组织举办的多届国际南音大会唱。^[5]中医在东南来一带倍受推崇,泉州与海外中医文化交流非常火热。据统计,仅晋江中医院,在2013年春节的一二十天里,就接待菲律宾等海外侨胞达324人,问诊768次。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海外侨胞,泉州侨办与海外社团联合组织泉州名中医到海外义诊。比如,2013年9月29日到10月4日,晋江中医院在菲律宾义诊4天,共接诊侨胞500余人次。改革开放以后,泉州许多民间信仰活动在海外华侨的助推下,纷纷恢复了原有的状态。据泉州泉州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统计,截止2017年8月1日,泉州依法登记宗教活动场所888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6088处(建筑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大都由海外华侨捐款兴建。而东南亚华侨聚居地,也建有相应的民间信仰庙宇,海内外民众经常在传统节日里举办一些庆典活动。

(四)完善信息平台,举办各种活动

2012年,泉州市侨办试点建设侨捐项目信息资料库,记录保存华侨捐赠公益事业的情况。如今,信息资料库已经搜集整理历年侨捐资料1.2092万份。这些信息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利于赢得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和认同,促进统战工作的开展。

2016年11月24日,泉州利用华侨历史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庆典之际,举办“故土情深——泉籍华侨华人奉献史”专题展,其中,展出的实物3百多件,图片4百多幅,真实再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泉籍华侨奉献祖国的史实,在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华裔新生代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和震撼。

2017年,泉州举办第十五届“6·18”华侨华人项目成果专场,吸引海内外企业人士600多人参与,签约35个项目,总投资11.02亿元。

2015年,中国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泉州籍陈永栽、王秀德以及石狮籍蔡国伟、许景期

等 24 位侨领、侨界精英受邀参加北京阅兵观礼,这对华裔青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榜样。

(五)关注关心海内外华侨生活

泉州一向关注关心归侨的生活状况。一直以来,泉州侨办多次深入侨乡居住地进行调研,对贫困归侨实施“精准扶贫”,通过加强实用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岗位或项目、给予适当资金支持等方法,让他们走出困境。据统计,从 2011—2016 年,泉州市侨办累计向市财政申请 240 万元用于扶贫,帮助 1000 多位归侨度过难关。2010 年,泉州市还在全省率先启动侨居工程,经过 4 年多的努力,解决 191 户散居贫困归侨的住房问题,圆了他们的安居梦。2016 年底,侨办牵头设立“侨爱扶贫基金”,发动热心公益事业的侨商和侨胞踊跃捐赠,如今已募集资金超过 150 万元。其中,陈祖昌先生一下子就捐资 50 万元。^[9]

同时,泉州还密切关注海外泉籍华侨的动态,支持和关心泉籍华侨的生活状况。比如,2005 年,印尼发生海啸,泉州侨联第一时间向侨胞发出慰问,畅通各种联系渠道,开通捐助热线组织募捐。

为了更好地服务归国侨胞和吸引海外侨胞,特别是新生代,泉州于 2016 年成立创业服务平台,帮助海外华侨归国创业、就业。

四、加强泉州侨力资源培育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政府积极加强海外华侨统战工作,做好华侨“寻根”工作,促进民间交流,为广大华侨提供方便之门。但是随着海外华侨“新老交替”结构性变化,华裔新生代逐渐取代老一辈,成为华人社会的主体。由于新生代身受现实语境、教育和当地主流文化的多重影响,他们对祖籍文化的认同不断弱化,当地文化认同不断显现。因而,培育泉州侨力资源,应培育一种大局观念,拓宽泉州华侨与国内社会共融渠道,加强华裔新生代对祖籍文化的认同。

(一)借助新型大国关系增进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度关键取决于母体的形象和地位。世界的博弈是大国间的博弈。2015 年,中国致力于全方位改善大国间的关系,诸如不断改善中美关系,深化中俄关系,拓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进一步稳固周

边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逐渐鲜明而稳固。这不仅提升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还为他们带去了实际的福利。泉州老一辈华侨华人充分发挥闽南文化精粹,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谱写出一个个白手起家奋斗诗篇。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泉州应以此为契机,借助闽南文化精粹,增进各国人民与中国文化的认同,促进华侨华人融入居住国,从而促进华裔新生代对祖籍文化的认同。

(二)拓宽与海外华人社团联系渠道

泉州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历史各个时期,泉州华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都与海外华侨集群而居,成立自己的社团,有很大的关系。海外社团是华侨的组织机构,是华侨华人与祖国各地联系的重要纽带。通过海外社团,我们可以获取丰富多样的“第一手”侨力资源信息,通过社团宣传中国和引导认识中国,更具说服力。拓宽与海外华人社团联系渠道,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获得沿线各国的华侨积极支持和参与的重要基础。

(三)加强“寻根之旅”工作,凝聚侨心侨力

泉州是著名侨乡,泉州各地华侨元素随处可见。华侨历史博物馆、学校、医院、寺庙、祠堂等,无不浸染着华侨的心血,维系着海内外乡亲的情感纽带。俗话说,“一代亲,二代代表,三代了”。只有让年轻的侨胞回到故乡,看到祖辈走过的足迹和留下的宝贵东西,才能唤起他们对“根”的认同。因此,加大力度做好华裔青少年夏令营活动,让“侨二代”“侨三代”感同身受,是凝聚侨心侨力的关键举措;其次,搜集整理侨胞信息,开通网络寻亲平台,有利于海外侨胞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促进“寻根之旅”工作的顺利展开。

(四)积极打造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依托侨乡优势,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打造出一大批诸如石化、纺织服装、鞋业等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锻造出“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纺织产业基地”等国家级品牌;同时,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华侨的带路作用,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间贸易。泉州经济总量因此连续 18 年来位居福建省第一。在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今天,泉州更应进一步发挥侨乡优势,借

助侨力资源,以项目化运作方式,继续打造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先行先试区域,在经贸、文化、旅游和海上交通运输等领域取得更大进展。

参考文献:

- [1] 林心滢. 出国移民对侨乡经济的影响方式及其效果评价方法[J].福建论坛,2005(3):107-110.
- [2] 央广网. 泉州在外华侨 948 万人 侨亲成为泉州重要名片[EB/OL].(2015-04-23)[2017-09-05].http://news.cnr.cn/special/ydyl/jxs/q1/news/20150423/t20150423_518386603.shtml.
- [3] 泉州市委统战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做大“海丝”朋友圈:泉州市统一战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EB/OL].(2017-07-07)[2017-12-10].<http://www.fjtzj.org.cn/ar/20170707000049.htm>.
- [4] 赵阳.“寻根之旅”弘扬中华文化涵养侨力资源[EB/OL].(2010-07-25)[2010-11-20].<http://www.chinanews.com/hr/2010/07-25/2423912.shtml>.
- [5] 陈添地.赤子丹心谱就奉献华章:东南亚华人华侨对泉州经济文化建设贡献卓著[J].国际人才交流,2006(9):58-60.
- [6] 林璐,陈芝.打造侨务工作泉州品牌:记全国侨办系统先进集体泉州市外侨办[N].福建侨报,2017-07-07(12).

(责任编辑:冯起国)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in Quanzhou

ZHANG Yahong

(Library of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Quanzhou is a famous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on the sea”, with many overseas Chines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Quanzhou are not only keen on the public welfare of their hometown, but also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Quanzhou is actively exploring the way to cultivate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through a variety of channel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olk. The key to the cultivation of Quanzhou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is to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exp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create an area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Quanzhou;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Minnan culture

行政诉讼撤诉中不良博弈产生的后果及克服

——以涉税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的考察

吴玉婷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042)

摘 要:随着法治中国的进步,中国各领域的司法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但在行政诉讼撤诉中存在相当比例的官民不良博弈问题。此类案件撤诉比例相当高,并且背后的撤诉原因呈现出多样化以及主体身份的复杂性。这种不良博弈会导致公共利益在司法协商博弈过程中的私人分割,同时也不利于社会舆论的评价与监督,甚至导致法院审理提供的平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从而影响到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在对待这类案件时,需要处理好其中存在的公民的非理性诉求,同时也要防止公权力机关对司法诉讼的干预,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完善司法机关撤诉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制度,从而真正全方位解决行政诉讼撤诉中存在的不良博弈问题。

关键词:行政撤诉;不良博弈;非理性;撤诉审查

中图分类号:DF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21-08

在对历年 1000 多份行政诉讼案件进行的归纳分析基础上,我们可根据数据分析出现阶段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特点。据此我们可在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情况中剖析具体的不良博弈导致的撤诉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并依据参与纠纷的不同主体总结归纳解决纠纷的具体方案。本论文主要按照四个部分来讲解——首先阐述的是对行政诉讼撤诉案件现状的数量化分析得出现状的特点;其次对该些特点进行具体深入的法理分析,从而使之成为法理层面的问题;再次对其中出现的官民不良博弈问题进行具体的原因及后果分析;最后则是对这一不良博弈现象的克服与完善。

一、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现状

行政诉讼撤诉案件是指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

决或裁定前,原告撤回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不要求法院继续审判的案件。以下数据都是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得出权威原始数据,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庞大,所以本文采用的是以涉税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的考察方法。此外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侧重的是行政诉讼主体之间的官民纠纷,鉴于需要从案件中提取的因素存在一定的侧重点如“官民”“撤诉”等因子。采取“样本分析法”难免会影响到论文的严谨性、全面性和结论精确性,但确实是研究某一具体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方式方法。

我们通过表格 1、2 和 3 对行政诉讼案件与涉税行政诉讼案件相关数据加以呈现。

表 1 历年行政诉讼案件数量

Tab.1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over the years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案件数量	1211	3462	9185	41637	224768	287595	381603	407455

收稿日期:2018-03-25

作者简介:吴玉婷(1992-),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

表 2 历年涉税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及撤诉量

Tab.2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and the amount of withdrawal

年度	2015	2016	2017
案件数量	302	659	813
撤诉量	98	231	265
撤诉比	32.5%	35.1%	32.6%

表 3 历年涉税行政诉讼案件撤诉原因分类

Tab.3 Classification of reasons for the withdrawal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s in the past years

原因分类		2015	2016	2017
诉讼目的已达到	说明具体撤诉原因 2015:22% 2016:28% 2017:28%	12%	19%	20%
双方协商处理		10%	9%	8%
原告提出撤诉	未说明具体撤诉原因 2015:78% 2016:82% 2017:82%	73%	52%	54%
按撤诉处理		5%	30%	28%

以上是对收集的原始数据加以归纳展示,涉及的样本有 1000 多份,全部都是近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收集的原始数据。我们可以将以上原始数据加以分析得出,中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以涉税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总量与撤诉量大,撤诉比高

根据以上数据量化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发现:中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快速上升式发展态势,如 2017 年的全年行政案件总数比 2010 年增长 300 多倍。可见在当下及未来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行政案件的普遍化及重要化。做好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我国司法问题中一大重要领域的制度完善及其中存在的突出的官民诉讼博弈问题。此外,也可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撤诉比也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且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比率也相对比较高。

(二)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撤诉原因多样化,未说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案件占比大

由上述表格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的复杂性,在公开的裁定书中展示的撤诉的原因呈现多样化。在此笔者将其分为说明具体撤诉原因的

撤诉与未说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撤诉两大类,具体则细小化为四种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少数撤诉原因占主要地位,比如未说明原因的原告提出撤诉。可见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撤诉案件原因加以具体化、深层化分类与探讨。

二、行政诉讼案件撤诉中两大特点的法理分析

根据第一部分的量化实证分析,我们总结出了行政诉讼撤诉案件的两大显著特点,本部分我们将从这两点入手阐述其法理层次的意义及问题意识,对之加以系统化深层化分析从而展现出其中存在的双方及多方不良博弈现象。

(一)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总量与撤诉量大、撤诉比高

对这一现象,我们不当主观地判断这一特点的突出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是好是坏。但是不可否认其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存在独特的法治意义与鲜明的行政法理特点:

1. 转型期中国的法治进步

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司法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纠纷机制之一。人们从原来的“谈法色变”“法不容情”的观念转变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公民,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并开始运用法律解决自身纠纷。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数量迅速上升,这不仅是因为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更加繁多和复杂,也体现了司法途径越来越多成地为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

2. 博弈双方法律性质不同而诉讼地位平等

公权力机关与私人团体之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性质不同而诉讼地位平等两大特点导致当事人双方愿意诉诸司法协商平台而非正规公开的解决渠道,这样对双方而言有更多的协商空间,同时也有助于行政诉讼问题的体面适当解决。

(1)“官贵民贱”的传统法律文化。不得不承认,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官贵民贱”的思想。究其根本,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王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之久弥留的烙印。自古人们寻求的都不是自身权利的争取和维护,而是对“青天大老爷”“父母官”的理想追

求,总是期望在自身的权益受到贬损时依靠高高在上的官员做出明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此外,双方的优劣势形势也使得前者在物质与心理上有更大的优势地位。这种“官贵民贱”的思想也使得维持千年封建制度的科举制得以流传,人人崇拜官员、人人惧怕官员、人人又想成为官员。双方存在纠纷时,相同条件下不愿意直接面对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一定程度的妥协与撤诉。这样的历史发展模式使得“官贵民贱”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思想中,遇到问题自主解决的少,向官方、公权力机关寻求解决的方式多,希望能从公权力那里取得自己的权益,这是行政诉讼案件增加的原因之一。

回望当代,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是最为直白的官民间的博弈。在司法层面上,给予官民在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双方平等,但是如上所述,中国的官较民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上就处于优势地位,加上法律文化和政治体制等多层次的影响,两者在法律性质上也完全不同。况且现实生活中官员比民众拥有更多的司法资源、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博弈能力,在缺少权力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

(2)官民双方法律性质不同。官:指的是公权力机关,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民:指的是私人团体,代表的是私人利益。双方在法律的明文规定上是处于不同性质的两种法律主体,并且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利益,这两种利益种类的冲突调节优先序位是不同的。根据我国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可以看出在同样情形下,对于前者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后者则是法律上的保护。甚至有学者对这一立法直接表明态度,行政诉讼及其司法解释更加应当充分考虑公共利益。^[2]这样的规定导致在现实生活具体的司法审判中,法官存在一定的价值标准,再加上上述的“官贵民贱”思想的存在,所以公权力机关和私人团体的司法博弈本身就存在前

提的差别性和序位性。

(3)官民双方诉讼法律地位平等。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可见司法过程中法律赋予官与民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要提供正当正面、平等协商平台给予双方诉讼博弈。同时这也要求审判人员在司法的过程中保持司法中立,不受官民双方法律性质的不同而枉法裁判,也要求保证司法机关的中立地位,防止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权力干涉与权力滥用。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官民之间的法律性质不同而诉讼地位相等,再加上传统中国的“官贵民贱”思想的烙印,使得官民间的行政诉讼博弈比普通诉讼案件融入更多的复杂因素,在公民的权利受到公权力机关的贬损时,前者一方面希望借助第三方平等博弈平台(司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面临一定程度的自轻观念的冲击、行政力量压迫和两类利益的平衡问题,使得行政案件予以增加,同时原告在达到自己一定的期望时,出现行政撤诉的可能也越来越普遍。

(二)撤诉原因多样化,未说明具体撤诉原因案件所占比大

行政撤诉问题涉及到原告的权利保障、被告的权力监督和法院的职责范围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3]不同于其他的诉讼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束纠纷的情况,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的原因就其种类和层次而言要复杂和深层次很多。本篇论文将 1000 多份的样本加以归纳整理,分成两大类四小类,其中两大类是写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撤诉和未写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撤诉,这是由行政案件撤诉的结果来分类的。具体对于这两类的分析如下:

1.写明具体撤诉原因的

对于这一大类下的撤诉案件,其下主要划分为两小类——诉讼目的已达到和双方协商解决。

在这类撤诉案件的裁定书中,通常法官会在其中加以注明。如(2016)冀 0281 行初 18 号案件,裁定书中记载的撤诉理由是——“原告王立彬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以被告已撤销遵国税稽罚(2015)16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写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撤诉从表面上看

属于较完美状态的良性博弈,因为从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原告公民对于这一博弈结果处于诉求请求实现或可接受的状态。

单从写明撤诉原因这一类型诉讼案件体现出来的表面上的良性博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行政诉讼中存在的良性博弈其意义与价值。

(1)体现出撤诉人撤诉的具体意愿,有利于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监督。由于说明具体的撤诉原因,可让公众了解原告即私人团体的撤诉具体意愿大小,从而实现了一次博弈的真正目的即公民在与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诉讼中维护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样这也有利于司法监督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作为社会监督机制的重要一部分,司法监督的完善有利于公民对法治加强信仰,同时又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和监督的透明。

(2)为公权力机关与私人团体博弈提供正当合法、正面协商平台,并为后者提供主动权。公权力机关与私人团体的博弈平台就是法院提供的司法审判途径,在双方矛盾无法在《行政法》及行政部门间解决时,司法机关提供的这一第三方平台有助于双方矛盾的和平解决。由于这一平台引入了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法院,因此更加有利于对双方纠纷的的调节与解决。法院在其中不仅提供了平台,而且适当的干预有利于公权力机关无法行使自身的优势地位。

此外,这一维权的途径也为私人团体提供主动权,其有权就生活中的行政纠纷诉至法院,并且这一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很大程度上附加于公权力机关,这种情形下,私人团体的责任相对轻松,主动权也进一步加强。

(3)公民维权成本降低(费用、时间),带动公民守法维权秩序形成。对于撤诉案件,首先从费用上我们可以看出是相对优惠的。不与诉讼标的额相挂钩,并且是减半收取诉讼费用。从时间上也节约了公民消耗在诉讼上的精力,一旦撤诉成功,诉讼则终结,无需下一步的审判程序耗费当事人的时间。可见行政诉讼调解撤诉正是实现经济最优化的一种方式,不仅程序时间上还有诉讼成本上都提高了行政类案件的结案率,实现法院自身办案的最优化。^[4]

最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撤诉案件有利于公民的权益保障,同时也增加了其他公民对这一类型行政诉

讼的自信心,从而使得公民养成良好的守法与维权意识,促进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4)节约司法资源(开庭审理、执法等程序被免除),促进公权力机关资源合理配置。现今中国诉讼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必然这方面的司法人员和资源是处于紧缺的状态,如果良性博弈下的行政撤诉案件增加,有助于节省案件处理的时间,提高行政与司法的办事效率,从而促进公权力机关资源的合理划分和配置。

(5)促进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与市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进步。司法公正下的良性博弈是社会法制正常运行和完善的表现之一,不仅对于双方当事人是一次利益纠纷的合理矫正,而且也有利于全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认同和促进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从而形成人人守法、人人懂法,人人具有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的市民社会,使得法治社会制度在这一社会中得到真正完善与发展。

但我们也不得不提,写明具体原因的撤诉下同样存在不良撤诉。不良撤诉也称为不良博弈指的是诉讼过程中出现非正常影响案件诉讼的因子,比如行政机关的干涉、公民个人的非理性诉求以及司法机关的枉法裁判等。不良博弈会导致通过司法的正当裁判使原告公民的诉求无法得到解决或被迫“解决”,甚至严重的会导致表面官民协商撤诉,实质上双方私下的协商损害到第三方或公共利益。就比如材料收集中的(2016)豫03行初925号的判决裁定书中“原告河南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为了企业健康的长远发展,决定撤回起诉”。可看出诸如此类的裁定书展示的撤诉理由是存在一定的瑕疵性的,其中是否存在不良博弈是存疑的。所以即使对于写明原因的具体撤诉案件,依然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

2.未写明具体撤诉原因的

对于未写明具体撤诉原因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总的撤诉案件比例达到80%以上。本篇论文将其分类(通过实践调研和判决书内容)为:(1)公民意识非理性诉求而撤诉;(2)外界行政压力被迫撤诉;(3)按撤诉处理。对于这类行政撤诉案件,由于判决书中通常没有说明具体的撤诉原因,所以探究其原因的难度偏大,需要进行归纳汇总和量化分析,此外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实地拜访与询问得出其中因博弈导致撤诉的

具体事由。如在(2016)辽0192行初757号案件中——“原告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按照撤诉处理”只是说明原告退庭,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具体撤诉的理由与原被告的主观想法,这样就使得博弈的正当合法性得不到充分审查与监督。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就认为没有说明撤诉原因的博弈就是不良博弈,比如公民在起诉审理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诉求属于非理性诉求而意识到错误,不到庭继续处理纠纷的情形,这种情形反而有利于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和守法意识的增强。

必须重申以上对于行政诉讼案件存在的两大特点的法理分析都没有存在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但是不可否认在存在良性博弈的同时,这种模式下的撤诉制度存在相当数量的不良博弈,官民地位不同,法律性质不同但诉讼地位平等以及撤诉审查制度不完善都从侧面反应出来了不良博弈的存在。

三、行政诉讼撤诉案件官民不良博弈的原因及后果分析

以上部分是对我国行政诉讼撤诉案件的现状介绍和两大特点的法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简单行政诉讼撤诉案件除了存在法治意义以及良性博弈的一方面外,还潜在着不良博弈的情形与危害。本部分就是对行政诉讼撤诉案件中不良博弈的原因与产生的后果加以分析,并对国外的相关制度加以简单介绍从而更加全面反映这一部分需要呈现的问题:

(一)不良博弈的原因分析

从前两部分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良博弈是由于参与博弈的三主体各自存在着不正常子因素的干扰所导致的结果。无论是说明具体撤诉原因还是未说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案件,其中既存在司法的进步也存在不良博弈的问题。对于不良博弈的原因,本文主要根据不同当事主体的角度来加以分析从而将不良博弈划分为三种类型。

1.公民的非理性诉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社会的改革转型与快速发展导致了多元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凸显甚至不断激化。在这样一个社会环

境中,公民自身追求的利益更加多样化,但是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公民认知能力、法律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很多情形下,许多利益诉求的表达往往容易偏离法制轨道,存在一种激情引导下的非理性诉求。^[9]比如漫天要价的拆迁费,又比如过分索求行政赔偿,甚至有时陷入一种“我弱我有理”的思维困境之中。一旦没解决好,就会成为事态恶化的导火索,演化成为负面舆论的风向标,且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滥用诉权,大部分情形下,这样的非理性诉求在不良博弈中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只有在诉讼中通过第三方司法人员的解说才能意识到。所以这种不良博弈在现今中国的存在,需要公众群体的自身反省和理解以及外界的疏导和宣传才能得到改善。

2.公权力机关滥用优势地位

如前部分所述,中国自古存在“官贵民贱”的思想,加上现今的权力划分制度和行政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容易导致涉事的公权力机关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导致不良博弈。这些非正常子因素的存在具体划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职权主义色彩浓重。从古到今,中国的行政机关职权设置都是具有相当的职权与职能,执掌百姓的衣食住行。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权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有的地方权力滥用则更加普遍,不仅对职权范围内的事物独断专行,同时也干预其他行政领域。这样的职权主义色彩很容易使得公权力机关在作为行政案件的被告时觉得有损面子,并千方百计运用自己的职权加以干涉与施压,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裁决。

(2)对司法中立、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干预。涉事的公权力机关除了运用职权主义办事,还运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职权干涉司法运作,运用行政级别因素、经费因素以及地方性的官场人情等因素给法院、法官政治施压,影响地方的司法独立审判。这种行为不仅使得个案得不到有效判决,而且还会干涉司法的中立,使得维护人们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受到破坏。从而使司法丧失公信力,甚至危害社会整体稳定与进步。

3.现有行政诉讼撤诉的审查制度漏洞

对于中国的撤诉审查制度,现有立法规定的内容较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裁定前,原告申

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这一条文对审查标准和审查处理结果的公布并没有做进一步说明,导致现实的可操作性不高。

此外,我国的法官需要处理的案件繁多,大多数的法官面对案件的心态是尽早结案,不想花费更多的精力。对于申请撤诉的案件通常都是欣然接受的状态,并不多加考虑其中存在的隐患。并且也讲求中国人情中的明哲保身思想,不想过分勘探撤诉的具体缘由,以免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纠纷。

(二)不良博弈的后果分析

1. 公共利益在司法协商博弈过程中的私人分割

在未说明具体撤诉原因的情况下,官民双方提出的和解方案,可能损害到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其他正当利益遭遇到正当司法途径的破坏并将此状态“合法”确立。

2. 法院审理提供的平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地位

由于官民双方的力量差异以及法律性质差异,在行政诉讼撤诉的不良博弈中进一步加剧,使得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公权力机关从自己滥用优势地位的过程中损害了公民正当利益及国家利益。这样的不良博弈使得法院提供的司法博弈平台得不到有效利用,无法实现官民双方在这一平台的正当良性博弈,反而是借助这一平台维持并加剧了双方不平等的纠纷解决局面。

3. 不利于社会舆论的评价与监督

不良博弈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而且其运用表面合理实际损害公民乃至国家利益的博弈方式使得民众不能有力地进行舆论监督,比如私下进行行政力量压迫原告撤诉,或表面上是未说明原因暗地里签订违法协议的行政撤诉,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大众不能对其加以正确的舆论评价和监督。

4. 司法的公信力的丧失

由于公权力机关的优势地位以及行政撤诉司法审查机制的漏洞与中国处于人情社会的现实,公权力机关对司法的干涉在地方上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是司法机关不能公正裁决,从而导致涉事公民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维护,公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

任职人员开始不严格依法行政,与此同时司法的公信力与存在的意义也丧失。

四、行政诉讼案件撤诉中不良博弈问题的克服

(一)处理好公民的非理性诉求

面对公民的非理性诉求,首先司法机关自身要切实维护司法审判制度中公权力机关与私人团体间的权利博弈地位平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平等的前提下对话,同时维护好司法中立、司法公平。因为相对于行政被告,公民个体的实力、地位与其存在一定的差距,法院在现实诉讼中更应当以保护弱者的姿态保护公民的权利,制定更加明确的保护流程及设立专门审查撤诉原因的部门,对于受胁迫受诱骗撤诉的案件启动新一轮的撤诉审查机制并且对于已经结案的案件可以再次受理审判。

其次处理好公民的非理性诉求,在诉讼过程中针对个案通过调解说理方式,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宣讲,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对于非理性的诉求要明确指出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并对之说明原因。此外更新公民法制观念、加强公民正确的行政诉讼法律意识,这样才能使得有限的诉讼资源可以真正维护公民的权益。

(二)防止公权力机关的干预,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⑥,防止公权力机关的权力滥用,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切实可行的权力监督及处罚体制,不仅要建立相关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机制,而且不同的行政部门之间也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监督部门。

最切实可行的是从立法入手,现如今社会已经开始注重这一领域的法制建设,如我国在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并确立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其职权是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并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这样从制度上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到防止公权力机关专断独行,同时也有效制止其对其他部门的行政干涉,维护司法审判的中

立性与神圣性,确保各机关之间在阳光下运作。

(三)完善司法机关撤诉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制度

在行政诉讼撤诉中,三方力量的博弈可视为对不同利益的调和,在理想状态下,这一目标应该是对利益的保护,并由此区分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作为立法者和法官都是处于调和这些利益的角色。^[7]改变现有的行政撤诉中存在的不良博弈现象,相信法律是调和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社会机制方面的第一人。

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撤诉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照撤诉处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可以看出对于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现有法律规定不明确,只是简单提到未到庭按撤诉处理以及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撤诉,却没有具体的批准与处理流程。法律应当明晰,不给公众一方的无从了解以及法官一方肆意解释留下任何空间。需要进一步对这一行政诉讼撤诉审查制度加以完善,具体完善建议如下:

第一,需要在撤诉案件中写明撤诉的具体原因防止当事双方非法协议的达成造成合法的非法结果的产生,同时也实现私人团体公平的公力救济与社会整体的司法监督。有学者主张在构建我国诉讼和解协议制度时,采用将和解协议记入笔录的方式,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进行审查。^[8]并且需要相关机构立法具体规定和解协议情况分类,对于无效或违法的情形应当规定和解协议自始无效,并且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以及法院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第二,撤诉审查制度确定具体的审查环节与审查人。比如设立专门的审查部门并实行终身负责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第三,落实撤诉的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全面审查。传统对于行政撤诉案件在实际操作中,都是进行简单

的程序性审查,因此对于涉及撤诉原因背后的利益划分是存在监督空白。所以我们应当在合法性与实体性审查之后,宣告判决裁定之前再加上程序性审查。文章前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去分析多种撤诉原因及其背后的诱发因素,主要就是为了完善撤诉审查规则,减少非正常撤诉与不良撤诉,更好使撤诉审查标准建立。

第四,改变法院传统“一事不再理”制度。对于原告撤回诉权的案件,如果原告以被诱骗、被胁迫为由申请的再次起诉应当再次审查并受理,不能由于原告撤回诉权就不再审理该案,这势必会有违法院合法性审查职责,同时亦是对“司法终局性”原则之亵渎。这一制度应当作为“一事不再理”制度的例外条款,这是由行政诉讼案件主体的多样性与纠纷的复杂性决定的。

对于双方协商撤诉的行政案件,应当在合法并经真实意愿合意的前提下由审判机关主持撤诉程序。防止出现胁迫撤诉或达成私下非法协议等情形。从而有助于保持协商撤诉后双方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协议的强制性。

多管齐下,多方共建。结合我们自己的解决思路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的制度特色,中国可在分析自己问题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制度,走出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 [1] 甘文.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09.
- [2] 黄学贤.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探讨[J].法学,2010(10):36-47.
- [3] 王焕焕.行政诉讼调解现状的调研:以宁市市 D 区人民法院为例[J].南宁:法制与经济,2018(2):52-53.
- [4] 闵泽琼,陈琛.群众非理性诉求的表现及其合法利益的维护[J].学理论,2015(30):9-11.
- [5]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EB/OL].(2018-01-23) [2018-02-25]. <http://m.sohu.com/n/364371479/>.
- [6] 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史[M].王笑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318.
- [7] 张远照.行政诉讼和解之困境及路径选择[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4):99-101.
- [8] 冯现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8:28.

(责任编辑:陈 果)

The Consequences and Overcoming of the Bad Game Played in the Dismissal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s of Tax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U Yut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judicial system in all areas of China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government's bad game i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proportion of such cases is quite high,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withdrawal are diverse and complex. This kind of bad game will resul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game in the process of private juridical consultative segmentation, but also not conducive to th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even lead a court not to realize the true sense of equality, which affect the judicial credibility. So in dealing with such cases, we need to deal with the citizens irrational demands, but also to prevent the public power authority from intervening the judicial litigation, do " Put power in the cage of the system ",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system of judiciary case review, to safeguard the independence of judicial organs trial system, which are really comprehensively solv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se of bad game.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withdrawal; bad game; irrational; case review

多义语境成因机理分析

刘甜甜

(龙岩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语境是复杂的、动态的,语境对于交际双方的互相理解、决定指称乃至话语意义具有重大作用。但是,语境又具有多义性,多义是由话语双方在交际中只强调语境信息,而忽略语境事实导致的。语境多义是说话者和听话者达到有效交际取效的主要障碍。事实上,人们交际的过程是将事实放在它的语境中,使事实重新语境化,并排除多义语境的过程。对语境多义性进行分析有助于交际双方对话语真实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语境;多义;话语意义;重建语境化

中图分类号:H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29-04

一、语境

在语言学、语言哲学的研究中,语境都起到了中心角色的作用。语境的研究由来已久。自1923年, Malinowski 首次提出语境之后,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语境进行过分析与研究。国外多从文化、语用的角度去研究,如 Pellowe(1990)认为语境具有三大特性,即普遍存在性、多变性和抽象性^[1]。Ungerer & Schmid(1996)提出 context 和 situation 之间的不同点,前者是认知的,后者是物质的^[2],反观国内的研究角度多是基于修辞和功能。胡壮麟(2002)通过对过往学者的研究,发现对语境分析的方法已有从简单的语言语境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趋势^[3]。不管是何种研究角度,学者们普遍都认为语境是语言事件发生的客观的、社会的文化语境,语境意义即话语在其中发生的情景特征。这也是对 Malinowski 语境概念的细化。直到

Sperber 和 Wilson(1995)提出语境是心理产物,是听话者对世界的一系列假定中的一组,正是这些假定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制约着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从而否定了会话合作知识共享,提出了共有显性(mutual manifestness)基础上的共有认知环境论^[4]。George Yule(2000)认为客观环境就是语境,并指出指称(reference)取决于局部语境(local context),参与人的局部语境和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决定了话语指称的分析^[5]。这些都反映了语用学者试图说明语境对决定话语意义的重要性。

语境对于交际双方的互相明白,决定指称乃至话语意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语境是复杂的,语境涉及到理解和产出(production)两个方面,语境的多义性使得语境更多了动态性,对于语境的多义性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交际双方的互相明白、话语指称分析,而且有助于交际中对话语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二、语境的多义性

在自然语言的表达理解中,多义(ambiguity)是主要的障碍。人们常常把多义看成是纯语义问题,当词语不在恰当的语境中时,词语本身便是多义的,同时也是无意义的。不仅词语、话语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收稿日期:2018-04-10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JAS180498)。

作者简介:刘甜甜(1986-),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研究。

(things)的本身脱离了恰当的环境,也是多义的,而能够消除“多义”的恰恰是人性语境(human context)的认知。

Voloshinov(1993)对语言活动做过测定研究,证实了语言表达的意义在语言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语言的意义同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过程有关^[6]。我们词典中描写的表面的稳定的意义其实是语言过程的具体化。所以,应该说没有什么词或者词语有什么自然的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非自然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在话语交流时所依赖的语境。正因为没有所谓的通行的正确的描述,才没有唯一“正确”的词汇。所以由于话语者(utters)的观点及对话语者的观点都会受到共有目标的影响,因此多义往往源于多义语境。多义基于多义语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语境会因话语使用者不同而不同,也会因人群的不同而不同,语言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造成了语境的多义性。Mey(2003)提出根据惯例和语境,同样的话语(utterance)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7],这说明对于同样的话语,却有不同的理解结果,是由于语境的多义性所致。

(2) 语境对要表达的话语(utterance)给予真正的语用意义,帮助话语双方实施有效的语用行为。

(3) 对语境的认同与距离有关,距离不同会使人对语境的认同产生不同。比如,一片山脉,这是客观的存在,但对这片山脉会因看者的角度、距离的不同而出现认同的区别,“远看成岭侧成峰”,这便是不同所带来的不同现象。人们应该从 Bateson 的“不同产生不同”(Differences make difference)中得到启发:承认不同存在的认同;承认认同存在中的不同。同样一件事情,由于看者的角度不一样,也可能造成语境多义性。不同的距离会使同一语境出现多义性。但是认同与距离不是绝对的,比如,甲身在“招聘语境”,乙远离“招聘语境”,甲也可能无动于衷,乙却可能非常急切,人的因素对语境意义有着形成与改变、延伸的作用。

(4) 当语境中的包含物没有被包含时,也会产生多义语境,只有当包含物被包含进去并被语境化时才会消除语境多义。比如,面对一场车祸,甲(过路人)表现出惊讶、好奇、围观;乙(亲友)表现出痛惜、同情、悲伤;丙(亲人)表现出痛不欲生、哀嚎。这其中语境对

甲,乙,丙的包含程度不一样,说明这里的语境对于不同的包含物是多义的,是 $C_1 \cdots C_{n+1}$ 的结果。

三、语境多义的成因

人类需要使用词语进行交际,任何交际都离不开语境。然而,对语境的阐释和形式研究的困难在于语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造成语境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语境的多义性。

语境多义的成因之一是强调了语境信息,忽略了语境事实(facts)。语言学家在分析语境意义时认为,语境效果指新信息与旧信息相互作用产生的语境含义,即在交际中,对已有认知的改变产生新的认知语境,也就是说构造语境的是“信息”。但是,我们是否体察到,由于交际的双方或者多方,他们在交际过程中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希望(wish),动机(motion),这些因素构成的“信息流”,并不一定完全是“事实”的全部,信息流或大于事实,或小于事实,或基本等于事实,由于信息是非定量的,所以信息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词典说“信息”是“消息”;而“事实”是准量,“事实”的可信度往往超出了“信息”本身。因此,以语境信息来确定话语是否被理解和交际取效是否成功是完全不可靠的。但是人们交际往往超出了事实(facts)本身,语境中的事实的真实性往往被交际中人的情感等因素的外“包装”超载所掩盖,于是,同样的事实,语境却完全不一样,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交际中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人的语境”(human context),而交际中的说与听两者是语境的构建者。所以“人的语境”对“事实”的处理有决定性作用,人们交流的“信息”往超出了“事实”本身,这样语境多义是不可避免的。有效的交际需要经历一个信息筛选、识别的过程,“让事实说话”是交际真实的取效。同样的事实对不同的人引发的反应是不同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感到很严重,而对另一些人则没有什么反应,后者就是脱离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脱离了与这些人无关的事实。社会语言学家从语境线索角度对语境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语言学家的语境线索所提示的意义不是信息内容,而是说话人的态度和意图,是人际意义的内容。这说明交际中的语境是“人性语境”,决定交际成果的

是“人”而非“信息”。

“让事实说话”,只有将事实放在语境中才能“说话”。如果不把事实放在语境中事实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把处理的事实放在语境中才有意义。人们在交际中忽略的常常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语境。事实是人的事实,语境实质是人的语境。交际中的信息的不断输入,其实交际的最后成功真实,事实是语境的核心物。新信息不断的代替旧信息的过程恰恰是语境变化产生多义的过程。而交际中新信息的不断变化与输入又是不可避免的,交际认知中的最佳关联又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奏效,所以语境的多义性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语境中的新信息和旧信息的说法,还是新信息取代旧信息形成新语境的说法,都不能等同于语境的事实观。事实是不超载的,超载的事实已不是纯事实。因此,信息是较集中的笼统的层面的混合物,事实才是语境中的真值;但是在交际中,“事实”超载会导致人们将“事实”语境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把事实重新语境化,因为重新语境化的过程是重塑语境交理解脱离(decontextualization)多义语境的过程。语境化—脱离语境化—重新语境化的过程是真正的让事实语境中说话的过程。语境效果指新信息与旧信息相互作用产生的语境含义,即在交际中对已有认知的改变产生新认知环境。因此,人们交际的过程是将事实放在它的语境中,使事实重新语境化、排除多义语境的过程。语境的真正的作用是人把事实放到语境中取效。

四、语境化的重建

语境的复杂性是因语境概念与认知宽泛所致。由于语境用得宽泛,生活中的人们都毫不犹豫地使用语境,但并没有对语境有什么思考。

为了探讨语境意义,语言学家提出了语境化。对语境假设的加强与削弱都会产生语境化,语境化就是生化出语境效果。脱离语境化是一个新信息代替旧信息的过程,亦是脱离原来语境化的过程。重新语境化既是对语境的收窄、细化及补充。

但是语境化并没能完全解决语境多义问题,因为

在人们交际的客观主体与认知之间总是在动态进行中,语境化了的语境也在随着交际信息的增多、置换、否定而发生新的变化,因此,语境是个不断被重塑的过程中物。实际语境是在交际互动中活化和构建的。相同的语境会产生不同的语境效果,其重要决定因素是语境中所包括的人。如面对一场车祸的严重伤者,由于环境中人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语境效果,这种不同便是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是人的因素及人的语境距离所致。如果人的主观偏爱可以脱离语境,就可以避免出现语境多义。重新语境化是将事实社会化,排除主观化,重新构建语境的过程,消除多义的过程。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交际理论认知科学中都是用语境,语境的概念是综观的,语境的构件(component)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局部的观点(local point)与结构环境有关,局部观点可以在进行的互动影响中活化和构建。局部观点(local point)变成关联,最后交际互动者分享。总体观(global point)指的是语境外部的已知构件,包括知识、信仰,来于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普遍经验,语境化的实质就是不断的语境重塑,语境化的过程是把语境作为一个在语言行为选择中、在意义理解中起作用的几种参项单一化。重新语境化可以消除多义,解决口语含糊未理解的问题。

语境不是固定的、预设的、不变的。语境是在交际互动中重塑的,从经验中衍生意义,应该消除语境歧义。脱离语境化(decontextualizing),然后重新语境化,把不合理的含义分离出来并将其嵌入到积极的社会语境中去,这是一个产生主导价值的过程。脱离语境化是排除那些对语境重塑,对语境事实干扰的信息和人。人是本体,没有这一本体,知识是空洞的,因为知识被排除在语境外(decontextualized)必然导致不能包括所有的其他知识及知识载体。重塑语境化是交际过程中语境的重新收窄和细化。语境化重建是在语境规约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且以社会语境为基础。Hirst(2000)认为语境从不是明确的简单的东西,语境是有说者和听者构建的。现实生活中,同样的事实在交际中造成的语境混乱,对于作为交际中的人来说是他们脱离了语境。

对语境多义性的探讨可以了解语境的构成(component)和语境重塑问题。语境的无限增生使语境产生

歧义,歧义语境会使关联受到削弱。人们通过语境对交际双方的话语意义进行推导,说话者和听话者再利用相关语境因素,把意思准确的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有效交际。这也正是对语境多义性进行探讨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PELLOWE J. Who is Context [C]// McGregor G, White R.S. Reception and Response: Hearer Creativity and the Analysis of Spoken and Written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69.

[2] UNGERER F, SCHMID H.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

search Press, 1996:46-47.

[3] 胡壮麟. 语境研究的多元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3): 161-166.

[4]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5:15-16.

[5] GEORGE Y. Pragma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43.

[6] VOLOSHINVO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Seminar Press, 1993:179.

[7] MEY G. Context and (dis)ambiguity: a pragmatic view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35):331-347.

(责任编辑:白琳)

Mechanism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Contextual Ambiguity

LIU Tian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12)

Abstract: Context is complicated and dynamic. In communication, contex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referential determination and utterance meaning of the speaker and listener. However, context is ambiguity that is caused by emphasiz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ignoring contextual facts in communication. Ambiguity is the main obstacles to ga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erlocutionary for both sides of discourse. Actually, commun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putting the facts into the context, to make the facts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o avoid meaning ambiguity. Analysis on the contextual ambiguity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real utterance meaning.

Key words: context; ambiguity; utterance meaning; recontextualization

情态动词 must 多义性特征生成的认知心理分析

连燕华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情态动词是个复杂的语言现象,情态动词 must 的语义特征更为复杂,了解和掌握情态动词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认知心理学对情态动词语义的解释,从情态类型和情态量值的角度探讨 must 的语义特征,表明 must 不但具有多义性,而且各义项之间是有联系的,它的语义的产生是有其心理依据的。

关键词:认知心理;情态动词; must;多义性

中图分类号:H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33-04

情态动词是英语中很常见的语法现象,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它的语义特征较为复杂。正如 Palmer 说的,情态动词系统是英语语法中最难描述的方面^[1]。语言学家对情态动词也做过较多的研究,例如:Lan-gacker(1990),杨洪艳(2012)采用认知语法角度分别做了对英语和汉语情态动词的探讨;李丛禾(2008)运用空间转换理论对汉语情态动词的探讨等等。虽然也有一些语言学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情态动词的多义性的观点(如:Palmer 和 Eve Sweetser),但只是对情态动词的总体描述。本文试图从情态类型和情态量值视角,结合认知心理来考察情态动词 must 的多义性特征,并对其的生成原因作描述和解释。

一、情态动词的定义及分类

英语情态动词或称情态助动词。对于“情态”,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定义。Lyons 从语用学的角度认为情态指的是说话者对言语的态度和意见表达的手段^[2]。Nuyts 从语义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情态所表达的是一个可能性、必然性、必要性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允许义、义务义和意愿义^[2]。Halliday 从功能

语法的角度把情态界定为处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一种表达方式^[3]。

综合以上的观点,我们认为:“情态”是用于说话者对于言语表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性不同程度的判断和信念或对于命题行为表达不同程度的承诺。

对于情态动词的种类,在语言学界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Warner 认为情态动词由认识、义务和动态三种类型组成^[4];David Denison 的观点是情态动词分为基本情态动词和认识情态动词,基本情态动词又包含义务和动态两种^[5]。Palmer 却坚持情态动词包括命题情态和事件情态,其中能力和意愿是命题情态的组成部分;道义和动态是事件情态的组成部分^[6]。尽管学者们对情态动词的分类认识不一,但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把情态动词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三种类型^[2]。动力情态主要指的是表达主语参与者的能力或潜能;道义情态包括允许义、义务义和意愿义,它涉及了从道义上的绝对需要到愿望、意愿性上的可接受程度;认识情态用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了解,信念和态度的表达,一般仅指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认知心理学理论对情态动词语义的解释

认知心理学认为语言与人类的认知是不可分割的^[1],是人类认知体验的反映。人类的认知体验来源于

收稿日期:2018-06-05

作者简介:连燕华(1963-),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认
知语言学研究。

人类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不同的语言结构是不同主体对同一情景用不同的识解方式理解的结果。因此语言的各方面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理据的。

情态动词是英语语言中很常见的一种表达句式,是人们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信息载体^[7],它的使用必然会受人类复杂的情感世界、主观活动的影响。Sweetser 曾说过:语言的情态就是人们在真实世界领域对理性世界以及言语行为的反映^[8]。Langacker 也认为情态动词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情态动词的意义是有理据的,其多层含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9]。他还构建了情态动词的认知模型,用来说明情态动词的意义的产生与其在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语言社会和认知因素有明显关系。那么,具体到单个情态动词的多义性特征又是如何呢?

三、情态动词 must 多义性特征生成的认知心理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是动态实体,它会受使用者的影响而变动;语言也不是自主的,它会依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不同感知和交往互动而赋予新的内容。Sweetser 也曾说过:情态是多义性的,它包括内容域、心理域和言语行为域三个域^[2]。

(一)从情态类型视角来分析

在英语中,情态动词是人类表达情态最主要的手段,must 是最常见情态动词之一,它包含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具有相同的核心意义,两者语义差别的产生源于在不同语境下,说话者认知识解不同的结果。道义情态的语境涉及社会规约、道德源等,与行为的来源或原因、真值和将来性有很大关系。认识情态的语境则是与推理法则、证据和命题的真实性紧密联系。体现在 must 的语义方面就是:当说话者依据社会法则或道德规范对命题做出判断时,must 语义体现的是其道义情态意义;但如果说话者依据推理法则或证据对事情的真实性做出判断时 must 体现的是其认识情态意义。

1.道义情态

道义情态表示说话者对行为的执行者的某一动

作施加的主观的指令或影响。道义情态意义是 must 的根意义,它是涉及现实世界的情态意义。Must 作为道义意义时,它不表达任何的推测义,而是具有义务意义或要求意义,往往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1)由于某种客观情势而产生的必然性;(2)迫于社会规约所产生的义务性;(3)来自主观意志而产生的要求性。道义意义有强弱之分,当说话人表达的是义务意义时,它往往表示很强的义务性,指的是在道义上和责任上受话者被要求完成和实现某事,反映的是说话者权威力量的命令,是明显的主观态度,体现在情态语义上是“必须”;如果说话人要表达要求意义时,其义务义较弱,表示说话者给受话者的一种建议,表达个人意志对某一行为的个体性要求,体现在情态语义上可以是“必须”,有时也可以是“应该”。例如:We must respect the old and the disabled。此例,如果说话人是出于强义务和责任的角度,“must”是表明社会规约对“尊重老人和残疾人”这一行为约束的必要性,语义上等同于“It is required that”,语句的意义是“我们必须尊重老人和残疾人。”;若说话者是从意愿或要求的角度,“must”表达的是个人意志对“尊重老人和残疾人”这一行为的个体要求性,是建议,语义上等同于“It is suggested”,在这里“must”的语义还可以趋同于“should”。语句的意义是“我们应该(必须)尊重老人和残疾人”。

上面的例子表明:在道义意义中,must 的强义务意义的“必须”和弱义务意义(建议意义)的“必须”或“应该”,明显存在着语义深处的差别,尽管表达的语义非常接近。两者相比,前者主观性很强,是明显的权威性指令,语气强硬,表明说话人的呼吁和期待,而后者则倾向建议,语气较柔和,蕴含基于客观情况的义务语义,但在表达道义语义方面,后者不如前者典型,是 must 非典型的道义语义。

2.认识情态

认识情态是说话者对所谈论的事的必要性,概率性和可能性的推理和判断,有时也表达说话者认识的心理状态,即说话者对话语语境事实的真实性的确定性。认识情态意义是道义情态意义的延伸^[7],道义情态义与认识情态义是相互联系的,认识情态义的产生是道义情态的社会心理作用力映射到认识情态的推理

作用力的结果。认识意义的核心语义特征,就是说话者根据语境对命题情况的真实性进行推理而产生的推测意义。这种推测意义与其会话的语境因素有一定关系,并会随着该情态动词语义的发展而发展,即推测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Must 认识情态的推测义显现在其语义上是“一定,肯定”“应该,应当”。Must 在语境中确切的语义,要根据不同语境,及说话人的态度来决定。因为认识情态意义的命题域包括说话人信念集合的命题,认识情态语义的确定往往与情态词的命题域类型密切相关。

Must 的认识情态推测义包含主观推测义和客观推测义。认识情态的主观性指的是话语使用者对命题的真实性的纯主观猜测,不含任何把握性。认识情态的客观性涉及话语使用者对命题的真实性有一定的把握,是对话题的事实较有把握的判断或推断。在实际交流中,很多时候其主观性推测语义占主导地位,客观性推测语义兼而有之,但主客观性之间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语境的不同,must 情态动词的主客观性会发生变化,must 的认识语义也随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同的语境赋予 must 其中一种意义。

上面的分析表明,must 具有多义性特征。它既有道义意义(非推测意义)也有认识意义(推测意义)。道义意义的义务性特征有强弱之分;认识意义的推测义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之分。

Must 情态动词的这种多义性特征并不是任意的,其实它有其自身复杂的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理论表明:语言并非自主的,它源于人类的经验结构,与人类的认知结构关系密切,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的经验结构在语言的体现和反映。情态动词“must”的道义意义及其义务性的强弱的产生,认识意义及其主客观性的变化都有其认知上的动因,是人类对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动态识解的结果;情态动词的多个语义项之间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密切联系的,它们之间联系的基本方式便是隐喻。认识情态义是其根义(道义情态义)的隐喻扩展,或者说,情态动词的认识义的理解可认为是真实世界对认识世界和言语行为的反映。这是由于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者的内心世界往往是通过外部世界的语言来呈现,而且这种呈现方式往往与隐喻结构并行。

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它构成人们的概念系统的大部分,对人们语言的运用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隐喻成为情态动词多义性特征的来源。对于“must”,语言使用者在一般情况下要用它进行交际并不是很难的事。它的原型意义(根意义或道义意义)是“必须”,表达一种很强的义务性,体现说话者的权威性和指令性。但是在交际过程中话语双方的角色会发生变化,“must”的语义也随之变化。当说话者明显为情态力的发起者时,must 体现为“意愿义;当说话者明显是事件建议的发起者时,must 体现为“建议义”;当说话者明显是事件评估的主体时,体现的是 must 的认识情态力(推测义)。Must 这种多种语义的呈现就是认知主体根据 must 的根意义(道义意义)对不同语境做出反应后概念化的结果,这种概念化过程就是隐喻过程,或者说是从情态动词的根义到认识意义的语义投射过程。

(二)从情态量值视角来分析

情态是说话者在谈论事情时所持的一种态度或观点。Halliday 就曾指出情态是介于是(yes)和否(no)之间的态度^⑧,它包括模态化和意态化两个基本内容。就态度量值而言,在模态义中,它体现的是事件真实的可能性;在意态义中,它指的是受话者承受的来自说话者的强制性,情态动词的态度量值越高,强制性越强。情态动词的态度量值如果按等级划分,可以分为高、中和低三个级别。

情态动词的模态化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上则是情态动词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不确定到确定的量值变化,体现在情态意义上就是有不同量值的语义选择。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不同情态意义的表达就是不同量值的情态所致,是说话人不同态度的反映。要考察情态动词在语句中态度量值取向应从命题判断的认知因素方面来考虑。例如:Students must be dressed in school's uniform in school.这个例子中“must”从态度量值来分析,由高到低,must 的情态动词语义选择过程是“必须”——“需要(need)”——“得、该”,当说话者使用“must”的最高量值“必须”时,表达的是“学校的规约”的“不可违背性”,是强制的高值情态语义;当说话者的情态态度量值是中级时,体现的是情态语义的“需要”,表示的是“一种可商量的社会要求性”;如果

说话者选用“must”的低级量值,则表达“社会准允性”,强制性在这时是低程度,有相对的自由选择度。再如:Having left yesterday, he must have arrived there. 此例句是说话者对命题的真实性实现的可能性的猜测,是推测意义。如果说话者要表达“must”的高量值时,表明说话者很肯定自己的判断,其情态意义是“肯定,一定”;当说话者要表达“must”的中量值时,表明说话者对所谈之事不是太确定,只是表明应该到了,但到底到没到没把握,其情态语义为“应该”。当说话者的确定性最低,对命题的可能性预测最低,对是否到达完全只是猜想,一点把握也没有,情态的量值达到最低级,情态语义为:“该(也许)”。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影像,人类概念和推理的基础来自大脑。以上的分析表明,情态动词 must 的情态量值发生变化,其情态语义也随之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与人类的大脑思维、认知程度有关,受说话者内心态度的直接影响。这说明情态动词复杂的量值变化是经验态度的认知精准程度的反映,而语义选择的复杂性是认知复杂程度的体现。

四、结语

情态动词的语言现象是复杂的,情态动词语义的多义性辨析更是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本文从情态类型

和情态量值为视角,探讨情态动词 must 多义性产生的认知心理理据,讨论表明 must 的多义性特征是与人们的认知有很大关系,人类大脑的认知对其语义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情态动词 must 的量值变化是由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决定的。

参考文献:

- [1] 刘国兵. 认知理论对情态意义的阐释及在情态动词教学中的应用[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74-77.
- [2] 杨黎黎. 汉语情态助动词的主观性和主观化[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7:3.
- [3] 杨才英, 叶瑞娟. “必须”的语义特征及其主观化: 兼与“must”比较[J]. 外语学刊,2016(2):60-66.
- [4] ANTHONY W. English Auxiliaries - Structure and Hist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30.
- [5] DAVID D. English Historical Syntax: Verb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Longman, 1993:182.
- [6]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75.
- [7] 于翠红, 刘件福.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新进展[J]. 现代外语,2015(6): 834-839.
- [8] 牛保义. 英语情态动词 may 的情境植入功能研究[J]. 外国语,2017(3):12-22.

(责任编辑:白琳)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s Related to Modal Verb “Must”

LIAN Yan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learn and master modal verb, for modal verb is complex, and it is even more complex for “must” in its semantics. This essay has a general view about the semantics of modal ver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discusses about the semantics in “must”, which shows that “must” not only has various meanings, but also has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gene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must” has its own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sons.

Key words: cognition; modal verb; must; polysemy

论郭松棻小说的多重书写

唐铭康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郭松棻的小说创作为数不多,但却篇篇意蕴复杂,形成了左翼倾向、乡土意识和现代主义哲思三者相杂糅的书写形态。郭氏小说中“激进”的左翼倾向以一种“不介入”的姿态潜藏于文本的肌理之中,隐秘书写自身青年时期政治乌托邦的建构与失落。同时其小说中的乡土意识亦不可忽视,打破了国族与身份认同的圈囿,有着纯粹的乡土性质;而现代主义式生命苦闷外化为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以诗化的语言、隐喻的方式和“历史新编”的新模式书写着人世伦理的悲辛。丰富而杂糅的多重书写,使得郭松棻成为80年代初台湾文坛中不可多得的“难以被定位的作家”,为打破当时台湾文坛“乡土/现代”的二分局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郭松棻;左翼;乡土;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37-07

郭松棻作为台湾战后第二代重要作家,其文学生命之跌宕起伏引人注目:出身于台湾现代文学重镇——台大外文系,与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为同窗友人,专攻欧美文学及哲学,深受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对现实人生充满忧郁与倦怠。而后留美读博,却受反战的时代氛围影响成为激越的左翼分子,脱离现代主义式的虚无气质,积极参与保钓、统运等政治运动,发表多篇政论时论,并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学术焦点。之后政治理想失落,定居美国加州,罹患精神衰弱与抑郁症,故停止激越的政治反抗,重新投入文学创作,以多篇质地优良、极具个人风格的中短篇小说回归文坛,文字间更添想望故乡的忧愁与人生过尽千帆的透彻。

目前学界研究郭松棻的成果尚不多见,且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将郭松棻的创作按照以上所述的

人生历程的三个主要阶段进行分期,认为他参与保钓运动前的早期作品(以哲学评论为主)流露出现代主义的感伤与某些左倾存在主义的思想,参与保钓运动期间中期作品(以政论时论为主),充斥着浓郁的左翼色彩和社会主义理想。而后期的文学创作则被认为是脱离了前期颓废的现代主义与中期激进的左翼意识,反而转向历史与乡土,着笔于台湾这片土地上特殊的创伤与失落。

但是,如果为了廓清郭松棻前后思想的转变与位移,就这样将其小说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类型界定,是否反而掩埋了郭松棻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小说创作者的独特之处?他前半生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思想难道在他的小说中真的被“斩草除根”,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吗?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拟从分析郭松棻小说的多重书写入手,剖析郭氏小说的内在要素和外化形式之特征,从而发现郭松棻复杂变化的思想是如何通过左翼倾向、乡土意识与现代主义书写的有机叠加表现于他的文本之中的。

收稿日期:2018-06-28

作者简介:唐铭康(1995-),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一、战争遗痕与左翼分子的政治余绪

青年时代的郭松棻，受萨特的左倾存在主义影响，从颓废的思想困境里挣脱出来，行动上也逐渐左转。1970年保钓运动爆发之后，郭松棻放弃留美读博的目标，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暂时放弃了自己所钟爱的文艺创作，随后又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批判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左翼话语。这一段青年时期的政治实践和反殖反霸的文化抗争，让郭松棻洞烛了台湾的时代现实与欧风美雨的文化渗透现象，但同时这些实践和抗争的失败也让他最终归于现代主义式的困倦和寂寞，因此这份困倦与寂寞常常被认为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

虽然郭松棻在其小说作品中确实从未明确提到过曾经参与的这些政治活动与左派实践，但是深入其文字的密穴之中，亦可发现郭松棻早年的思想仍然像一只眸子般凝视着他的写作，隐微处亦可见他的左翼倾向，虽然这种倾向不再以我们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激进”情绪所引发，但这种“淡化”了的“激进”，却更能体现出郭氏小说中除了困倦与寂寞以外那份青年般的“愤怒”之存在。正如王德威所说：“由绚烂归于平淡，他们将过往的政治激情化为纸上文章，其跌宕沉郁处，非过来人不能及此。更重要的是，藉着文字的淬炼，他们展现一种老辣内敛的美学。这一美学两岸的作者无从比拟，因为包含了太多海外的情愫因缘。也藉着这一美学，他们以往激进史观、抱负后的幽微面，才渐渐显露出来。”^[1]

一方面，郭松棻善于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抓住战争期间小人物的生命际遇与时代脉搏之间的关联，以真实历史为背景，以人物的思想转变与命运发展为线索，或营造出政治迫害的恐怖气压，或揭露国民党政权的买办性质，或表达欲挣脱“新殖民”束缚的第三世界左翼立场，试图暗示自己深刻经历过的左翼台湾经验。

譬如，《月印》中怀揣着革命热诚的青年铁敏被国民党政治高压和白色恐怖迫害致死，《向阳》中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小夫妻最终只能每日陷入无休无止的琐碎争吵，《雪盲》中在社会喋声的文化环境下无法阅读鲁迅的小学校长只好选择自我放逐，《第一课》中盲目崇拜中国文革的犹太老教授最后在精神崩溃中走向疯癫……这些被历史漩涡无情吞噬的小人物作为作者的发声筒，在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政权纷争或文化高压之后发出精神上的一声低吼，随即马上被时代的大雪覆盖过去，这个世界又归于平静，平静得竟无一丝气息。郭松棻正是通过创造这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窒息感，将自己的激进与愤怒包裹进去，似乎随时要在这片“安静祥和”的外皮中爆发出来，但郭松棻的聪明之处在于反而不让它们爆发，而是让它们在内里猛烈地激荡冲撞，这份“呼之欲出”的悲愤更能让读者在感受到台湾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后，激发出内心对于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郭松棻早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曾认真思考过美日资本主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在1971年他发表的《打倒博士买办集团》等文章中，他就已经认识到美日买通了“买办集团”国民党，在台实行文化、经济等控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指出了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欺骗性和侵略性。这样深刻思考过的左翼理念一直以来都影响着郭松棻的世界观，即使后来他放弃了政治和哲学的探索，但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依然可以窥见这些“第三世界”左翼思想对他写作的影响。在《论写作》中，主人公林之雄在一场行为艺术发表会上，通过一个名为“花之圣母”的作品，唤起了长久以来不曾自觉的对于美帝资本主义文化殖民的厌恶。这个行为艺术作品是由一个全身赤裸的国外金发男子来表现的，他总是沉默地用刮胡刀刮剃着自己“喷张的阴茎”，然后“用手高高举起仍然壮大的那物，向会场的众人们无言的昭示，宛如高举着火把的自由神”^[2]。林之雄作为一个艺术生，对于这件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控诉意义心领神会：由男性来高举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女神”火把，且毫不顾忌

地袒露阴茎,正是利用巧妙的性别篡位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阳具特质显露无遗,而阳具特质的内核,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男性压倒女性的“父权社会”之间形成的同构关系,所谓的“自由女神”形象根本是个骗局,真正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特质的应该是“自由男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压制着其他形态的社会,就算是刚刚脱离殖民控制的台湾,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早已渗透进台湾本土的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方式的“新殖民”统治。

另一方面,郭松棻又不满足于仅仅把自己的左翼经验寄寓到虚构的人物之上,他需要自己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把曾经的所见所想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抒发出来,常常体现为鲁迅式的“看/被看”模式,作为“看”的一方,郭松棻对“被看人”的现状、变化和结果进行关照和反思,这一部分的小说常常相对明显地展露出他“暗潮澎湃”的左翼思想。《姑妈》中被看的姑妈,原本是早年守寡而一向腼腆的一个人,可是在留洋归来的“我”眼中,竟然变成了张口闭口打着官腔、处处搞着形式主义、处处迎合官僚作风的“演员”,然而顺着事件的抽丝剥茧,作者终于将姑妈性格变化的成因提至幕前,那就是“文革”的迫害:二舅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逼得上吊自杀,在死前留下“死不悔改”的四字绝命书。作者借姑妈之口道出“文革”真相:“这些年来大家都忙着揭别人的短,哪有时间做什么事。”

其实,郭松棻曾在留学时期期望过大陆的“文革”能带给台湾重建光明的希望,但在1974年访问大陆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文革”时期大陆社会的荒唐与凄惨,于是重建台湾的美好想象再一次破灭,这让他不得不反思,原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则并不如想象中简单。郭松棻既能像鲁迅一样拿起笔杆做武器,对“文革”中作为专制统治工具的伪善干部们进行冷嘲热讽,又能补充和突破了自己早年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思考着社会主义的出路,摒弃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和“文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他仍然信仰着左翼,对马克思主义寄予希望。除此之外,《草》中的“我”与怀揣家国抱负的神

学院学生、《奔跑的母亲》中的“我”与精神病医生廖医生、《秋雨》中的“我”与导师兼自由主义者殷海光,都在这样一种“看/被看”的书写模式中,被悄然赋予作者从过去的左翼经验里积淀而来的愤怒,这样的愤怒是无声的,但又是猛烈的,它存在于每一个“我”的眼睛里,存在于每一个被“我”看到的悲戚的生命里。

二、纯粹乡土与怀乡病人的记忆救赎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界内浩浩荡荡兴起的“乡土文学论战”几乎引起了当时大部分台湾优秀作家对“国族认同”“历史意识”与“台湾本土意识”等议题的思考和激辩。这本应该是一场只关乎“创作观念”的文学性讨论,“却在乡土文学批判被党和军方扩大到‘国军文艺大会’上,一时风声鹤唳,形势恐怖”^[1],于是台湾历史身世的复杂和分歧,在这场文学论战里,也逐渐演变成具有政治色彩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之间的攻讦,被这场激烈的政治化文学论争刺激过的乡土派作家如陈映真、王拓等人纷纷开始在创作中传达出自己鲜明的国族立场,使得当时台湾的“乡土文学”早已不具备从前那种书写故土风物与人情的纯粹“乡土性”了。这些身在论战漩涡里的作家,没有余暇去追悼历史的伤痕与家园的磨难,一心只为寻找出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身份的定位。

而在青年时代经历了激昂的保钓运动的郭松棻,对于具有政治色彩的事物已经颇感厌倦,并且彼时他已在美国定居,远离了台湾的文艺、政治纷争,因此与当时那些仍在台湾斗志高昂的乡土作家比起来,郭松棻小说中的“乡土性”显得更加原初而纯粹。他以一个异乡人温情悲悯的故园记忆,开垦出了一片超越国族、地缘、身份认同与文化背景圈囿的救赎之地,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生活记忆与历史流变只与他无法痊愈的怀乡病有关,而没有掺杂其他任何家国抑或身份色彩。

郭松棻的出身地——大稻埕,这个地方是当时台北的经济文化中心,台北所发生的一切现代化和集权

化的改变几乎都可以浓缩到这片土地上,而这些改变所带来的生活上的跌宕也因此让郭松棻对故土的回忆更为深刻,恰如他所言:“二二八时我九岁,小学三年级,我家就在延平北路附近,林江迈的摊子现在我都还可以指出来,所以对我而言,当时不用多加思考,那生活自然而然就在我脑子里。二二八前后的枪声,中山堂全给王添丁等人的‘处理委员会’占据了,我记忆深刻。因为那是自己成长的年代,不用费心去构思。”^[4]大稻埕作为郭松棻的记忆发源地,正如宜兰之于黄春明、花莲之于王祯和、温州街之于李渝,已经成为具有郭氏个体感性经验的独特地景符号。

郭松棻多以大稻埕作为自己小说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的背景空间,不仅仅是以真实生活经验重现一部分历史真相,更是在点燃自身对于故园乡土的温情记忆。乡土记忆再现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再现,譬如《月印》里常常以战争事件与家园变故的相互缠绕为焦点,拉开一幅如在眼前的大稻埕巨变图景:

天上的飞机俯冲下来,一只只从屋顶上掠过去。响了解除警报以后,发现高射炮台被炸了。不久,B-29出现在台北的上空。高高飞在云端里的机群震撼着屋里的每一片玻璃窗。听说中学生都要入伍了,只待征兵令一下,他们就统统是红砖兵。^[5]

战争最后一年,从林口飞机场起飞的队伍里,听说已经有台湾人的志愿兵充当神风队。那个时候,有些家属全家做恶梦,半夜闹鬼的事突然多了起来。^[5]

郭松棻常以这样极其纪实的语言复原记忆中家乡的现实战争氛围,不掺杂评论和感慨,书写方式近乎白描,以至于凡是触及到战争语境的话语,都似乎突然变得冷静而克制。而对于战争发生前后家乡风物风情的描摹,郭松棻却能将语言诗性地发挥。不管是对于乡人乡景的描摹:

太太则记得战前迪化街的热闹。亭仔脚水货堆积如山。唐山来的。金钩虾,江瑶柱混着麻油香。在五花

八门的招牌下,她,一个台中林家的家庭教师,坐在手车上像一阵风穿过了街心。吃了真珠粉长大的。一身细皮水滑的千金。^[5]

还是对于生活细节的回想:

中学时代的化学课,由日本先生带着,全班坐着火车去玻璃工厂参观。工人吹着长棒。棒的另一头是一团火球,冷却了就变成玻璃瓶。

工人爬在屋顶上。窃窃笑出声来。从顶上看着他们兄妹两个人睡一张床。

躺在床上,透过蚊帐,她也可以看到他们。

中午。工人并不下来。他们坐在屋顶上吃便当。和天空那么接近。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风卷去。荡得很远。好像隔了一个世间。^[5]

郭松棻乡土记忆里的情感内涵又始终是温情的,虽然包含了怵目惊心的二战阴影与无可奈何的人情变迁,但流于笔端之时,诗化的语言淡化了肃杀的历史,使巨大的历史浩劫化为已经结痂的伤痕藏于离散后的个人化写作里。郭松棻的旅美处境,使得他在晚年遥望故土的时候,更多了一份“失意者”的哀伤。于是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也被置于这样的国族异境之中,传递出他“直把他乡作故乡”的苦楚。而这份流落异乡的苦楚越深,他的台湾记忆就显得越温情动人,纵然那片土地早已伤痕累累,但却是一个“失意人”记忆深处永远的眷恋。

于是在他的小说里,也常常通过对“异乡人”失落生活的想象来反衬故土的原乡意义,这些失落的异乡人形象实则投射的是郭松棻自我的心理况景与怀乡情结。比如《论写作》中的画家林之雄一生为艺术潦倒,在美国学艺几年,毫无成就反而对绘画失去信心,同时对于自己究竟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美国这样的异族环境里更加被放大,在面对异国风雪之时,才会倍感流浪之艰辛,故土之温暖。因此,“在故乡,他是愉快的。这一辈子,他的日子

从没虚度。在杂乱的街道,骑车奔驰,他知道自己是个有福的人。这念头在他的胸口堆得高高的。”^[2]郭松棻无意创作所谓的“离散文学”,他所关注的并非在两个不同国族环境下人的心理变迁与生存体验,而仅仅是把诸如美国这样的“异乡环境”作为一个简化的背景,凸显主人公生存困境的荒芜与孤独,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种荒芜与孤独召唤出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乡土记忆,因此无论是市井人生还是历史命运、无论是战争纷乱还是伦理纠葛,郭松棻都用他纯粹而温情的“乡土性”凝视着个体记忆里那个久远的原乡。

三、精神困境与现代主义的书写语调

台湾学者陈芳明在《现代主义及其不满》中指出:“自乡土文学论战以降,现代主义就受到极大的误解。在那段硝烟弥漫的过程中,有人刻意把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割裂成两个阵营。经过那场论战后,似乎乡土与现代被迫站在两个对立面,这是对艺术精神的最大错误解读。在文学史上,乡土与现代其实是可以互相流通,互相对话的美学。”^[6]郭松棻的作品,完全可以为这段话做出证明,左翼倾向与乡土意识的存在,并不影响郭松棻在他的创作中贯穿现代主义的哲学思索,以及使用晦涩破碎的现代主义书写技巧。

郭氏小说的现代主义书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上被中国文化融汇过后的现代主义哲学,二是艺术范式上受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影响而形成的独特语言风格和形式,这正与上世纪我国现代派诗人总结的“中国式”现代主义的特点不谋而合——“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最终建立一个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哲理、机智等知性因素)相综合的新传统。”^[7]

第一,郭松棻小说的语言是诗化的,破碎的,不关注逻辑建构,并把“剔除白腻的脂肪,让文章的筋骨峭立起来”当作创作律令,试图以最具骨感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现代主义式的荒凉和孤独。郭松棻在《向阳》

中就写道:“日常语言是畸形人格的塑架。谁要获得自由,谁就得从那种语言解脱出来。话虽这么说,然而我们还剩下什么可说的呢?我们用什么语言来阐述事件呢?”^[2]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一段叙事性的文字常常被解构得像一首诗,句与句之间仿佛断裂,这样的断裂不是单纯为了使语言简约而具有诗韵,而是让读者意识到:当一件事情只用寥寥几个短语就可以表述的时候,人生的苍白与孤独,才能通过语言文字无声地表现。

比如,形容夫妻俩倦怠而永无休止的争吵:

他们都是狂热的信奉者。对共和政体由衷地不亲近。他们不能随和。他们各持己见。^[2]

形容朋友之间的初见:

他偶尔抽动着眼睑。那是前一夜的失眠。你们开始了友谊。你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你们睁着眼睛躺在一起,望着天花板直到天亮。^[2]

形容老人过马路的情景:

突然马路很安静。他从遥远的地方醒了过来。一切回到原有的景象,眼前已非往昔。对街还是那群裸着胳膊打节拍的年轻人,阳光仍然照花了他的眼,把他和世界隔开。^[2]

“骨感”的文字之下,是孤独荒凉的现代主义哲学内核,一切的人世体验,都在孤独荒凉的外在状态和个体反抗孤独荒凉的内在状态之间结合,而人类便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动态结合当中被碾压、被拉扯与被控制。郭松棻不直接诉诸于表情达意式的语言来传达自己历经过历史巨变与病痛折磨后的生存哲思,而是化繁为简,以最凌厉轻便的“诗化叙事”来承载这份沉重的绝望。

第二,大量使用隐喻象征、心理独白、时空跳跃、

记忆拼贴、意识流、寓言式的创作技法,也是郭松棻小说中体现浓郁现代主义书写语调的一大力证。

郭松棻常常将“梦境”与“记忆”进行交叉叙述,“梦境”指代潜意识里的真实内心活动,“记忆”指代现实生活中曾存在过的心理缺失,两者交互存在的时候,亦真亦幻亦实亦虚,让人分不清楚现实人生的真实模样。于是,郭松棻便这样取消了“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现实就是破碎的梦境,梦境即是重组的现实,在这一层面上消解了人生“真相”的必然性和可靠性。在《奔跑的母亲》中,“梦境”里的母亲总是年轻的、总是奔跑着的,而现实中的母亲却是佝偻的、早已入土为安了的,而当文中的“我”寻求心理医生治疗的时候,竟然已经分不清究竟哪个“母亲”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母亲,从而对俗世间产生了“该向你跑来的,她却离你而去,该离开你的,却又要奔跑而来”的荒诞与反讽之感,人生处处充满着这样的悖论,一味寻求人生的“真相”终究只是徒劳。

郭松棻小说中那些具有隐喻意味的地点或场所,作为主人公活动和生存的空间,往往象征着人类自身难以走出的现实困境,“他最擅经营的其实是一种法西斯蒂的冷酷异境,狭小如《机场即景》中窒凝的机场,浩瀚如《雪盲》中的美西沙漠,郭松棻的世界是天地不仁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艰难的找寻沟通,最终必须退缩到蚕蛹般的自闭空间,一径蕴积着救赎的思考,百不可得。”^[10]诸如此类的空间隐喻还有很多,《今夜星光灿烂》中陈仪被枪决的马场町、《奔跑的母亲》中的母亲走过的路与桥、《月印》中文惠日思夜想但再也不回不去的大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沙漠”作为郭氏小说最典型的空间隐喻,承载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荒凉、空寂与孤独之气质,它暗示着主人公们同样荒凉孤绝的“精神异境”,但主人公们生存下来的事实也同时也表明着某种存在主义式的自我抗争,正如《雪盲》里写到的:“电视屏上出现一种蝌蚪般的甲虫,硬壳下无数毛须般的细脚在水中畅游。干渴的季节里,它们知道如何埋入砂土,把自己保护起来。”

第三,郭松棻还独创了一种将历史传奇与现代主

义哲学相杂糅的叙事方式,即择取历史漩涡中心的关键人物,进行“历史新编”,由各种历史题材翻转文本,反思时代大环境下人和历史的荒诞不经。郭松棻的这种以真实历史素材为基而写就的小说与一般所谓的“历史小说”又有所不同。童庆炳先生对“历史小说”进行了定义:“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构筑艺术世界的方法既非完全的虚构,也非完全的复制,而是根据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寻找历史根据,以艺术想象重新建立‘历史世界’。”^[11]可以看出,“历史小说”的关注点在于将历史艺术化处理,通过重建历史来展现历史进程中某些被忽略的现象,因此“历史小说”的主轴仍然是以围绕历史而形成的大叙事书写。但郭松棻却意不在此,他对还原历史真相和艺术化处理历史故事毫无兴趣,他的目的是将历史背面零散的记忆进行重组,创造出一种源于“史实”但又超离“史实”的理性世界,这就体现了他即使在面对历史题材时,依然热衷于使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忠实于个体的、零碎的、超越时空的生存体验的表述。

不管是《今夜星光灿烂》里以陈仪(“二·二八”事件的“祸首”)为原型的将军,还是《落九花》里以仇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为原型的女主人公,他们都被从历史的神坛上拉下来,放置于具有当下指认的现代生存处境中,完成每个人都“生来迷茫”的思考使命。比如将军的传奇战争故事被消弭,历史翻案并不重要,而被处决之前那一段软禁时日的凡人的挣扎和痛苦,才是作者想要体察的关键,是作者试图打开人生哲思的出口。当战争的冷酷紧张从他的心里暂时平息,他从窗口望见这个世界最平凡的样子,他感受到的是平静而寻常的归属感,是为最善意的陪伴,这突然让他醒悟:“多少年的征战和主攻,他没有一刻感到拥有自己的生命。”于是他在人生最后的孤独、历史恒久的荒凉里获得了一点救赎,获得了一点生存的尊严。

综上所述,虽然郭松棻的小说创作为数不多,但却篇篇意蕴丰富,形成了左翼倾向、乡土意识和现代主义哲思三者相杂糅的复杂形态。郭氏小说中暗藏着“激进”的左翼倾向,但在经过早年政治实践的淘洗与

沉淀之后,以一种“不介入”的姿态潜藏于文本的肌理之中,隐秘书写自身青年时期政治乌托邦的建构与失落。同时,乡土眷恋与故园创伤也是其作品不可忽视的一面,他笔下的乡土打破了国族与身份认同的圈囿,是一片“纯粹乡土”。而现代主义式的生命苦闷始终存在,且外化为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以诗化的语言、隐喻的方式和“历史新编”的新模式书写着人世伦理的悲辛。多重书写形成的笔尖交响,使得郭松棻成为80年代台湾文坛中不可多得的“难以被定位的作家”,为打破当时台湾文坛“乡土/现代”的二分局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德威.冷酷异境里的火种[J].郭松棻.奔跑的母亲[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4,6.
- [2] 郭松棻.郭松棻集[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436,68,357,473,53,37-38,201,265.
- [3] 陈映真.回顾乡土文学论战[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2):79.
- [4] 舞鹤.不为何为谁而写:在纽约访谈郭松棻[J].印刻生活志,2005(7):51.
- [5] 郭松棻.奔跑的母亲[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17-18,38,176.
- [6] 陈芳明.现代主义及其不满[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4.
- [7] 袁可嘉.从浪漫诗到现代诗[J].世界文学,1989(5):293.
- [8] 童庆炳.重建·隐喻·哲学意味:历史文学作品三层面[J].社会科学辑刊,2006(6):209.

(责任编辑:白琳)

The Multiple Writing of Guo Songfen's Novels

TANG Mingk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ass Medi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Guo Songfen's novels are few, but the contents of his texts are complex, which forms the multiple writing including the left wing criticizing, the na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modernist philosophy. In his novels, the "radical" left-wing criticizing is hidden in the texture with a kind of "no intervention" to write the construction and loss of political utopias in his own youth.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uma of the hometown of his novels can not be ignored. His rural writing has broken the circle of national identity, so it is a "pure native novel". And the modernist thinking always exists in his novels,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is modernist writing technique, which writes the tragedy of human ethics with the poetic language, metaphor and a new pattern called "the new history". The multiple writing made Guo Songfen a rare writer who is hard to locat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aiwan in the early 80s, 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break the "native / modern" situ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aiwan at that time.

Key words: Guo Songfen; the left wing; rural writing; modernism

论家庭教育对身份构建的影响

——以李健孙小说《支那崽》《荣誉与责任》为例

王倩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从黄祸至模范少数族裔,美国华裔身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作为华裔文学中最为普遍的话题之一,身份探讨长久以来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然大多数评论家将目光放在了关于历史、文化、心理、社会等对身份构建的影响,很少有人注意到教育在其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虽然一些教育专家也进行了关于教育对身份构建的研究,但是多数仍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作为李健孙的开门之作,《支那崽》从一出版就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其第二部作品《荣誉与责任》却少有人问津。将两部作品结合,通过观察丁凯这一主人公在中西两种文化夹杂的困境中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可怜小子成长为一位西点军校军人的成长历程,试图探索家庭教育在其身份构建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支那崽》;《荣誉与责任》;身份;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44-06

身份构建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的过程,受到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随之变化而变化。对自我的认识从幼年到青少年一直至成年期间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化。“(稳定的)身份并不是自动生来就有的。相反,身份从幼年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反思与观察而不断地变化”。^[1]“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该去往哪里?”一直以来都是华裔美国作家作品中所不断探索的话题之一,李健孙尤其是如此。生母的去逝,辛伯父的疏远、父亲的冷漠,白人继母的到来,都给成长在这一复杂家庭结构当中的李健孙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从《支那崽》到《荣誉与责任》,与其说这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自传。主人公丁凯在一下复杂的家庭背景下,所接受到的家庭教育也因此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教育或西方教育,而是二者的杂糅交互。

教育作为影响身份构建的关键因素之一,历来被华裔美国人认为是通往美国主流文化,摆脱歧视与偏见,获得财富,实现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有效途径。“许多来自于不同社会背景的亚洲移民认为,教育是他们向上攀爬、获得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对那些“在工作场所遭遇各种种族主义歧视的人来说,更是把教育视为他们的保护伞”^[2]。家庭教育作为对个体影响最早同时也是影响最深的教育之一,因此在个体的身份构建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母、伯父以及西方主流文化的父亲及继母之间教育方式方法的交锋也给小说的主人公的丁凯在身份构建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生母和伯父——传统中国文化的守卫者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强调“人性、心灵和思想都伴随着上天赋予的内在美德。这些美德需要通过后天不断地学习来培养,(因此)学

收稿日期:2018-01-08

作者简介:王倩(1987-),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习对自我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为了保存传统的文化并将其加以传承,几乎所有的华裔父母都希望把自身所有的关于故土的记忆传递给孩子。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丁凯无疑成为家庭教育的核心,生母和辛伯父因此承担起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

(一)生母戴丽的教育

美国对于大多数初次踏上中国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地方,关于过去在中国的一切仍然被他们铭记于心。过去对他们来说就是难以割舍的根。“第一代中国移民是以一种寄居者的心态暂住在这里……渴望回到故土是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4]与传统的被“所处的社会里儒教迫使只能唯唯诺诺,低声下气”的女性不一样,在凯的记忆里母亲像是“索菲娅·罗兰或安娜·马格奈尼,被汹涌澎湃的生命冲动所激动”,她敢于反抗长辈并涉猎几门外语和欧洲音乐。^[5]虽然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女性,但母亲仍坚信自己是中国人,仍然难以适应美国这一陌生的国度同时也不愿意与异族文化相融合。美国对她来说就是地狱,“有朝一日,我的独生儿子,我们将回到扬子江畔”^[5]。戴丽非常重视教育,因此她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对丁凯的培养上。通过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学作品、书法、节日等,戴丽逐渐的把关于过去的一切都灌输到丁凯的头脑当中。通过生母,丁凯了解了中国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了解了家族的起源,了解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忠诚、孝道和责任,了解了汉字的发音及书写,了解了中国是个注重社交、注重群体的国家,了解到清明节是“一个祭祀祖先的日子。中国人在葬礼中使用白色,他们和死者说话”^[5]。在短暂的一生当中,通过持续不断地传输中国文化,戴丽在丁凯的族裔身份构建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戴丽生前不断地将有关故土的未来输送给凯,才使得凯在日后迷茫跟困惑的身份构建当中重新发现,重塑自我成为了可能。

(二)伯父的指引

辛成功,这位前中国学者及明代诗歌的哀悼者,在戴丽死后成为丁凯的精神之父,负责完成戴丽生前

未完成的对丁凯的教育。在《儒家思想:中国传统及普世文明》一书中 Lionel M. Jensen 认为“在西方,儒家思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是他们的民间宗教、官方祭祀及智力传统的代表”^[4]。

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辛成功非常注重孔子所强调的道德:顺从、责任、孝道、家族荣誉等理念。在这个母亲缺失的家庭,辛成功向凯传达了责任和孝道的重要性“孝敬父母是我们肩上的重担,没有任何梦幻般的飘柔”。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生都得携带的“巨石”,“你永远抗不起也永远放不下”^[6]对于中国人来说,纲与伦紧密联系,形成了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二者相互结合给予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辛认为保存过去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片没有宗族维系我们的异国他乡,我们保持一成不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更大的热情来尊重过去对你的教诲”^[6]。没有了关于过去了记忆也就丢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根,也就落入了绝望当中。“克己复礼”(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也是辛向凯所传达的重要信息之一。

在这个“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祖先牌位”的社会^[5],辛成功这个孤独的老人拒绝乘坐西方化的电梯,拒绝佩戴象征着变化的手表,他像是“枯树上最后一片残叶,在异乡的风中飘零”^[6]。与戴丽一样,凯对于辛成功来说是新中国的希望,是他关于过去的唯一记忆,“你—你看起来就像是家”^[6]。维持并传承中国文化,对于辛成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但是必须完成的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才使得他在异国他乡度过了无数的漫长凄惨的夜晚。

母亲的离世几乎带走丁凯关于中国文化的记忆,但是辛伯父的教育又在凯的族裔身份构建中指明了一条道路。在忘记与回忆之间徘徊,凯的身份构建之路注定不会平坦。“当遭遇危机,原本固定的、一致的、稳定的经验被怀疑和不确定性取代时,身份问题才会被提起”^[7]是接受美国主流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美国身份还是中国身份使凯陷入了困惑。但是在之后的生活中遭受更多的苦难与歧视之前,凯的这一困惑仍然模糊。

二、父亲在丁凯身份构建时产生的影响

文化永远不能在真空中传递而必须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普遍看来,亚裔父母由于对故土的思念以及在新世界感到的不安全感与疏离感而不断地向后代输送关于故土的文化。但是与其他亚裔作家笔下的父母不同,丁国凡,作为凯的父亲不再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而是竭尽所能的融入主流社会,成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倡导者。

(一)被同化的父亲影响下的身份构建

Robert Park 认为同化是“个体或群体在不断地渗透与融合的过程中获得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而(最终)融入共同文化”^[8]。一方面,生活在一个外敌强大,内部混乱的旧中国,丁国凡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失去了信心。另一方面,在诺曼·施瓦泽德(美国文化的代表者)的影响下,丁认为美国是一个远离破败、落后、迷信,被西点军校所保卫的美丽国度,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牢固的传统”^[5]。

为了彻底地与中国文化决裂,丁没有搬到唐人街,而是举家迁入了锅柄街区,一个远离中国人的街区。他拒绝庆祝中国节日,拒绝说中文、拒绝让他人为自己服务以此显示自己融入美国文化的决心。甚至在戴丽去世之后,丁为了进一步的融入主流文化娶了一个美国女人。

父母作为孩子的最早的老师,他们对故土及主流文化的态度对于孩子的身份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了生母的保护,凯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在同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当被辛伯父指责他不应当兵时,凯并不赞同。在他心里“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和爸爸一样。我要去西点军校,一个只接纳地道美国人的地方”^[6]。

(二)传统文化失败的传播者

在美国,丁国凡不再是唐人街的名人,不再是战斗英雄,而仅仅是对白人继母对凯的暴力规训置若罔闻的“被阉割”的父亲。不管凯多么渴望从父亲那知道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他得到的永远是沉默。因为父亲

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失职,丁凯在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困惑。

丁凯身上之后出现的对父亲的不尊敬,对被赶出家门的姐姐所表现出的冷漠,对生母的遗忘,对黑人社区的依赖以及与辛伯父关系的疏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缺乏了对过去的了解,失去了根。Salman Rushdie 认为“根是一种将我们留在故土保守的神话”^[4]。正是丁国凡对过去的隐藏使得凯感觉自己在这片充满白人的土地上像一个飘荡的鬼魂。正如 Ogbu 所说“群体的文化教育模范来源于群体文化价值与教育方向以及父母融入主流文化的模式之间的互动”^[3]。在这个母亲缺失本该由父亲承担起传递家族历史,保护根基的使命的家庭,丁国凡作为父亲的失败直接导致丁凯在之后的日子里身份构建中的困惑。

(三)父亲的期望

“亚裔移民的父母通过对孩子抱有较高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9]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期望附加到孩子身上,父母旨在“激发孩子为获得教育成功方面所要求的决心”^[3]。在传统的中国,个人的命运与家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一荣俱荣。

不管丁国凡多么渴望真正的成为美国人,但是在这个充满歧视与偏见的国家,他仍然是个外人。Takaki 认为不管在这个国家呆多久,我们客人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仍然被视为来自彼岸的陌生人、外国人”^[3]。即使丁国凡抛弃了所有:他的军队、职业、家庭,即使他极度地渴望融入美国社会,他仍然被主流文化拒之门外。因此,作为唯一的男孩,凯承担起了夺回荣誉的重任。被西点军校录取是凯以及丁国凡爬上美国阶梯的最后一丝希望。成为美国人,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丁国凡,这个在异国土地上孤独的失败者的荣辱紧密相关。

丁国凡的自我同化,拒绝追溯过去,以及他对儿子的期望无一不使得凯在美国同化之路逐渐前行,与故土却渐行渐远。

三、继母——终结者与惩罚者

与传统的地位相对低下的中国女性相比,艾德娜,这位作为主流文化的代理人已经代替了丁国凡成为了这个悲惨家庭的真正主人。在丁凯眼中,这位毕业于英语文学专业的继母的到来打破了戴丽生前所创造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她来我们家就像德国兵列队开进巴黎,对征服有十分把握,并且为镇压抵抗作好了一切准备”。^[5]自此,艾德娜承担起了改造、教育这些古怪的中国家庭里孩子的任务,丁凯尤为如此。

(一)语言教育:禁止说汉语

正如语言学家 Wittgenstein (1969)指出“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维系社会关系方式之一。Cheris Kramarae, Muriel Schulz and William M. O'Barr 认为,语言是作为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无意中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地位。Gudykunst and Ting-Toomey 认为语言“可能是导致族裔身份构建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10]。因此,语言作为身份象征之一无疑成为了首要的教育目标。在这片异国土地上,汉语这种外来的奇怪的语言不再有立足之地。与用面庞进行交流的生母不一样,艾德娜用“舌头和嘴唇”进行交流。她完美的英语发音“使我望而生畏”^[5]。这个“古怪”的中国家庭自此成为了“巴别塔”。

艾德娜经常被凯古怪的汉语发音惹怒“我不能容忍这个家里每个人说话的方式!”起先我还以为她是指我姐姐的英国口音,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所说的“每个人就是我”。对她来说,汉语是一种“野蛮人的语言”,是“导致贫困和与世隔绝的东西”^[5]。只说英语是艾德娜塑造丁凯美国身份的第一步。在美国“说英语已经成为‘少数族裔’及他们的孩子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关键手段”^[10]。“不要和我说话,除非你准备说英语”。^[5]通过采取各种限制及惩罚措施,艾德娜成功的改变了丁凯的说话方式。丁凯逐渐了忘记了生母,忘记了汉语,而像他真正的白人母亲一样只说英语,只读英语的书籍。在他之后去西点的日子里,英语好甚至成为了他的优势之一。“关于语言的记忆对于第二

代及之后的移民更加的重要”。^[10]关于族裔语言的记忆在族裔身份的构建起到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汉语的忘却,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丁凯在族裔身份构建道路上的前行。

(二)情感教育:摒弃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

McIntosh (1988)认为,“白人被教育成认为他们的生活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正常的、普通的同样也是理想化的,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工作的任务就是使他人受益,使他人变得‘更像我们自己’”^[2]。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艾德娜将自己标榜为改革者。艾德娜坚信如果不摒弃与过去相关的一切,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成为美国人。为了把凯关于过去的一切记忆删除,艾德娜破坏了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东西。家中禁止提起戴丽,她甚至烧了装有相册、中国的钢笔与墨水、汉语书籍及承载着所有关于生母与过去记忆的板条箱。“记忆是展现自我赞赏与政治意愿一种革命方式”。^[11]在艾德娜的教育之下,凯在族裔身份构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反而逐渐地向美国身份构建靠近。

对凯来说,艾德娜破坏性的行为及情感的武器不仅仅局限于破坏东西及禁止谈及过去,同样还包括一些惩罚性行为“你没有整理你的房间吗?好。看见这个模型飞机吗?嘎吱一声踩碎了把你脸上的表情收起来!啪的一记耳光。嘎吱一声踩上救火车。因为没踩碎,她又用力踩了一脚。啪的一拳,我对你说了手肘要离开桌面”^[5]。面对破坏与惩罚,凯感觉到无助。他的勇气与活力像被撕成碎片的玩具而慢慢的破碎。暴力的惩罚带给凯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心灵上的折磨。这种折磨使他逐渐失去了谈及过去的勇气。

张静认为,“食物是身份构建过程中的性格形成的一种文化象征”^[4]。对凯来说中国食物不仅仅是美味的象征更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延续。与为一家人准备美味饭菜的生母不同的是,艾德娜厌恶厨房以及做饭,对她来说,中国食物连猪都不会吃。艾德娜的到来终结了中国食物的出现,在她看来,要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就不能被文化冲突所困扰,就得摒除以吃为核心的中国家庭文化。自此,整个家庭就经常只有

土豆、泡菜、清水煮笋瓜。

“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通过了解自己的过去而知晓自己的未来……明代诗人说用记忆来衡量一个人”。^[6]通过抹除关于生母的记忆,禁止吃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食物记忆烧毁含有珍贵记忆的板条箱,艾德娜将凯脑海中所有与过去相关的一切全部消除。在整合阶段,族裔群体中的个人“以主流群体的视角看待族裔问题的利弊”^[2]。在艾德娜的情感教育下,生母在凯的心目当中不再是那位温柔善良的母亲而是“迷信守旧,完完全全的宗教狂,一个疯狂的一字不识的基督徒”^[6]。

(三)行为教育:接受与美国相关的一切

情感的出现总是伴随着行为。行为是“与文化或族群相关的能够表达身份的行动”^[12]。行为教育因此不可避免的成为情感教育的补充手段。与禁止凯接触社区,防止其同化的生母相比,艾德娜认为,想要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就必须与外界接触。因此,把凯踢出门外被提上了日程,只有在听到口哨声后,凯才可回家。不管凯如何的哭喊,门始终处于关闭状态。严苛近乎残酷的惩罚导致凯之后为了在社区生存下去只得违背了生母和辛伯父所强调的“和”采取了打架的暴力手段。

艾德娜凭借着自身的傲慢与优越感维持这这个古怪的中国家庭的秩序。对凯来说,中国人“吃起来乐淘淘喜滋滋,像狮子一样吃得旁若无人津津有味。中国膳食的目的就是吃,它并不是吸引大量观众的竞技活动,吃的主题就是漫长的一天劳累之后无拘束的消遣,中国膳食准备时是一门相当复杂的技艺,但吃起来却是简单轻松的庆典”^[5]。与传统的充满欢声笑语的中国家庭餐桌不一样的是,艾德娜所存在的餐桌“禁止说话,禁止嬉笑。笑者格杀勿论……椅子就这样放。桌布上不准有褶皱”^[5]。只要出现任何差错,尖叫声及巴掌就会紧随而来。甚至是凯的面部表情,这一从生母那遗传来的非言语传统也被艾德娜进行了规训。不管事情大小,只要是违背了美国规则都会被艾德娜终结。“主流话语通过下定义、定位、命令的方式确定了自身的地位”。^[13]通过“措辞高雅,语音纯正

而显然又是杀气腾腾的话”以及特有的“扇、踢、啪”,艾德娜从语言、情感和行为上对凯产生了影响。最终,凯忘记了如何说汉语、失去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一切记忆、转而接受了美国的规则。

艾德娜在凯的身份构建当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成为西点军校的一分子之后,凯甚至承认“她是我的母亲,真正的母亲。她教我学英语,我的亲娘不是很好”^[6]。艾德娜教育几乎消除了丁凯所有有关过去的记忆,他忘记了对母亲、辛伯父的承诺、忘记了对姐姐应尽的责任。他不再是瘦弱的支那崽而是有着粗犷的声音、健壮的身体的美国士兵。艾德娜的美国式教育再加上同化父亲的引导,凯逐渐的对自己的中国身份产生怀疑进而而逐渐的与美国相融合。

四、结论

家庭教育在凯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身份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生母与辛伯父关于过去的输入,丁国凡的自我标签,对凯的期望以及传输过去上的失败再加上继母艾德娜在语言、情感和行为上的惩罚与规训都在凯的族裔身份的构建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生母的去逝、辛伯父暂时的远离,使得凯在族裔身份的形成上产生了困惑,进而慢慢地与美国主流文化相融合。但是,之后随着姐姐的归来、辛成功的回归,艾德娜的去逝、凯被西点军校开除种种事情发生之后,凯的族裔身份构建又发生了变化。华裔身份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凯的族裔身份构建之路也注定不会平坦。

参考文献:

- [1] ERIKSON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M]. New York: Norton, 1968: 62.
- [2] ATKINSON D, ATKINSON M, SUE D. Counseling American Minoritie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 California: W.C. Brown Co.,1983: 16-233.
- [3] PARK C, GOODWIN A, STACEY J. Asian American Identi-

- ties, Families, and Schooling [M]. Connecticu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2003: 4-137.
- [4] 张静. 华裔英语文学中中国性的再现[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156-206.
- [5] 李健孙. 支那崽[M]. 王光林, 叶兴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6-246.
- [6] 李健孙. 荣誉与责任[M]. 王光林, 张校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34-246.
- [7] WANG L L. Identity -building in Toni Morrison's Trilogy: *Beloved*, *Jazz* and *Paradise* [M].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 [8] TAJFEL H, TURNER J.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M]. Monterey: Brooks-Cole, 1979: 23.
- [9] LOUIE V.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of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EB/OI]. (2012 -2 -20)[2013 -5 -13]. <http://www.hfrp.org/publications-resources/publications-series1>
- [10] PHINNEY J, et al. The Role of Language, Parents and Peers in Ethnic Ident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Immigrant Families [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1 (2): 135-153.
- [11] 陈爱明.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52.
- [12] PHINNEY J, ONG D.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Social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7 (3): 271-281.
- [13] 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8.

(责任编辑: 白 琳)

Identity and Family Education—On Gus Lee's *China Boy* and *Honor and Duty*

WANG 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1)

Abstract: From “yellow peril” to “model minority,”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change. As one of the most pervasive topic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has been noticed by critics for a long time. To interpret this phenomeno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ave been adopted, like historical,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ones, but few attention are paid to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formation.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me researches about the role of education, most of them focused on some limited samples gained from the qualitative methods. *China Boy* as the debut of Gus Lee, since the publication has received great interest at home and abroad. Yet only a few concerns are obtained by his second book *Honor and Duty*. This paper tends to combine these two novels togeth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of Kai Ting, the protagonist, from a scraggy little boy to a strong West Pointer in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dominant culture.

Key words: *China Boy*; *Honor and Duty*; identity; family education

后藤新平与日据初期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

倪霞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日据初期,总督府的第三任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为了稳固殖民统治,利用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开展所谓社会教化活动。打着导入日本“文明之风”以期革除台湾的陋习的幌子,主要通过举办几场的“慈善音乐会”,隐性“逼迫”台湾士绅现场捐赠巨额资金做“慈善”活动,这样不仅有效地拉拢、捆绑了台湾精英阶层成为其统治网的层层触角,起到稳固殖民统治之功效;还在整个社会最贫困的时期,最大限度地掠夺、压榨了台湾民众的资源,这充分暴露了其殖民统治的本质和欺骗性。

关键词:后藤新平;日据初期;妇女组织;殖民统治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50-06

后藤新平(1857-1929),出身于德川幕府末期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是跨越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官僚、殖民扩张主义政治家。于1898年3月2日至1906年11月13日,在台湾总督府担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民政长官,由于儿玉源太郎常年在侵华战争的前线,在总督的信任与授权下,后藤新平实际行使总督特权,集军事、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对台湾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统治台湾的“政绩”让他直上青云,归国后曾担任递信大臣、外交大臣、东京市长、帝都复兴院总裁、满铁总裁以及两任的内务大臣和三任的铁道院总裁等职,天皇赐予“男爵”“伯爵”称号。

一、台湾实施殖民教育的社会背景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拥有殖民地台湾的国家,但由于日本没有殖民地统治经验,“以暴制暴、以武力征服”的统治思想使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更加活跃,台湾社会陷入愈加混乱的局

面。总督府统治台湾耗资巨大,尤以军费支出为甚。1895年度总督府统治经费是从日本中央国库临时军费特别会计中支出的,总额高达2789万日元,相当于一般会计岁出总额8531.7万日元的33%。1896年度总督府的统治经费改由一般会计中支出,是1814.3万日元,约占一般会计岁出总额10688.06万日元的11%。^[1]1897年度开始实行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但岁入不足的状况依然严峻,在该年度预算的岁入额1128万日元当中,有596万日元是从清朝的赔偿金支出的,约占预算额的53%。台湾财政年年岁入不足,且军费逐年增加,三年多来一直依赖日本国内的经济援助,这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刚起步阶段实力尚不雄厚的日本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看不到殖民地统治前景的日本内阁官员甚至起意,以1亿日元把台湾贩卖给法国的论调。^[2]

为了转嫁这个负担,1897年3月日本内阁第十次会议上通过《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该法案的宗旨是以台湾的岁入来维持台湾的各项费用,要求台湾总督府增征税收并承担征税的任务。这引起台湾人民的强烈愤慨,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起义不断。在台湾殖民地统治最危机时刻,1898年后藤新平追随儿玉源太郎到台赴任,担任民政长官,由于儿玉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间多,在儿玉的授权下,后藤真正行使着总督的特

收稿日期:2018-07-23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FJ2015B129)。

作者简介:倪霞(1976-),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据时期殖民统治的研究。

权。为构架殖民统治模式,后藤新平迅速对台湾的旧制、土地资源、人口构成状况和民俗风情,进行大规模而又细致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对台湾的统治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并开展一系列的基础工程建设。在文教方面,后藤新平除了沿袭伊泽修二遗留下来的教育模式,欲通过日语作为同化的桥梁,消灭台语瓦解台湾文化实现移风易俗目的的“渐进同化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关注社会教化方面,巧妙地利用刚刚兴起的三个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以达到其稳固殖民统治、掠夺台湾经济的目的。

二、后藤新平对台湾殖民教育的整体观点

关于在殖民地台湾如何实施教育的观点,赴台前后藤新平向日本内阁提出的《台湾统治救急案》中明确指出:与西欧统治殖民地方式不同,日本没有像“十字架”那样的力量可以同化殖民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基督教的力量成功统治了殖民地人民。比起攻伐,宗教的‘抚育感动’更经济更能统摄民心。^[3]对日本而言,缺乏对台湾殖民地进行移风易俗、同化当地民众的这种宗教力量。因此在开拓殖民地事业时,必须寻求其它方法来弥补宗教上的缺陷。1898年5月25日,刚赴任的后藤新平向总督儿玉源太郎进言:“教育一日都不可忽视,但茫然注入文明,新附之民会形成权利义务之思维,对统治不利。目前要深思熟虑教育方针政策等问题。”“众所周知,由于风土人情迥异,欲征服他邦异族,扩大殖民版图获得利润,唯以同化政策教育我国之台湾岛民。”^[4]

因此,医者出身的后藤新平用生物进化论原理,得出“比目鱼与鲷鱼的眼睛不同”的观点来解释其主张。他认为台湾人的文明程度低,思想滞后,用差别统治是顺利推进统治的要领。让台湾人太早懂得先进的文明会促使民族觉醒引起独立运动或叛乱。对日本而言,缺乏这种宗教的力量对台湾殖民地进行移风易俗,同化当地民众。在开拓殖民地事业时,必须寻求其它方法来弥补宗教上的缺陷。后藤新平说:“20世纪的新舞台完全属于殖民竞争的时代。”以文明代替宗教来同化台湾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普及日语以及社会教化来灌输日本精神,从心理上威慑台湾民众,培养忠

诚于殖民母国的臣民,以达到掠夺台湾经济富源的最终目的。其意图就是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台湾人进行殖民性质的奴化教育,再适当导入日本的文明开化的成果,从思想上震慑台湾民众,更有利于总督府的殖民统治。实际上,后藤新平在社会教化这个环节,有效地导入日本“先进文明开化”,利用在台的日本妇女组织,从而实现了既移风易俗又巧妙地敛财的阴谋。

三、后藤新平利用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

根据《台湾妇人慈善会记录》,自郑成功之后台湾社会就自发组织了一些慈善机构,举行一些公益仁爱活动。日本据台后,总督府控制了这些机构,没收了各机构所属的财产。1899年4月,台北县知事(相当于市长)的夫人联合在台居住的四十多名日本妇女,接受日本红十字会的指导,自发组成“日本红十字会·笃志看护妇会·台北支会”,这是台湾最早成立的日本妇女团体。由于“看护”一词在日语中即“护士”的意思,因此“笃志看护妇会”就是护士协会的意思,主要从事卫生、医疗方面的服务。支会成立前,台北县知事夫人力邀后藤新平的夫人和子担任支会长,但后藤新平严词拒绝了。因为远在台湾的后藤新平关注着日本国内的海军与陆军派系之争,他担心自己的夫人加入这些社会组织,会卷入政治漩涡,日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由此可见,后藤新平最初并不看好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怀着警惕的心理冷眼旁观其活动。

20世纪初期,日本国内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已有三十多年,不但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崇尚西方,甚至社会各阶层受西化思潮影响都非常深刻。例如民权运动引发的女权意识萌芽并发展,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地位有所提高;在国家主导“南进政策”的侵略方针下,进行了全民总动员,日本的妇女们也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这股“爱国”旋风也自然吹到台湾来,“笃志看护妇会”在台湾四处招募成员,利用自身的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协助总督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给在台的日本人和台湾本地人一些帮助。虽然最初与台湾本地人语言不通,但是当时台湾卫生环境差,医疗条件落后,疾病瘟疫困扰着台民,威胁着他们的生命。“笃志看护妇会”伸以援手,拉近了统治阶层与台民的

距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之后1901年“爱国妇人会”在东京成立,翌年在台湾分设支部。“爱国妇人会”在台湾岛内募集资金、会费及慈善救护设备及准备金等,与“笃志看护妇女会”开展了一些社会活动。

受日本国内文明开化风气的影响,在台的日本妇人们带来了新风尚。她们完全不同于当地台湾妇女,衣着时髦、思想前卫、行动自由,这些都是当时深受封建思想深居简出的台湾妇女们渴望而不可求的事情。这两个独立的日本妇女团体在东京总会的指导下逐渐开展活动,除了自发组织慈善募捐、音乐会、解缠足等社会活动外,更组织读书会呼吁在台的日本妇女不仅要当贤妻良母,更要有爱国心,为国家做实事奉献自己。凭着职业的敏感,后藤新平对“爱国妇人会”的活动,感觉到这是一支可以为殖民当局利用来稳固其统治的力量。因此后藤新平对在台的妇女团体从冷眼旁观马上转变为积极支持的态度。

“笃志看护妇女会”与“爱国妇人会”这两个团体在日本都有总会,其活动内容可以“望文生义”,一目了然。所以后藤新平绞尽脑汁想另辟蹊径,创立一个与众不同且有“意义”的协会。在后藤新平的主导操纵下,1904年10月成立了“台湾妇人慈善会”,其夫人和子亲自担任会长。这样,台湾共有三个妇女团队,即“笃志看护妇女会”“爱国妇人会”及“台湾妇人慈善会”。其中,后藤新平最关注也最用力扶持的是“台湾妇人慈善会”。他利用职权甚至要求月薪在50日元以上的官吏回家后劝说自己的夫人入会,要求在台的日本妇女为这个“慈善”团体发挥各自的力量,为日本总督府稳固在台的殖民统治做出“积极而有意义”的贡献。

“台湾妇人慈善会”的成员们通过各自方式动员台湾本地精英阶层的妇女入会。在她们各种软磨硬泡、威逼利诱下,实业家林献堂的母亲、蔡莲舫夫人、辜显荣夫人^①等几十位社会上流的台湾妇女加入该组织,捐钱捐物,所以该妇女团体的人员数量激增,实力大大增强。由于这些台湾妇女属于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她们不仅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这三个妇女团体的活动内容和活动范围也逐渐增大,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

后藤新平把妇女在家庭中的功能转换到国家层面的功效上,企图为总督府的殖民统治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其授意下,和子夫人同时担任这三个协会的会长。和子夫人定期在三个团体的会员中进行演讲,阐述自己的家庭观、国家观。“从家庭层面上看,女人在家庭生活中中扮演贤妻良母型的角色、担负着贤内助的使命;从社会和国家社会层面上看,更应该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下一代,而且要为国家的需求做出伟大的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5]在此处,和子夫人所谓的“国家需求”就是日本内阁与陆海军一直争论不休的“南进政策”和“北进政策”的问题,总而言之都是在为侵华战争做准备。

后藤新平与其心腹长尾半平、高木友枝密谋商量及周密安排,在“台湾妇人慈善会”刚成立一周后的1904年10月21、22日,“台湾妇人慈善会”就迫不及待地在台北荣座举行了首届“慈善”音乐会,广发请柬邀请台湾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盛况空前。后藤新平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他曾留学德国,对西欧先进稀奇事物感兴趣。为了能成功举办第一场“慈善”音乐会,引起社会轰动效应,他对每个细节都亲自审核。当天音乐会现场布置极尽奢华,要求出席“慈善”音乐会的日本男子必须穿礼服或燕尾服,女子穿和服;音乐会现场使用当时稀奇的西洋乐器演奏流行的音乐;并提早派长尾半平从美国购回照相机、胶卷,拍下现场活动的场景,日后洗出照片进行宣传等。这种利用媒体的意识是当时多数人连想都不曾想过的问题,可谓殚心积虑、手段高超。

总督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和一些夫人出演轻歌剧,或让平时尊贵无比的总督府官吏的贵夫人们担任服务员,为客人们端茶递酒,周到细致地服务。这即使是在日本内地也是颠覆旧习俗的做法,对于参加音乐会的宾客,无论是总督府的大小官吏还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台湾名流而言,能享受到如此的服务真的是一种无上荣耀与骄傲。

正如后藤新平在《殖民政策之一斑》中所说:“对未开化的台湾人,要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观念,首先利用奇淫巧计让他们充满好奇,是最自然诱导的一种捷径。”音乐会现场与当时烽火狼烟、破败不堪的台湾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从未见过的西欧礼服、稀奇的乐

器和从未听过的优雅歌曲以及时髦的照相机。更让到场的台湾人不可思议的是“授受不亲”的男女竟然可以一起登台演出歌剧,女子都没有缠足,平日里高贵无比的总督府官员的太太们可以低声下气屈尊当服务员,到场的台湾士绅名流太太们对此“先进文明”惊讶不已。

长衫马褂与燕尾服,洋酒和高脚杯,西洋乐器与西洋音乐,精美的点心与圆舞曲,总督府官员出演的活人剧(话剧),妇女可以不用缠足自由出入、男人不用留着长辫子等等,音乐会现场注入的新元素让台湾旧文化与日本新文化在这里冲突碰撞,极大刺激了人文思考。

后藤新平安排的一个重要环节把“慈善音乐会”推向高潮,那就是在现场进行演讲时,说明本团体的活动内容,例如关注台湾妇女缠足问题、女童接受教育问题、居民饮用水净化及医疗问题,资助贫民问题等,诱导现场的参会者捐款。在“慈善”的旗号下,总督府官员的日本人带头捐赠财物,到场的台湾名流或碍于面子或出于某种动机也纷纷慷慨捐赠。正如1905年12月23日在东京,后藤新平与两个慈善会负责人高木、长尾半平总结的“慈善音乐会”的经验谈一样:“关于这事,没想到会募集到如此多的资金。虽说也有一部分人持怀疑态度,但总而言之对未开化之民施以奇淫巧计,让其感到新奇是同化诱导之捷径。当场付2000日元巨额捐资的当地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夫人和子组织的首届慈善音乐会获利相当可观。收入总金额高达10644.94日元,除去各种费用1435.81日元,还剩余9209.13日元的纯收入。捐赠给日本陆军海军恤兵部、“台湾笃志看护妇女会”、“台湾爱国妇人会支部”共计1700日元,剩余7509.12日元作为“台湾妇女慈善会”基金使用。台湾名流士绅所捐金额在这些巨额捐赠中占了7成左右。^[4]当时公学校学费一学年才10—20钱,但很多家庭却负担不起。公学校教师一般月工资在8—12日元之间,普通劳动者或农民的收入更是微薄。^[5]

毫无疑问,关于继续通过举办慈善音乐会的方式敛财的手段是后藤新平谋划到的一个新渠道。尝到甜头的后藤新平紧接着在1905年7月11—12日,又继续在台北荣座分别举行第二次慈善音乐会,1906年6

月7—8日第三次举行。为募集资金,各地官厅与妇女团体联手合作,模仿台北的模式在宜兰、基隆、新竹、桃园、台中、彰化、南投、斗六、嘉义、盐水港、台南、凤山、阿猴、苗栗14个厅分别举行慈善音乐会。官厅负责邀请当地地主、士绅,妇女团体安排音乐会内容。

后藤新平为了纪念自己成功举办的这些“慈善音乐会”以示荣耀,以及表现出“亲台亲民”的安抚怀柔举措,亲自创作《新高山》《世界之友》两首歌曲,送到美国灌制成卷带,各制作48套,分别送给总督官邸、国语学校、台北小公学校以及台湾各地共20个慈善会分部。当时这音乐卷带在日本内地已是十分稀罕物了,更何况在落后的台湾。由“慈善音乐会”刮来的时尚之风奢靡全岛,引发新兴文化与保守文化之争。

在1906年后藤新平离职之后,“台湾妇人慈善会”终止活动,“笃志看护妇人会”与“爱国妇人会”合并,继续经营。1908年10月,财团法人组织接管三个妇女组织时,会计统计仅存1300多日元。^[7]巨额资金在后藤新平离任前或捐赠给陆军、海军用作军备资金或以某种名义挥霍殆尽。

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也相应地做了一些慈善活动。例如救助贫民,建设北投浴场,建设平和街道(街道名称取自后藤新平与和子夫人的名字)等。另外,尤其在社会教化方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首先,她们强烈倡导“断发、解缠足”,对深居简出的士绅阶层的女性注入了“文明的空气”,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当时台湾社会有要求女子缠足的恶习,以罗敷裙下露出的三寸金莲为美,以变形的三寸金莲走路姿态为“摇曳生姿”,这种变态的审美观不知迫害了多少缠足女子的身心健康,女子终日闭门在家几乎足不出户,更谈不上体育运动锻炼身体了。而同时代的日本国内女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些关于女性问题的观点经常刊登在《台湾教育会杂志》上,“笃志看护妇人会”与“爱国妇人会”引进、传播这些内容,例如积极宣扬该杂志连载的“贤妻良母教育观”。除了宣传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外,还强调要注重母亲健康的重要性,那样才能诞生健康智慧的婴孩,同时还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运动,强身健体。因此,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大力倡导废止缠足的恶习,宣传“解缠足”的必要和意义,对解缠足的妇女进行奖励并给予医药费用补助。

日据初期,台湾人对新来的暴虐的日本统治者充满恐惧感,对一切都充满惊愕与怀疑。“解缠足运动”刚开始时,守旧的台湾人反对这种不守老祖宗规矩的举措,散布可怕的谣言,整个社会笼罩在紧张恐怖的气氛中。后藤新平利用组织中的台湾妇女巧妙周旋,到街庄中进行有力宣传、思想安抚,具体说明“放足”后如何有利于妇女身体健康、遇到灾情如何可以轻松逃生、今后可以参加社会劳动等问题,让台湾的部分妇女,尤其是名门贵族女生先相信这些事实,然后成为文明文化的代言人和运动的先锋,缓和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安抚了民心,而这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削弱了台湾民众对抗殖民统治的作用。

四、结论

日据初期,总督府里政法专业出身的政治家们以及出入战场的士官们对新征服的殖民地台湾采取“以暴制暴”的武力方式来统治台湾民众,导致社会愈加混乱,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百业俱废,民心涣散。尤其总督府为防御台民抗日而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依靠日本内阁财政拨款来维持对台统治,日本国库吃紧,怨声载道。

当第三任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到任之后,从其医者出身的职业角度分析台湾民众的人性弱点,施以手段利用在台的三个日本妇女团体开展社会外交与文化教化活动,让外表、举止温文尔雅的在台日本妇女与台湾名流、名媛交往互动,让他们在接触交流中潜移默化改变对日本统治者的态度,增加其认同感,获得台湾精英阶层的认可,营造“和善安稳”的氛围,逐渐拉近与台湾人的心理距离,在交往中导入日本“文明开化”的内容与新思潮,进而企图达到了文化同化的目的。

这三个日本妇女团体实际上听命于总督府,受总督府控制,把稳固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作为最高指示,为其服务。她们打着导入日本“文明之风”以期革除台湾的陋习的幌子,在台北等重要地点发起“解缠足”“去辫子”“学日语”等活动,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思潮、新事物。随着与当地台民交往的逐渐深入,妇女团体的一些新兴思潮确实也影响了部分思想前卫

的台民。继而后藤新平与下属心腹们谋划着利用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组织,以“慈善”的名义举办多场新潮的“慈善音乐会”,通过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盛情邀请”认识的台湾有钱阶层的名媛、士绅来参加,社会上兴起以被总督府邀请为荣的风气。当然,对于极力想接近统治阶层的部分士绅来说,音乐会不仅仅只是一时满足他们附庸风雅、爱慕虚荣的心理,更是直接给他们提供接近当权者的机会。对于心理上抵抗日本统治、不接受日本文化、一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部分士绅来说,是进退两难的痛苦选择,也有许多士绅拒绝参加。

后藤新平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音乐会现场安排举行的捐款捐物“慈善活动”,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变相敲诈勒索活动,台湾的士绅们也心知肚明。对于极力想接近日本统治阶级的士绅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捷径,是权利交换的路子。他们“明白事理”迫不及待、为出风头地大笔捐赠的表现行为,企图给在音乐会现场的后藤新平等执政者留下深刻印象,在殖民统治的权势中分得一小羹勺得到一点利益。例如,后藤新平把鸦片、食盐、樟脑专卖这三大专卖权分散给台湾的名流士绅,形成金字塔式链接,把他们纳入殖民统治系统,共同构建有利统治的社会关系网。突出的例子就是每次捐赠首屈一指的辜显荣,从后藤新平那里获得了鸦片、食盐、樟脑烟草、矿产等资源的专卖权,通过这些专卖权,辜显荣从台湾老百姓身上收到丰厚的资金,除了缴纳给总督府的收入资金外,还有大量盈余;其接近统治阶层获利颇丰,与日本人合资在台南种植甘蔗、开办最大型新式制糖厂,资产迅速膨胀,事业如日中天。人性往往是趋利避害,类似辜显荣的士绅大有人在,有许多亲日的中下层人员削尖了脑袋只苦于没有门路没有机会参加“慈善音乐会”,接近统治阶层。

对于善于用狐狸的手段达到狮子的目的的后藤新平来说,利用在台的日本妇女团体组织“慈善音乐会”或其他各种活动,其最终目的就是隐性“逼迫”台湾士绅现场捐赠巨额资金做“慈善”活动,收敛台湾精英阶层手头的资金。在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最贫困的时期,这样的手段不得不说是极其“高明”“毒辣”的,最大限度地掠夺、压榨了台湾民众的资源。这些出自台

湾本地人的血汗钱用于台湾本土的慈善事务是极其有限、而且少得可怜的,例如修缮了和平街道、修北投浴场等零星项目。后藤新平利用这些巨额资金,不仅充实了总督府的财政及军费开支,购买武器应对台湾抗日游击队等,而且还大方地捐赠给日本侵华陆军,修复原本与陆军恶化的关系,这相当于是用台湾人的钱整备起侵略中国的武器装备,为日本的“南进政策”搭桥铺路;后藤新平经常回日本,与内阁搞好各层人情关系,吹嘘自己治台“政绩”,为自己归国后的高升铺好路子;捐赠金中部分被后藤新平用于修建宏伟壮观的总督府官邸等。后藤新平在任中利用在台妇女团体进行的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拉拢、捆绑台湾精英阶层成为其统治网的层层触角,收割台湾的经济富源并起到稳固殖民统治之功效,可谓一箭双雕,充分暴露了其殖民统治的本质和欺骗性。

注释:

- ① 林献堂(1881-1956)出身望族雾峰林家,台湾政治家、诗人,民族运动先驱,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台中中学校之创办人之一。蔡莲舫(1875-1936),名占开,号雪桥,日据时期

台湾中部的仕绅,台中中学校之创办人之一。辜显荣(1866-1937),鹿港人,日军侵台,单身一人出城延请日军进入台北城,与后藤新平交好,日据时期是台湾总督府的得力拥护者。1934年被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

参考文献:

- [1] 明治财政史三[M].明治财政史编纂会.东京:昭和 12:882.
- [2] 春山明哲.后藤新平与台湾[C]//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九州出版社,2010:451.
- [3] 後藤新平.台湾協會設立に就いて所感を述ぶ;台湾協會会報(第2号).东京:台湾协会,明治 31:5.
- [4] 鶴見祐輔.正传:后藤新平 3 台湾时代[M].东京:藤原书店,2005:59-60,465-467.
- [5]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一卷)[M].东京:後藤新平伯伝記編纂会.昭和 12:61.
- [6] 教育史料汇编与研究[M].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台湾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2001:507.
- [7] 台湾妇人慈善会.台湾妇人慈善会报告 1908 年[C]//殖民地社会事業關係資料集·台湾編.台湾台北:2001:259.

(责任编辑:白琳)

Goto Shinpei and the Japanese Women's Group in Taiw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I 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Goto Shinpei, in addition to implementing the school-based assimilation policy of popularizing Japanese in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has also taken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 an attempt to paralyze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he psychological and improve the old habits of Taiwanese society by introducing "the wind of civilization" of Japan. He mainly used women's groups under the banner of "benefit concert" to force the elite in Taiwan to donate huge amounts of money, and drew the landlord class in and bind them to make them become the tempters of the conical rule so that he could stabilize the colonial domin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how Koto Shinpei used the Taiwanese women's groups to amass money and used the landlord class to become their tools to dominate the Taiwanese people, exposing his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ception.

Key words: Goto Shinpei; early day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women's groups; colonial rule

古江黄史考

陈亚琳

(中原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古江黄两国存于西周至春秋前期,随着楚国北上、中原争霸的进程加快,同为嬴姓淮夷的江黄两国惺惺相惜,通过战争、联姻、联盟等多种方式与其他诸侯国共同抗楚。但由于国力差距悬殊、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国最终相继为楚所灭。两国虽因弱小而终灭,但在400多年求生存谋发展的岁月中,促进了淮夷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繁荣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江国;黄国;淮夷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56-04

西周初年,江国与黄国受封于周王朝,江国的封地在今河南省正阳县一带,黄国的封地在今河南省潢川县一带。公元前648年楚人灭黄,其后不久,在公元前623年江国亦为楚国所灭。两国同为淮夷,相携发展,共同抗楚,一起在淮河流域存在了400余年。他们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当时淮夷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和地区的开发,也增进了当地与中原、楚地文化的交流融合,研究两小诸侯国史,有助于丰富战国前期地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研究。

一、江黄之族源

(一)源起

江国和黄国皆为嬴姓,《史记》载有:“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黄氏、江氏……秦氏。”^[1]《世本》也说:“江、黄皆嬴姓国。……淮夷,嬴姓……”^[2]关于嬴姓的始祖,史载为伯益,是少昊氏的后裔,伯益是有名的圣贤之人,带领部族人民开垦荒地,管理山川林木,深受爱戴和尊重。禹在位时看到伯益有贤德

之才,想举荐伯益为下一任首领,为了避免贤贤相争,伯益在箕山隐居躲避。禹的儿子启继位后,感念伯益的功绩和高尚的品德,就封伯益为费侯,其封地在山东费县。

(二)立国

先秦时期活动在山东一带的伯益后人,和同处于东方的一些部落一起被统称为东夷。《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夷有九种,曰畎夷……黄夷、白夷……阳夷。”^[3]在商代,商王朝与东夷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竹书纪年》载:“帝相元年……征淮夷,三年征风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4]为了躲避战争,东夷部落频繁南迁,部分人南迁至淮河流域,后人称之为淮夷,其中就有江国和黄国。西周初年管叔、蔡叔串通武庚,伙同东夷叛乱,管、蔡大军被平定之后,周公奉命东征讨伐淮夷。《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作为淮夷成员的江、黄两国,由于在这场叛乱中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而没有被讨伐。战乱平叛之后,为了巩固局势稳定人心,分封江、黄这两个异姓淮夷为子爵诸侯国,江国和黄国至此安定下来。

二、江黄之兴衰

作为姬姓周朝统治下的异姓诸侯国,江国和黄国

收稿日期:2018-04-17

作者简介:陈亚琳(1994-),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专门史研究。

并没有受到周王朝太多的关注和关怀,从受封之初就生活在筹谋自身发展与调养生息之中,逐渐寻找机会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历史发展至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野心开始膨胀,特别是生活在南方荆蛮之地的楚国也意图在中原大地有所作为,淮河流域不少诸侯国都卷入了这场乱世争霸的纷争之中,最终皆为楚国所灭,江国和黄国也没有逃脱如此厄运。

(一) 兴盛

江黄两国受封的淮河流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业生产环境相对优越,生产技术相对发达,适合调兵养息,耕作居住。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给江黄两国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两国逐渐站稳脚跟,相继发展起来。其中黄国还在淮域众多小诸侯国中,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尚处于较强位置。已发掘的黄君孟夫妇墓和黄季佗父墓中,曾挖掘出大量的铁器、玉器、精美的织物,这些上等器具和物品都可以说明黄国一定的实力。两国虽为周王朝异姓小国,却也逐步在淮河流域兴盛起来。但是国之繁荣,离不开社会的稳定,到了战乱纷争的春秋时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江黄之兴盛注定不会长久。随着楚国争霸一方野心的膨胀,江黄两国小有的繁荣,随即成为楚国眼中猎物,被列入征伐计划之中,江黄两国在这场历史的纷争之中,逐步为楚所灭。

(二) 灭亡

《左传·桓公八年》载:“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鬻章让黄。”公元前704年楚国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广邀诸侯国于沈鹿会盟,唯独黄国和随国没有参加,为了在诸侯国面前树立威严,楚国出兵伐随、黄。由于楚国兵力强盛,先随军大败,楚、随两国签订了盟约而后退兵。黄国由于离楚国郢都尚远,且有随国做了前盾,才在缝隙之中得以保全。楚文王与成王时期,楚国力日盛,先后伐随、申、蔡,灭息、邓,这时的江国和黄国,也开始坐立不安人心惶惶。公元前675年楚人攻黄,“伐黄,败黄师于碛陵”。没有了邻国和邦国的庇护,这次征战使得黄国元气大伤,国力损耗巨大。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江国,或许由于与楚国的联姻,少了一场损耗国力的纷争。

楚人的野心日益膨胀,江黄小国为求自保开始寻

求自己的联盟。于是公元前658年江黄两国同时参加了齐国主持的以伐楚为核心的会盟,“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9]首次参加会盟的江人和黄人得到消息后欣然往之,于是“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9]。得到了齐国的庇护,成功加入北方集团。次年,江黄两国又再次参加阳谷会盟:“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9]前656年,中原联盟大军发动了攻楚、蔡的战役,楚国迫于寡不敌众,与中原联军会盟于昭陵,随后中原诸侯联军退兵。第二年楚军卷土重来,出兵弦国。弦国自恃与黄国、江国都有着联姻的关系,所以对楚国放松了警惕,在与楚军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毫无悬念地于公元前655年被楚国所灭。“江、黄、道、柏……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9]邻国受损,唇亡齿寒,这时的江黄两国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公元前650年,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这次伐黄,黄国受到了致命之击,楚人于公元前648年灭黄国。而此时的江国,也到了危难之时。楚成王去世之后,楚穆王并不看重与江的联姻关系,于是江国和楚国之间的亲戚缘分也至此告一段落,在楚穆王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23年,江国终为楚人所灭,江黄两国就此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当江国的盟国君主秦穆公知道江国被楚所灭时消息时,就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9]这不仅是秦穆公在感叹盟国遭难,自己无力相救,更是在拿江国的遭遇来勉励自己,只有国力强大发展迅速才能战胜楚国,才能在乱世之中谋得一席之地。

三、江黄之文化

生活在淮河流域的江国和黄国,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而其本身带有淮夷文化的因子,又融合了新流入的楚文化的影响,使得两国的文化丰富而多彩。正是由于各诸侯国文化上的交流与碰撞,江黄两国逐渐形成了强国强兵、崇尚武德、贯通南北、兼容并蓄,邦交联姻等多元文化特点。

(一) 尚武

黄国在淮域诸小国中,军事文化较为发达。在河南光山的黄季佗父墓中出土的“铜剑(含鞘)、铜戈(含

木柩)、铜箭(含羽杆)等兵器,制作工艺精美,并且十分锋利,在春秋早期兵器中均属上乘^[7]。这些都是黄国自身军事实力的展示,也体现了黄国文化中崇尚武德,强调军事本领的特点。也正因如此,黄国在面对强敌楚国时,才有了不恃楚的资本,在《左传·僖公十二年》中就有说道:“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后为楚所灭。”^[8]这也正是与淮河流域其他诸国相比,江黄两国灭亡稍晚的原因。

(二) 联姻

江黄两国文化也表现出联姻的特点。春秋时期上层社会中奉行着一种有媵婚制度,一国嫁女,出嫁的女方家里会铸有青铜器,供女方在男方家里使用。而在媵器上的铭文,多为女方家庭对出嫁女的祝福,代表着出嫁女身份。这种媵婚在本质上,带有邦交的特点,不仅为国与国之间合作交流提供方式,在春秋时期的频繁战乱之中,也是上层社会家与家之间相互依靠共同生存的手段之一,江国和黄国也有相关用于联姻器物的出土。现出土的“叔姬簋”铭文云:“叔姬霁迁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嫁媵器……子子孙孙其永用之。”^[8]是曾侯为了爱女叔姬嫁往黄国所媵器,“邛”通“江”,郭沫若先生认为:“邛,当作江黄之江。”^[8]说此器为曾女适黄,楚女适江,曾侯所作媵器。而曾侯所在为随国,这个器物的出土也正是给随国和黄国的共同联合抗楚的事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再如江国曾与楚国联姻,延长了其灭亡的历史。

(三) 兼容

在战争中的联合不仅形成了黄国与北方大国之间亲密合作关系,更是促进了国与国之间在文化上的交流。现已发掘的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紫铜色铜器,制作工艺精美,色泽也是稀有高贵,在春秋早期流行的青绿色铜器中,显得尤为珍贵。其中“出土的紫色绣绢和‘绢纺’……极为珍贵的标本”^[9]。而在当时,“紫绢”是齐国的国色,黄国和齐国共同联合抗楚,这紫色织物有极大可能是从齐国流传而来。可见,正是由于黄国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贯通南北的特点,才更好地争取到了与北方强国合作的机会,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是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纽带。

江黄两国不仅在出土文物上和其他诸侯国有着

联系,在墓制形式上也是融合着中原和楚文化的多种因素。其中黄国墓和代表中原文化的虢国墓,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虢国墓的棺槨有两种形式:即单棺重槨和一棺一槨。黄国沿用这种形式,黄君孟墓为一棺一槨,而黄夫人墓为单棺重槨。”^[10]而且黄国墓采用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墓制,是黄国融合了楚墓中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制和中原习俗中“墓而不坟”的传统下的首创,体现了黄国文化包罗万象,融会贯通的开放性,同时也是黄国文化中先进性的体现。

受封于西周初年的江国和黄国,是豫东地区鲜有的淮夷一族,两国同宗同源共同受到来自强楚的灭国威胁。面对外有强敌,内有危机,国力不堪的种种挑战,两国紧紧相依,先后参加中原大国的抗楚联盟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与随国、弦国等相邻的诸侯国通婚来巩固抗楚防线。同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中,不断带来了新的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文化特征也从外来的东夷文化,融合成包含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多重文化。在两国生存发展的400余年中,不断通过和其他诸侯国进行邦交,联姻,或者战争等多种方式,努力在乱世之中维持着自身的稳定,促进着自身的发展,虽然最终的结局是以失败为告终,但是其抗楚的决心不减,给同时期其他的诸侯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江国和黄国的兴衰演变,是两周时期社会动荡下的必要产物,也是各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交融的必然结果。两国从发展兴盛到受楚所灭,是作为淮夷自身发展局限性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潮流奠基者的最终结局。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7-150.
- [2] 宋衷.世本[M].张澍,集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47-48.
- [3] 范曄.后汉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815.
- [4] 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59.
- [5]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46-47,278,290,357-358.
- [6] 春秋谷梁传(十三经本)[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889.
- [7] 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J],考

- 古, 1989(1):26-32.
- [8]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165.
- [9]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J], 考古, 1984(4):302-332.
- [10] 裴明相.论黄与楚、虢文化的关系[J].汉江考古, 1986(1):43-50.

(责任编辑:冯起国)

Research on the Jiang and Huang States

CHEN Yalin

(School of Marxism,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7)

Abstract: Ancient two states, Jiang and Huang, which lived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Chu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for hegemony in the Central Plains, both Jiang and Huang, who were surnamed Ying, pitied each other and jointly resisted Chu through several ways, such as, wars, alliances, marriage, etc. Due to the disparity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 two countries were eventually destroyed by Chu, because of their weakness.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Huaiyi culture,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the Chu culture in the past 400 years, eventually,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Jiang state; Huang state; Huaiyi

共享经济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

田 樱

(阳光学院 金融与贸易系, 福建 福州 350015)

摘 要:选取 2004-2016 年我国范围内的旅游共享经济数据,以旅游总花费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和短租自驾作为衡量旅游共享经济的指标,利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三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会促进分享住宿交易规模的扩大;短租自驾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共享经济;旅游共享经济;分享住宿;短租自驾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60-06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十三五”的五大理念。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充分肯定了“共享经济”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业态,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激发创新创业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新经济业态,已连续两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其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2016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已达39450亿元,并以76.4%的高增长率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共享经济规模可达GDP比重的10%以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将突破城镇既有的服务承载能力,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老年人具备的大量闲置资源必然要通过共

享经济激活,因此共享经济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补充。

一、共享经济与旅游共享经济

(一)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也称为分享经济,其英文翻译均为Sharing economy。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早在1978年已提出共享经济的概念,指出共享经济是一种协同消费的形式^[1],鉴于此概念是在互联网出现前提出,因此并不属于现代共享经济的范畴。现代共享经济的概念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更新换代出现的,但目前关于共享经济的定义还没有定论。共享经济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为核心价值目标,是改善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整体协调发展的要求。《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2017》将分享经济界定为: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2]这个概念几乎涵盖了协同经济、协同消费、共享经济以及对等经济活动等所有内容,可以将其看作共享经济的广义定义。本文将以此概念为基础进行分析。

收稿日期:2018-06-15

基金项目:2017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课题“互联网+”战略下福建省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研究(JAS170643)。

作者简介:田樱(1980-),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相较传统经济活动,共享经济活动表现出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的“三低”利好和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的“三高”优势^[9]。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共享经济和新经济新业态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消费便利性和资源共享性的需求,对于贯彻落实“培训新增长点”发展理念、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构建信息时代国家新优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情况看,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网民大国红利、节俭文化的成功实践也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二)旅游共享经济

旅游共享经济,是指旅游资源的供给方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源共享以满足旅游需求方需要的一种经济模式,其特点表现在“重使用权共享、去中心化、不产生大量沉没成本”的轻资产化、非标准化、跨文化的社交和体验、面向生活性服务业各领域的强渗透性、碎片化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大数据提供支撑基础、易获得高估值和减少能源消耗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共享经济自身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与旅游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近几年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共享经济的问题。其中,曹丹(2017)分析了共享经济对旅游供给方、需求方和中介的影响,提出由旅游业有关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共享经济平台,共同构建旅游共享平台及监管体系的思路^[10];雷海东(2017)提出“互联网+旅游”共享经济的背景下,改善潮州旅游经营现状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相关建议^[11];罗云丽(2016)提出旅游业已成为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发展共享经济需要信用体系、政策法规以及信息技术保障的支持^[9]。以上研究基本集中于共享经济对传统旅游业的影响,以及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针对旅游共享经济领域的实证分析均没有涉及。

传统旅游业包括“食、住、行、游、购”等各方面,旅游共享经济在以上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而在“住”和“行”两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闲置房屋共享是旅游共享经济在住宿方面的主要形式,主要表现为个人或商业机构通过共享平台,为消费者提供除床和卫浴外更多的个性化设施及服

务,以满足消费者旅游、商务度假和其他定制化的居住需求。随着共享经济概念的快速普及,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住宿分享所需的社会环境已经日臻成熟。出游者对于住宿的多样化需求以及房地产行业空置率居高的现状,也成为助推住宿分享行业发展的新动力。目前国内的共享住宿主要集中在中短期租赁领域,主要表现为客栈、民宿、公寓、精品酒店、度假别墅、小木屋、帐篷、房车、集装箱等形式。目前较为主流的基于互联网的共享平台有途家网、蚂蚁短租、小猪短租等。共享短租目前仍存在房源供给、行业规范及产品标准、共享平台以及支撑技术等问题,亟待建立房源准入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找准市场定位^[12]。

在出行方面旅游共享经济主要表现为交通工具的共享,而尤以短租自驾表现为甚。共享交通主要是指个人或商业机构通过共享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交通工具以满足消费者出行方面的需求。共享出行方式简便易行,有利于节省成本,缓解交通堵塞。近几年共享交通企业不断整合扩大,已从打车发展到现在的租车、代驾、巴士等,业务类型不断增加。目前主要的基于互联网的共享平台有滴滴出行、易到用车、天天用车、哈哈拼车、PP租车、神州租车等。

二、共享经济与旅游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用的旅游总花费(TOTAL)也称为国内旅游收入,将其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包括国内游客在国内旅行、游览过程中用于交通、参观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全部花费。衡量旅游共享经济的指标,则选取其中占比最大的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LODG)和短租自驾(CR)。

艾瑞调查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结果显示,国内分享住宿自2001年起萌芽,其主要代表为艺龙、携程等OTA企业,短租自驾自2004年开始自今,经历了“线下重资产+线上服务”向“互联网+共享经济/轻资产重服务”的转型。因此,本文对旅游业2004-201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并运用实证的方法来分析共享经济对旅游业的影响,定量分析使用的时间序列为

2004-2016年旅游总花费(TOTAL)、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LODG)和短租自驾(CR)。本文选取的指标区域为中国整个国家范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16》、艾瑞调查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整理得到。为消除样本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将变量取对数处理后,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 样本数据

Tab. 1 Sample data

年份	LNTOTAL	LNLODG	LNCR
2004	8.457592	-4.605170	1.648659
2005	8.572798	-2.659260	1.945910
2006	8.737083	-1.609438	2.140066
2007	8.958103	-0.916291	2.388763
2008	9.076729	-0.356675	2.595255
2009	9.228544	0.262364	2.975530
2010	9.439848	0.741937	3.465736
2011	9.868140	1.193922	3.640214
2012	10.030393	1.547563	3.895894
2013	10.176415	2.433613	4.143135
2014	10.319296	3.198673	4.369448
2015	10.439838	3.901973	4.631812
2016	10.590657	4.493121	4.89410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艾瑞调查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制作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旅游总花费、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和短租自驾的数据进行相关系数计算(见表2),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变动趋势,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96,说明三者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表2 TOTAL、LODG和CR相关系数表

Tab. 2 TOTAL, LODG and C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able

	LNTOTAL	LNLODG	LNCR
LNTOTAL	1.000000	0.969540	0.993767
LNLODG	0.969540	1.000000	0.979080
LNCR	0.993767	0.979080	1.000000

(三)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有可能出现的“伪回归”问题,必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判断。对旅游总花费、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和短租自驾进行ADF检验,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ADF检验结果

Tab. 3 ADF test results

变量	ADF统计值	检验类(c,t,q)	临界值		
			1%	5%	10%
ln(TOTAL)	-2.040935	(c,t,1)	-5.124875	-3.933364	-3.420030
D(ln(TOTAL))	-2.778996	(c,0,0)	-4.200056	-3.175352	-2.728985
ln(LODG)	-2.643260	(c,0,0)	-4.121990	-3.144920	-2.713751
D(ln(LODG))	-4.764723	(c,t,0)	-5.124875	-3.933364	-3.420030
ln(CR)	-2.266274	(c,t,1)	-5.124875	-3.933364	-3.420030
D(ln(CR))	-3.203706	(c,0,0)	-4.200056	-3.175352	-2.728985

注:表中,c代表截距项;t代表时间趋势;q代表滞后阶数;D代表一阶差分。

从表3可知,变量ln(TOTAL)、ln(LODG)和ln(CR)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都处于非平稳状态。但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D(ln(LODG))和D(ln(CR))的ADF统计值小于ADF临界值,变量呈现出平稳时间序列的状态,而ln(TOTAL)也在10%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零假设。以上分析说明ln(TOTAL)、ln(LODG)和ln(C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满足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四)协整关系检验

对以上三个变量运用JJ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根据AIC和SC值越小越好的原则,并综合考虑样本的数量,可以确定出最优滞后阶数为3(见表4)。检验时假设观测序列LNTOTAL和协整方程(CE)具有线性趋势,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开始逐步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采用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的结果都显示存在1个协整方程(见表5、表6),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表4 滞后阶数(Lag)的选择

Tab. 4 Choice of lag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4.367793	NA	0.000878	1.473559	1.564334	1.373978
1	44.85802	59.07098	3.24E-07	-6.571604	-6.208502	-6.969926
2	79.06594	20.52475*	4.95e-09*	-11.61319	-10.97776	-12.31025
3	737.6448	0	NA	-141.5290*	-140.6212*	-142.5248*

表 5 Johansen 迹统计量检验

Tab. 5 Johansen trace statistic test

Hypothesized		Trace		0.05	
No. of CE(s)	Eigenvalue	Statistic	Critical Value	Prob.**	
None *	0.994879	87.34396	35.19275	0.0001	
At most 1	0.755495	24.05107	25.26184	0.1143	
At most 2	0.448843	7.148823	9.164546	0.1588	

Trace test indicates 1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 p-values

注:*号表示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表 6 Johansen 最大特征检验

Tab. 6 Johansen maximum characteristic test

Hypothesized		Max-Eigen		0.05	
No. of CE(s)	Eigenvalue	Statistic	Critical Value	Prob.**	
None *	0.994879	63.29288	22.29962	0.0002	
At most 1	0.755495	16.90225	17.8921	0.1046	
At most 2	0.448843	7.148823	9.164546	0.1288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1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 p-values

注:*号表示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如表 7 所示。

表 7 Johansen 协整检验参数结果

Tab. 7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parameter results

1 Cointegrating Equation(s):		Log likelihood	31.98143
Normalized cointegrating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LNTOTAL	LNCR	LNLODG	C
1	-0.969876	0.136934	-6.912851
	-0.04989	-0.02043	-0.15251

根据表 4 所给出的数据,得到估计出的三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达式如下:

$$ECM=LNTOTAL-0.969876LNCR+0.136934LNLODG-6.912851$$

$$(-0.04989) \quad (-0.02043)$$

$$(-0.15251)$$

所列协整关系表达式中协整系数下方括号中的

数字为渐近标准差。重新利用 ADF 检验法,对 ECM 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 ECM 的 ADF 检验统计量(-3.619549) 小于 5% 的显著性水平临界值(-3.175352),反映出此时 ECM 时间序列已经是平稳序列。因而也就进一步表明了 LNTOTAL、LNCR 及 LNLODG 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五) Granger 因果检验

以上检验仅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还需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为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的原因,接下来将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在检验时,由于存在时滞效应,因此取滞后期为 3,则 $\ln(TOTAL)$ 、 $\ln(LODG)$ 和 $\ln(CR)$ 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表 8 所示。

表 8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Tab. 8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Null Hypothesis	F-Statistic	Prob.	结论
LNLOD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TOTAL	0.96107	0.5126	接受
LNTOTA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LODG	121.835	0.0012	拒绝
LNC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TOTAL	25.2078	0.0125	拒绝
LNTOTA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CR	0.02117	0.995	接受
LNC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LODG	5.56897	0.0961	拒绝
LNLOD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CR	0.57347	0.6704	接受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国内分享住宿不是旅游总花费的格兰杰原因,但旅游总花费是国内分享住宿的格兰杰原因;短租自驾是旅游总花费的格兰杰原因,但旅游总花费不是短租自驾的格兰杰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短租自驾与旅游总花费之间均为单向因果关系。

首先,根据艾瑞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分享住宿的日均价主要集中在 100-300 元之间,住宿供应商更着重提供经济、性价比高的产品,同时住宿的目的需求除旅游之外呈现逐渐多元化的趋势,如商务出行、个人办事和友人聚会等,加之消费者对产品认知程度较低、行业规范及服务水平尚无统一标准、分享住宿市场仍主要立足于功能单一的住宿要素而导致相关市场融合程度低、平台管理能力有限和普遍存在的房源

分散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分享住宿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在促进旅游总花费的增长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作用。可预见的是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分享住宿交易规模自然将随之扩大。其次,短租自驾会促进旅游总花费的增长,但旅游总花费的增长却不会促进短租自驾的发展。虽然伴随着自驾游的兴起、驾照数的增长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短租自驾发展迅速,但其主要还是主要表现为城市周边自驾游以及旅游目的地用车,但在进一步增加车队数量和全国城市覆盖度,简化车辆预定手续、缩短服务响应时间和提供上门取送车等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之前,旅游出行的方式仍将表现为短租自驾与多种传统出行方式并存的局面。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结论

综上所述,2004年到2016年间,旅游总花费、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和短租自驾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中。虽然旅游总花费、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和短租自驾三者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国内分享住宿交易规模与旅游总花费,短租自驾与旅游总花费之间都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旅游业的发展会促进分享住宿交易规模的扩大,短租自驾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反向则不成立。

(二) 对策建议

旅游行业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旅游生活、消费方式在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为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让共享经济更好的助力旅游业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共享出行维度,从以上格兰杰分析的结论不难发现,短租自驾已成为短途出游的主要方式,而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和政策完善,也将为短租自驾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环境。企业可以通过实施多项创新增长的举措和更精细化的管理手段,在竞争激烈程度不同的网点采取灵活的市场定价,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获取新用户及拉动需求增长,以促进租车业务的持续

增长。政府应鼓励滴滴、Uber等各种交通共享方式的健康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而多样化的旅行交通体验,进一步提升短租自驾对旅游业发展的积极作用。鉴于目前短租自驾多为旅游景区出行的特点,可考虑利用当地的旅游观光资源优势,通过在客户、酒店和汽车租赁供应商三者间建立完整的共享出行分时租赁生态网络,以覆盖各种主要的出行场景,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其示意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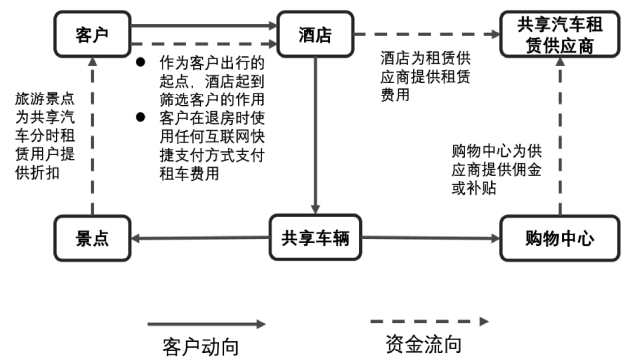


图1 共享出行分时租赁生态网络

Fig. 1 Shared travel timeshare leasing eco-network

第二,在共享住宿维度,鉴于国内分享住宿并不会促进旅游总花费的增加,说明国内分享住宿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无法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消费者对产品认知程度较低的问题,应运用自身平台影响力以及其他合作宣传推广渠道加强推广非标准住宿产品,同时提高大众认知率使共享住宿被广大消费者熟悉、了解并选择入住;对于行业规范及服务水平尚无统一标准的问题,政府应帮助经营者推进信息化管理流程,优化各服务流程中的用户体验,树立行业标准,使服务流程的每一步均可向标准化靠拢,达到完善、统一的行业规范及服务标准的形成的目标;对于相关市场融合程度较低的问题,企业应拓展相关行业的融合,提升非标准住宿市场的多元化水平,使得供需结合更加完善,从而促使市场的良性发展;对于平台建设尚待完善的问题,在简化平台操作功能和提供跨平台预定功能的基础上,可考虑由政府 and 行业牵头,联合多方信用体系、银行信用体系、公安信息系统和第三方个人信用评级机构等,打通各方信用体系机构的信息壁垒,通过租住双方实名认证的手段加强监管;对于房源分散性问题,可通过RBA等手段扩充供给,通过碎片化,闲置住宅分享提

升供给量,并鼓励需求旺盛的城市的业主短期出租自己的房屋,从而把临时、短期闲置的房屋作为弹性扩充房源的重要来源。

第三,虽然目前共享住宿和共享出行在旅游共享经济中表现最为突出,但还应深度挖掘游客在食、游、购等方面的深度需求,基于传统旅游业的发展成果,以共享平台的新形式为游客提供特色美食、个性化旅游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品服务,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加强政府在共享旅游经济中的引导性作用,一方面利用各类信息化技术优化旅游共享平台,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鼓励其通过旅游共享平台消费旅游产品,如订房、租车等,充分发掘旅游共享平台的经济价值,一方面积极制定旅游共享经济相关政策,建立信用保障体系,降低交易风险,加强旅游行业监管体系建设,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与手段。

参考文献:

[1] FELSON M, SPAETH J 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

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8(4):614-623.

- [2]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 [EB/OL]. (2017-03-02)[2018-06-10].<http://www.sic.gov.cn/archiver/SIC/UpFile/Files/HtmlEditor/201703/20170302125144221.pdf>.
- [3] 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J].电子政务, 2017(3):2-15.
- [4] 曹丹.论共享经济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应对[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1):56-66.
- [5] 雷海东.运用"互联网+旅游"共享经济创新发展模式 升级旅游经济产业:以潮州市为例[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7(1):58-61.
- [6] 罗云丽. 旅游共享经济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与发展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16(14):175-176.
- [7] 王政军,崔永聪,刘真.基于共享经济下的短租住宿产品问题研究[J].酒店管理研究,2016,1(2):78,80.

(责任编辑:苏娟娟)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Shared Economy and Tourism

TIAN Yi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Trade, Yango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ourism-sharing economic data in China in the 2004-2016,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total cost of tourism as the main index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domestic shared accommodation scale and the short-term self-driving as the index to measure the tourism shared economy,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method.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s a long-term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cost of tourism, the domestic shared accommodation scale and the short rent self-driv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will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the sharing of accommodation transactions; short-term self-driving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shared economy; tourism-sharing economy; shared accommodation; short-term self-driving

浅谈当代中国水彩画的本体语言和多元化

李振超

(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水彩画,在造型艺术中独树一帜,水彩画因为创作材料和工具的固有特性、技法与其他画种不同,形成水彩自身的艺术特性,拥有自然流畅、透明的特点。作为舶来画种,在我国已有逾百年的发展,而且它同我国传统中国画在作画过程中有相似的艺术表现,使得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避免不了融入中国画的部分精髓。同时由于中国的水彩艺术家拥有优沃的传统文化、审美认知,中国的水彩画逐渐演变成中、西融合的绘画门类,呈现一种本土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水彩艺术在中国目前有着强劲的创新浪潮,表现形式多样,材料越来越超出透明水彩范围,题材也非常丰富,加强了水彩画的视觉创新。综合上述方面,我们看到完整立体的中国水彩发展面貌。

关键词:水彩语言;融合;多元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66-07

水彩画的创作离不开水,水流畅运动,变化无形,又具有透明性,它可调、可泼、可染、可铺、可洗。水,是作为水彩创作的第一要素。伴随着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其它绘画门类艺术家对水彩画产生了兴趣,他们将自身已有的绘画经验,如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技法手段和创作理念运用到水彩画中,探索研究,这些都丰富了水彩画的本体语言,使水彩不仅仅有其轻快明亮,透彻淋漓,流畅洒脱的特点。

水彩画在中国传播发展并且能获得骄人的成绩有多方面原因,浅一层是由于水彩画本身的特性所决定,最重要的是,多重、多元、开放的水彩语言探索为水彩画本身发展准备了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三十年来,水彩画的发展极为迅猛,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求新求变,并且在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大背景下呈

现出唯一中国特有的多元化绘画语言状态,无疑值得鼓励和推广这种表现力的多元扩展。站在水彩画自身独特的艺术面貌和本体语言的基础上,仍然要冲破水彩画一些旧有模式。如今,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然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勤奋钻研掌握水彩艺术表现及本体语言的运用,重视基础的研习和贴近生活才能更自由的多元化的表达水彩艺术。

一、水彩画的产生与发展脉络

(一)西方水彩的产生与发展

广泛意义上的水彩画是以水为媒介,调和颜料描绘图画,从而达到特有的清新明快、水色淋漓、洒脱流畅等特征的视觉图案。水彩画是早期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在人类还未出现语言与文字前,原始人已经开始用绘图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与劳动。从考古中发现得知,早期阶段的水彩画表现方法非常简单,材料来源于野兽的鲜血、某些植物

收稿日期:2018-03-18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JAS170519)

作者简介:李振超(1989-),男,土家族,助教,主要从事水性材料技法表现探索与研究。

的汁液、磨成粉状的赤铁矿等,配合水为调和剂直接在岩壁、陶器、木头上进行绘画。例如,十九世纪发现的距今约一万四千年前旧石器时代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野牛)以及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其粗犷的笔触、强烈动态、以及符号化的处理都令人惊艳无比。水彩画理应称得上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绘画种类。

不得不承认,水彩画在后来相当长时间里是作为功能性的记录工具(描绘地图、地理风貌)、插画或者创作稿而存在,但是材料和技法在这一阶段得以完善。比较成熟的水彩画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比如德国画家阿尔伯特·丢勒的作品《小野兔》,如图1;汉斯·荷尔拜因的作品《安娜画像》,如图2。^[1]用笔勾勒细腻的线条,用水调和颜料逐层敷上深深浅浅的单色,细致生动。水彩画脱颖而出,逐步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要归功于18到19世纪英国的艺术家们,这一时期英国水彩画摆脱了功能性,并赋予水彩画以艺术性。由于英国湿润多雨雾的自然条件,而且彼时英国经济、人文繁荣发展,为水彩艺术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几乎囊括了英国的杰出水彩画家,比如“英国水彩艺术之父”保罗·桑德比,其为水彩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水彩颜料制作和技法丰富上面,也将欣赏性风景题材和肖像题材向前推进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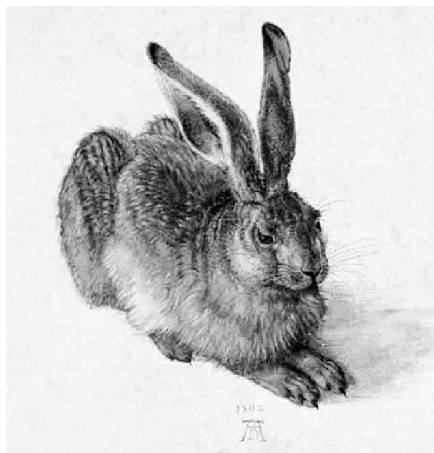


图1 阿尔伯特·丢勒《小野兔》

Fig.1 Albrecht Dürer *Leveret*



图2 汉斯·荷尔拜因《安娜画像》

Fig.2 Hans Holbein *Anna's Portrait*

(二) 中国水彩艺术的成因现状

水彩画作为舶来画种,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因为:首先,水彩画与水墨画的相似性,都是用水作为媒介剂,以水的浓淡干湿营造光色氛围,不同之处是水彩画用水调和可溶性颜料,而水墨画用水调和墨色;其次,水墨画在中国源远流长,加之水墨画和水彩画在表现技法上颇具相似性,使得人们易于接受并且学习;再者,水墨画与水彩画的艺术表达和艺术表现力有着相似的作用。水彩画在中国确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当代水彩画呈现了多元化的形态,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了解了水彩,喜欢上水彩,加入了水彩的队伍中,中国各大院校中也越来越多增添了水彩课程,甚至拥有独立的水彩画系,这对水彩在中国的发展与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关于水彩画的展览也越来越多,使更多不认识水彩画的人被吸引。这所有一切慢慢地出现使中国水彩画处于稳定生长状态。

1. 水彩画在中国发展的脉络

初时,随着清朝一些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的西方文化艺术被带入,到如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早年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开办的“土山湾画馆”,开始了系统的西洋绘画技法传授,同时引进了水

彩画,一时间启蒙了当时中国的西洋绘画教学,我国得以拥有自己的西洋画人才,最早的水彩画家有如张充仁、徐咏清、周湘等。

五四运动前后,国民教育开始重视美术教育,建立新型美术学校,向先进国家学习。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水彩画家有:李剑晨、王肇民、杨云龙、王济远、潘思同等。之后建立了上海美专、杭州美专、国立北平艺专等,全国开展各种水彩画的交流活动,各种水彩画相关书籍相继出版,水彩画进入一个繁荣发展时期。

进入新中国后,水彩画又迎来了新的发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于1954年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全国水彩、速写画作品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水彩画家。紧接着在1957年举办全国青年水彩画家作品联展中,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水彩画家。1963年北京举行了“英国水彩画三百年作品展览”,对中国当时水彩画家及中国水彩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开阔了中国水彩画家的视野,从中西美术文化的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的序幕。

改革开放后,加强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水彩画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水彩画再次崛起。从此,全国上下开始陆续举办各种水彩画展,水彩画的队伍也随即不断扩大,中国水彩画家们在吸收西洋传统精华的同时,中国水彩画家们根植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观念、不同的生活体念,不停地摸索,寻求水彩画的新方向,使得中国当代水彩画语言呈现新面貌,多元化的趋向。

2. 当代中国水彩画语言形式多元化的趋势

水彩画作为西画种,它出现在中国并逐步发展成熟,并在近二十年间有了跨越式的成熟与发展。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表现形式上,均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变化,各种画种的画家们都在学习水彩画,并喜欢上水彩画的特有魅力并加以融会贯通。因此,水彩画本体语言得以成熟,丰富,逐渐自信洒脱,如图3。



图3 李振超《旧时光》

Fig.3 Zhenchao Li *Old Time*

二、关于水彩画及其本体语言

(一) 概述

所谓绘画语言,是作者以记录状态、反映认识、传达信息或表现思想为目的,运用笔、刀、墨、纸、颜料等材料工具为物质载体,以色彩、线条、明暗、肌理等视觉信号为媒介,通过造型艺术手段,创作描绘艺术形象造成视觉体验的表达方式。每种绘画门类都有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

油画是西方绘画史中重要画种。颜料的制作依赖油作媒介,在处理过的亚麻布、木板或者墙面上创作。区别于水彩画,油画的塑造方式是逐层覆盖,甚至能将颜料堆积如浮雕般的质感和厚度,因此,油画相比水彩更适合表现画面立体感,如图4。

中国画、壁画、版画等,又有其自身的材料属性和创作手法,如图5。木版画的创作是以刀代笔,强调刻画的力度,线条纤细如丝,黑白相间,造型格外生动有力,大块的留黑又使得画面对比强烈,令观者对画中人物留下极深印象。这种天然的类似于基因层面的区别我们称之为其各自的**本体语言**。正如水彩以水作为媒介,将透明水色进行调和再在特殊纸张上作画,能够表现出特有的透明、流畅的审美感受。水彩画的本体语言大致上从两个点来进行分析:第一点是从材料的角度,作画媒介决定画种,不同的媒介延伸出不同

的视觉感受;第二点是从创作方法上,从创作者的角度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在材料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画家对同一题材也会有不同处理方式,画家的审美趣味和认知积累造就了水彩作品的艺术高度。以上两点同样适用于其他画种,所以水彩存在及意义是必然的。^[2]



图4 闫平《花季》

Fig.4 Ping Yan Flower Season



图5 李焕民《守望》

Fig. 5 Huanmin Li Waiting

(二)从媒介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媒介是区别画种的界定的来源之一。水彩画的主要媒介即“水”,“水”与颜料相融合在纸面上具有流动性和透明性,因此水彩画多有“即兴”的效果。水色调和后画面常常出现水色交融、透明空灵和流畅轻快的

主旋律,增加了水彩画的挑战性与趣味性,独特艺术语言形式,吸引着众多的艺术创作者,如图6。图中人物几乎看不到像其他画种因为塑造而留下的笔触痕迹,似乎只是水的流动自然地完成了形和结构的塑造。



图6 应金飞《似水年梦》

Fig.6 Jinfei Ying A Dream

水彩纸张的不同往往也带来效果的区别,不同纤维和厚度的纸张在吸水和耐磨程度上有差别。水彩纸一般有棉浆纸和麻浆纸,前者有好的吸水性,比较容易形成酣畅淋漓的效果,后者更加耐磨,适用于反复叠加色层修饰细节。此外,纸张的纹理有粗细,一般分为平纹、细纹、粗纹三个等级,越粗糙的纹理越容易产生色素颗粒沉淀的自然效果。

(三)从技法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水彩画的本体语言除了媒介存在的重要性,也包括技法的运用。任何一个水彩画创作者的成长经历、认知结构、文化素养、审美倾向等都存在着各种差异,向内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由此产生出多姿多彩的水彩画本体语言。

水彩基本表现技法有:平涂法、重叠法、渲染法、以及其他特殊技法(如遮挡法、油水分离法、洗与撒盐法等)。^[3]每种技法都是画家们通过长期作画实践与探索中运用中总结出来的,不同绘画技法的使用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好的水彩画家都是熟练驾驭了水彩画的基本技法之后,融会贯通,才逐渐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和特色。

“水”在水彩画的技法方面依旧占据着很大作用,水的技法控制决定水彩的不同视觉效果。水赋色以活力,色赋水以生机。一般而言,因作画过程中对水的运用的不同,将水彩画法分为干、湿、干湿结合三种方法。如图7所示,背景雪山是湿画法完成,亮处几个人物的毡帽是干画法处理的,而面部塑造采用了干湿结合画法。干与湿不是绝对的概念,干画法只是相对湿水较少,以便形成清晰的笔触,多用于刻画画面细节,通透感较缺乏;湿画法,通常是将画面大面积湿水,然后乘势铺陈颜色的大关系,水色交融,色层比较薄,因而透明感极好;干湿结合,顾名思义,较于前者多了水的韵味,较于后者又多了塑造和细节。通常来讲,干湿结合集两者之所长是一种普遍应用的方法。



图7 徐海刚《亮宝节上的人们》

Fig.7 Haigang Xu People on the Bright Treasure Festival

三、当代中国水彩画艺术语言的多元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和思维形态是不断更新的,艺术创作是反映时代里社会形态与人的思维形态的。因此,客观来讲水彩画的本体语言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是社会前进的必然结果,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是符合发展的规律的。随着全球化,艺术的交融使得中国的水彩画家们思想更加解放,个体追求自我表达,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多元

化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画种彼此的交流与融合加上新材料新观念的运用,水彩画艺术语言不断地扩展,成长为成熟的画种。

(一)对中国画的借鉴

中国画博大精深,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国画家影响深远,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避免不了融入中国画的部分精髓。两者可以取其精华,相互汲取营养。如清代末年画家任伯年所画作品,很显然吸收了许多水彩画技法。如图8所示,芦苇叶的边缘与鸭身重合部分,作者避开了在用笔时两处颜色的直接接触,而是空出了一条线,使得两种颜色不会窜到一起,这样既保留了芦苇叶完整的轮廓,又交代了两处的遮挡关系。水彩画具备兼容性,不仅可以吸收其它绘画艺术的技法丰富自己,为我所用,也可以作为一种方便的工具,适合为其它类型的艺术创作起草。因此,它也被从事其他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所喜爱。



图8 任伯年《春江水暖》

Fig. 8 Bonian Ren Spring River

1.表现形式

水彩画作为西方画种,同油画一样,注重表现性与再现性,这与中国画有着很大区别。中国画是人们用来抒发情感的方式之一,它更注重“韵”。而两者相同性则是中国画与水彩画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共性,如用笔、用水、用色。

在“用笔”上,中国画注重“写”,讲究力道;水彩画讲究“画”,讲究塑造。也可以说,中国画用笔更注重内在,讲究“入木三分”,谢赫“六法”绘画理论中“气韵生

动”“古法用笔”则是最好的概括。而水彩画相对更注重外像的表现,如对象的体积面的转折变化、立体感和质感,并不是一定要表现“水”和“色”的魅力。

两个画种的共同点是用“水”来作为表现力,失去了水就没法产生水墨画和水彩画,当水用到恰到好处,墨色才能出神韵;在水彩画中,水依旧作为重要媒介而存在,水彩画的轻快透明、水色交融和酣畅淋漓等特点依附水而存在,水彩画也因为水的特性而出现无法预料的肌理效果。

2. 媒介材料

中国画和水彩画在主要媒介上许多相似之处,均由纸、颜料、笔组成。中国画和水彩画均为纸本作画,国画多在宣纸(分生宣、熟宣)、帛、绢等上作画;水彩画多在水彩纸上作画,水彩纸相对比较厚实,表面肌理纹路也有所区别。国画颜料和水彩画颜料总体来说都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但在中国画中,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墨有“墨分五色”之说。传统的中国画所使用的毛笔和水彩笔几乎可以通用,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弹性以及易吸水的特点。

(二) 综合材料与技法的运用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细腻描绘不是水彩所长,但水彩画敢于向新的视觉领域挑战。随着现代绘画前沿的变革,文化及艺术的交流,人们的思想和思维不断打开,各种媒介不断运用到艺术作品中,各种画派相互融合,相互借鉴。自由表达的途径和形式在绘画中是无界限的,任意的。与以往传统艺术相比,综合材料的语言边线从来没有如此变幻莫测,获得丰富和强烈的视觉效果。

笔者观察近些年水彩画作品,各种综合材料及技法在水彩画的创作中层出不穷,并受到广大艺术爱好者的赞赏。有差别材料也会按照自己不同的特点,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比较常用的材料有:留白胶、阿拉伯树胶、水彩增厚剂、盐、牛胆汁等。甚至出现了沥青、丙烯调和液、颗粒剂、丙烯颜料、酒精等等其他媒介,如图9。作者在创作开始阶段打破了油性材料和水性材料之间的壁垒,将油性的沥青加热后滴在被热水

打湿的水彩纸上,沥青会随着水流扩散形成不规则的肌理,颗粒或片状,稍等水分干掉后重新开始作画,这一过程补充了地面部分颜色的厚实感,也更加真实的表现了地面粗糙起伏的肌理,是很好利用综合材料进行创作的实例。每种材料与技法的运用都会出现不同的视觉感受,这对不同物体的塑造及画面视觉效果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每一个水彩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使用媒介的技能,可根据对象、自己的情绪及需要的画面效果来选取自己想要的材料,为水彩画的作画方法拓宽了道路,也增加了水彩画家们对水彩画探索与研究的兴趣。



图9 李振超《初雪桐木关》

Fig.9 Zhenchao Li *First Snow of the Tong Mu Guan*

在水彩画教学中,个别院校甚至设置了课程《材料制作与表现》,制定了一系列教学大纲及培养方案,针对特殊材料在水彩画创作中如何使用以及相应带来的艺术表现力进行研究和突破。这一课程,不仅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探索与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还有助于提高整体艺术鉴赏与创作能力,使得年轻水彩画学者们在水彩画创作中有全新的突破,这是这一新课程的最大优势。整体评估课程结束后学员作品,该课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无论是在创作题材上还是在创作技法与形式上,学员们的作品都在成熟的道路中前进。尤其是材料应用方面,创造性的发挥让作品

焕然一新,例如,在油画布上创作水彩、加入水溶性色粉、调色时加入酒精等等。实践再次表明水彩画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是常态化的,艺术的创新是没有界限的。因此,作为学者,在创作中,他们在尊重传统语言的同时,同时也在打破传统绘画媒介材料,尝试更多探索和改变,不断地在提高水彩画的视觉创新。

不难看出由于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增多、思想的变化,艺术家们在艺术的体验中不断地更加深刻地强化对心灵的观察和对人生的追问,把吸收的经验积累或感悟投入到艺术的“真诚”“创新”中。出现我们自己的表现水彩、抽象水彩、写实水彩、具象水彩……这便有了“中国味儿”的现代水彩画本体语言,水彩画在当代中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艺术形式更具有生命力。中国水彩艺术种子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历经风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许多老一辈水彩画家们

的苦心经营下终迎来光明的今天。只要中国水彩画家们把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创作之根本,创造性的承继中国水彩画的优良传统,认真体悟生活、重视个性,有机地融入其余画种的优势,保有自己的特点,提高其品格,水彩画艺术会继续繁荣的发展,以期更好地未来。

参考文献:

- [1] 盖尔·斯佩克曼.水彩湿画法[M].刘沛沛,庞茂琨,丘仪,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18.
- [2] 理查德·波尔顿.创新水彩画技法[M].钟志强,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6.
- [3] 杨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相似性[J].科技风,2009(19):10-11.

(责任编辑:白琳)

On the Body Language and Plurali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tercolor Painting

LI Zhenchao

(School of Art,Wuyi University,Wuyishan, Fujian 354300)

Summary: Watercolor painting, unique in the plastic arts, because of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materials and tools, techniqu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and smooth, transparent. As an exotic painting, it has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n our country, and it has similar artistic performanc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process of painting, making watercolor painting in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int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ainting.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watercolor artists have yowza's traditional culture, aesthetic cognition. Chinese watercolor painting gradually evolved into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gration of painting categories, showing a trend of loc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Watercolor art in China has a strong wave of innovation, diverse forms of expression, materials beyond the scope of transparent watercolor. Theme is also very rich, strengthening the expression of watercolor. Overall we see a complete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atercolor face.

Key words: watercolor language;merge;diversification;innovation

范式视阈下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

陈文华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根据罗杰斯和哈特对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萌起与发展四个阶段的总结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引进和评介、多元化实践和本土化探索。台湾地区学者注重亚文化群体差异研究的做法值得祖国大陆同行借鉴,海峡两岸学者应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哲学思想精髓,携手共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

关键词:范式;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历史分期;特点分析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73-05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范式”概念和用以描述科学发展动态图景的范式理论被当作是一种分析学科发展和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工具,应用于当今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1]范式从雏形的形成到发展完善的过程,皆凸显出当时每个阶段的时代需求,对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影响至深。基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新科学范式发展阶段的研究,罗杰斯(Rogers)和哈特(Hart)对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萌起与发展进行了总结,该总结将跨文化研究范式分为范式前期、范式崛起期、常规期和反常期四个阶段。^[2]本文拟借助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四个阶段发展的特点,对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①理论发展的历程和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从中得到启示。

收稿日期:2018-06-02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5B257);2017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陈文华(1976-),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一、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发展

(一) 范式前期(1940年之前)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传播学的根源,具体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三位伟大智者的相关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后期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对于跨文化交际的起源,古迪斯特(Gudykunst)认为齐美尔(Simmel)提出的“陌生人”的概念,应被视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先驱。在齐美尔(Simmel)看来,“陌生人”指的是不完全依附在社会系统之内分子,与社会系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距离。此后,“陌生人”概念得到了帕克(Park)、鲍茄德斯(Bogardus)、斯通奎斯特(Stonequist)和罗杰斯(Rogers)等人的发扬光大,由此而衍生出“社会距离”“边缘人”“万国”等概念和相关研究。

(二) 范式崛起期(1940年-1970年)

1959年《无声的语言》的出版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到来,该书作者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在书

中具体勾勒了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若干原则:跨文化交际训练的参与和体验;从单一文化社会层面的研究转向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研究;重视非言语交际;推行非评判性的族群相对主义;关注交际与文化的关系。^[3]从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陆续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并开始授予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博士学位,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跨文化交际教科书如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1972),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5)等也相继问世。1970年,国际传播学会在其下面设立了跨文化交际学分会,该分会每年召开的年会为跨文化交际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开始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三)常规期(1980年-1990年)

在常规期阶段,跨文化交际研究由于因应实务的需求,投入的人力和成果数量大幅递增。跨文化交际的教科书和专题研究出版物层出不穷,主题研究项目数不胜数,主要围绕滞留过程、文化同化与文化保留、偏见与歧视、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非语言传播、陌生人初次交流的不确定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抗等课题展开,但是有科学性的研究和权威性的出版物却不多。在这一阶段,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方向、方法与质量呈现出纷乱的局面。

(四)反常期(1990年后至今)

反常的发生通常历经三个阶段:(一)对于反常的察觉;(二)反常现象的扩展;(三)调整修正典范,适应反常现象。^[4]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阶段,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原则并未遭遇重大质疑,研究视角上也并无重大转变,但却在从西方视角向更为全球化的视角偏移。特别是移民移居新文化后,面对新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适应过程,成为这个时期最为热门的研究话题。在研究方法上,实证性研究也不再是唯一的研究模式,同时使用质化与量化研究方法,成为互相辅助、取长补短的做法。

二、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出版的《无声的语言》

(1959)标志着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祖国大陆学者何道宽于1983年撰写《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首次向祖国大陆读者介绍美国的跨文化交际学,而台湾地区则在1982年或更早的时候便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我们认为,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引进和评介(1974年-1995年),多元化实践(1996年-2005年),本土化探索(2006年-2017年)。对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进行简要归纳,有利于促进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加强海峡两岸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借鉴,推动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

(一)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评介(1974年-1995年)

1974年,台湾地区学者郑自隆在《新闻学研究》(第13期)发表了对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1966)的书评,首次向台湾地区读者介绍美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着重介绍了“文化间传播”这一术语以及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文化与社会因素。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由于国际传播的进展,将会逐渐出现“混合文化”或称为“第三类文化”,这类新文化的出现,对传统文化将是项挑战和威胁。^[5]这对当前文化全球化下的跨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同一期期刊中,也发表了陈传非对跨文化交际学奠基之作 *The Silent Language*(1959)的书评。该书评对这部奠基之作介绍的虽然很全面,但却忽略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一术语及其学科意义。

1982年,汪琪出版了台湾地区第一部跨文化传播学专著《文化与传播》,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西方已阐释过和探索过的主题,该书最引人注意的是其对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在该书第七章“研究方法布下的陷阱”中,作者一反研究者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之“常态”,认为所谓的“客观”研究并非绝对,许多由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差异,可能渗入研究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细节,歪曲所得到的成果。^[6]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形成一种理论,即一种有别于当时西方先进理论的全新理论。

在翁秀琪等人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1992/2012)一书中,作者借鉴了美国和欧洲公共传

播的理论,对其在美国和欧洲生活的亲身经历进行案例分析,被誉为“一直是台湾传播学课程‘同类书籍中的典范’”^[6]。

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台湾地区在跨文化传播理论方面以引进和介绍西方的理论为主,个体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闻学研究》《传播与文化》《传播研究简讯》等几个刊物,其它则只是零星发表在一些学报或其它学科的刊物中。

(二)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多元化实践(1996年—2005年)

在这个阶段,台湾地区学者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出版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这些成果的研究涉及面广,主要包括外籍劳工、跨文化婚姻、跨文化友谊、海外移民,以及对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关注等,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史论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但就理论探索而言,这个阶段仍然局限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普遍流行的种种理论,并未出现任何新理论。

黄葳威的《文化传播》(1999)一书极具代表性,该书以文化与传播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他群与我群、弱势团体、歧视等概念,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90年代台湾地区文化传播的现状与展望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该书中,作者重点探讨了媒介传播应当如何更好地服务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更好地服务儿童、青少年和不同性别的人,即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实现群体间的交际。该书是这一领域最全面的著作,但并未提出任何新理论。

叶蓉慧所著的《跨文化传播——教育的体验与实践》(2005)一书内容全面,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对跨文化传播学的传统脉络、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中的“亚文化群体”意识、“第三文化”概念、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教育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深入的阐述。^[7]本书虽然只有短短的145页,却收集了大量跨文化传播课程教师的反馈信息,对于跨文化传播课程的授课老师如何更好的安排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在该书中,作者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混乱状态提出了挑战,认为“在强调生存竞争与教学效率的喧嚣声中,对于理论与问题根源的思考愈来愈少”,而

“沉淀与再学习是研究者(也是教育者)避免模糊理念、迷失教学与研究方向的做法”。^[8]这对于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翁秀琪主编的《台湾传播学的想象》(2005)由厚厚的上、下两卷组成,共五篇二十一章。该书主要回顾了台湾地区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轨迹,内容涵盖了许多在台湾地区已经被讨论或研究的全球传播学主题,堪称是台湾地区第一本由传播学者集体创作的教科书。“沉淀”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在该书的每一章中,都收集与累积了台湾地区大量的相关研究论述,包括“国科会”历年的专案研究报告、重要学术期刊、乃至各校博硕士论文。整体而言,恰如主编翁秀琪指出那样:“虽然台湾做了不少相关研究,但多是追随西方热潮,而非长期累积的系统研究。”^[8]

陈国明、陈雪华合著的《传播学概论》(2005/2013)将传播重新分类为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公共传播、大众传播以及跨文化传播。该书还独开一个章节,探讨“传播的相关概念——聆听与批判思考”。在这一方面,该章节比其他台湾地区出版的相关书籍更为具体和全面。

从以上对这些代表性著作的评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点:首先,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很好地证明台湾地区的研究者或具有台湾地区背景的研究者已深入地探讨过各类传播学问题;其次,台湾地区学者注重生活体验,注重亚文化群体差异的研究;最后,以台湾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教科书并不多见,也没有任何单独探讨跨文化传播理论的专著面世。

(三) 对本土化理论的探索(2006年—2017年)

多年来,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学者翁秀琪认为,“台湾跨文化传播教育应以‘在地思维,全球实践’为典范。”^[9]翁秀琪的“在地思维”的观点,反应出台湾地区学者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开始独立思考,力求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此外,黄光国(2004)探讨“脸”与“面”与华人沟通行为的关联,陈国明、庄瑞玲(2004)分析风水与占卜对华人沟通的影响,黄铃媚(2004)探讨道家的无为谈判,萧小穗(2004)从“礼”的角度分析华人沟通行为,等等。这些

试着从中华文化提炼出适合解释华人传播行为理论的尝试,对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华传播理论具有积极的作用。朱我芯在其专著《对外华语文化教学实证研究——以跨文化沟通与第二文化习得为导向》(2013)中首次全面地探讨如何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向外国人教授中文,从而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7]作者通过对外汉语教学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为建设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做出实践性的探索。

作为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另一代表性人物,陈国明力挺“中华文化特色”这一概念,其相关著述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大量发表,在祖国大陆也偶尔可见。在《中华传播学往何处去》一文中,作者论证了创建中华传播学的正当性与迫切性,并从概念与应用两个层面提出了建立中华传播学的理念与方法的建议,认为“所谓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传播学’是可以建立的”^[10]。2009年,祖国大陆出版了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的简体版本。在该书中,陈国明借鉴《易经》中描述的八卦关系提出了“《易经》沟通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描述,认为该模式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沟通模式有所不同。这个模式特别注重互动双方相辅、相生与相克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关系。^[11]对于这一基于《易经》的理论,在此我们不再做更多的探讨,因为它尚需接受时间的检验,但是陈国明的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中国学者在挖掘古代哲学思想精髓,构建未来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跨文化交际学科具有启示意义。^[12]

三、结语:局限与启示

本文对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促进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由于本文对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所做的评价和分析仅局限于台湾地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因此难免存在片面主观。

通过本文对台湾地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的分析来看,台湾地区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有以下两点值得祖国大陆同行借鉴。

其一,台湾地区学者注重生活体验,注重亚文化群体差异研究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虽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得模糊,但仍然是事实存在,主流文化之下的亚文化群体差异更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对亚文化群体差异的研究有利于学习者从生活体验中提高跨文化批评能力。因此,对于跨文化交际方向的学生来说,最好先从自己周围发生的具体事件着手进行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然后再涉足抽象的理论思考领域。

其二,台湾地区学者对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探索,特别是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哲学思想精髓对跨文化交际过程、规律等进行新的阐释的思路和方法,包括本体论的整体性思考、价值论的和谐取向、认识论的由连接性产生意义与知识、以及方法论的以直觉与非线性的问题解决方式作为基础等,^[10]这些对于促进海峡两岸学者通力合作,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新视角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注释:

- ①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在台湾地区大多翻译成“跨文化传播”,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台湾地区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传播”,祖国大陆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 [1] 孙淑女. 范式视阈下的跨文化适应理论[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5: 46.
- [2] 叶蓉慧. 跨文化传播: 教育的体验与实践[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5: 13-23, 20, 5-6.
- [3] 尹国梁. 管窥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的跨学科性: 跨文化读本引文分析[J]. 科技信息, 2011(12): 476-478.
- [4] 郑自隆. 传播与文化[J]. 新闻学研究, 1974(13): 207-218.
- [5] 汪琪. 文化与传播[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2: 280.
- [6] 翁秀琪. 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M]. 台北: 三民书局, 2011: 编辑部序.
- [7] 陈文华, 林大津. 台湾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及其启示[J]. 东南学术, 2015(1): 204-209.
- [8] 翁秀琪. 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上、下)[M]. 台北: 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2005: 21.

- [9] 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J].新闻学研究, 2001 (10):29-54. 2009:24.
- [10] 陈国明.中华传播学往何处去[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 (3):157-174. [12] 任瑞.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概述[J].山东外语教学,2009(1): 3-7.
- [11]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果)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Taiwan under Paradigm View

CHEN Wenhua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According to Rogers and Hart's summary of the four stages of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Taiwa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ntroduction and appraisal, diversified practice and localization exploration.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of subcultural groups. And schola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hould learn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ssence of ancient philosophy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aradigm; Taiw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istorical divisions; characteristics

福建古村落文化意象的影像建构

綦鹏

(龙岩学院 传播与设计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传播学视域中的福建古村落文化呈现出多元丰富而又复杂的特点,面对各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载体日趋消亡的现状,古村落文化系统的整体性构成遭遇困境。跳出现有的古村落与文化保护模式,以影像作为文化载体,通过诠释生成意象表达的符号基础,身体的影像呈现表达文化的精神内涵和社会规则,以及注重影像生成意象的逻辑等途径建构原生态的特色文化意象,达到保存与传承古村落文化、提高人们保护意识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意象;古村落;影像传播;建构

中图分类号:J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78-05

在全国范围重视保护特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背景的新社会语境中,众多学者纷纷从自身学科的视角提出特色文化的保护措施,对传统文化本体的多层面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在多维开放的信息环境的现今,增进各领域与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是植根于实践的内在要求,在传播学的视域下,福建古村落的文化现状与特点如何,以及如何用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唤起人们对于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一、福建古村落现状与承载媒介的变迁

(一)福建省古村落分布与文化特点

国家住建部等部门从2012年起,已公布了四批传统村落名录,这其中被列入名录的福建传统村落数量共有230个(分别是第一批48个,第二批25个,第三批52个,第四批105个)。福建省因其自然环境与历史原因,这些古村落分别散落在福建文化差异明显

的各地,如南平地区的传统村落承载着闽北程朱理学历史文化,闽南侨乡的“古大厝”是其侨乡文化的缩影,闽东畲族古村落保存有独特的畲族古建、深厚的畲族特色文化以及丰富的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闽西古村落是客家文化的充分体现。这些传统村落都是古人根据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建造而成,分布范围广、多元化、文化积淀深厚、特色差异明显是福建古村落的鲜明特点。

在传播学视域下,各古村落维持族群边界的具象符号和文化呈现如方言、民俗、神话传说、建筑、信仰、思维方式和社会规则等都显示出村落的边界标识与认同功能,构筑出了有别于其他村落的文化标志,也借由多元化的标记赋予和巩固着有别于其他村落的文化群体的共同心理。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古村落保护困局

传播载体的逐渐消亡影响到特色文化的物质载体。我国学者大多将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方面,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知名学者萨默瓦和波特在《跨文化传播》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群体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通过个体和集体努力而获得的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态度、意义、社会等级、宗教、时间概念、角色、空间关系、宇宙观,以及实物和物质财富等所有一切的积淀。^[1]综合以上这

收稿日期:2018-04-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5C248)。

作者简介:綦鹏(1982-),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媒介与社会、新媒体应用研究。

些视角,我们从传播载体的角度将古村落文化分为精神、物质和社会规则三个层面,其载体分别涉及到古建筑、文物古迹、艺术作品、风俗习惯、戏曲、传统手工艺及古村落原住民等诸多方面。在历史上,这些载体作为构成古村落文化系统的因素,相互耦合共同支撑与传承着当地特色文化。然而近些年来,这些载体在城镇化建设、旅游景点开发及经济发展的人口流动中逐渐的减少甚至趋于消亡,虽然国家及省市各级政府部门纷纷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但载体尤其是精神和社会规则承载者人的流动却无法避免。有机论认为任何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都不可能删除而不损其完整意义,随着古村落文化载体的逐渐消亡,特色文化的完整保存与呈现势必受到影响。

古村落在文化上正面临着基因变化危机。随着现今传媒手段与传播方式的不断丰富,信息呈现加速流动的态势,信息的输入让部分古村落原住民产生了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作为文化传承基础的特色文化的认同感受到挑战。研究者们认识到了文化的认同感对于特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作用,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大众传播造成了民众思想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逐步趋同、民间艺术与民族习俗的逐步变化、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逐步改变,大众传播的文化移入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消解。^[9]同时,原有的历史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开发中也面临被盲目置换的危机。

现有对福建古村落文化保护的研究囿于学者自身学科的窠臼,同时也呈现出浅层综合化和同质化特点。虽然文化学者及古村落保护者们纷纷在传播生态框架内探讨各种措施、推出各种文化产品试图加强对古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但仍跳不出特色文化本体研究、资金投入、宣传与监管、旅游开发与保护等的主题论域。如有研究者从建筑学领域探讨了闽西北古村落的“保护策略、总体保护、街区保护、建筑整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模式,还有研究者从风景园林学角度提出闽西长汀县三洲古村落保护“必须依靠政府相关部门的引导,发挥村民保护村落的积极性,传承村落景观空间的传统文化”等,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总体上都是从不同学科各自的视角进入古村落文化的保

护中,呈现出措施碎片化、视野局限化、方式同质化和表面化的特点。

从现实来看,大量的各类福建特色文化纪录片产生了,但除却质量的参差不齐外,这类纪录片还存在独特性与同质性并存的特点,而且去语境化阐释现象严重。如有学者研究了客家地区的影视人类学,发现其叙述模式和文化内涵在广大的客家地区广泛适用,所生成的客家意象趋向于单一化,客家文化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不能在客家题材纪录片中显现,这相反真正影响了对客家研究的深入。^[9]而且反映福建差异较大的文化类纪录片并没有注意到不同群体的文化适应状况,传媒界工作者们也力图以传统媒体结合现代媒体的宣传方式唤起人们的自觉,但大都具有片段化、片面化及表面化的特点。

二、传播视域中的保护意识唤起

需要从功能发挥的角度跳出已有研究框架,打破学科壁垒,寻找古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的全新视角,以期破解内源性不足的传统载体困局。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文化三个层面载体的逐渐消亡已不可逆转,应跨出文化的本体保护路径选择,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来关照现状,充分寻求和利用外源性载体来弥补本体的不足。在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人类文化学者非常重视传播的重要作用,认为特色文化的传播将在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起到重要作用,不仅能够唤起人们对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意识,更重要的在于唤起人们的文化生态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文化生态建设,为重建和守护人类的精神乐土而奠定历史之基。民俗学者陶立璠认为,民俗研究需要与图像配合,以便于了解民俗事象本身,^[4]在传统村落的文化 and 民间生活样本遭城镇化侵蚀的当下,对即将消亡或被遗忘的传统文化事象的抢救式拍摄和采撷,更是传播学者的历史使命和人文担当。^[5]特色文化的传播一旦被广泛应用,它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所传送的具体内容。^[6]

在现代传媒手段异常丰富的今天,应积极利用影视传播的理论方法来提升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

识,结合福建省古村落的文化特点,构建古村落的文化意象。在大众传播进入视觉化的时代,从传播手段的特点和被接受程度和范围来考虑,影像可当做现有古村落特色文化载体之外的另一重要替代性载体,其构建的古村落文化意象,可在解释现存文化符号的基础上达到对特色文化的理解,可在索引古村落文化的基础上唤起人们对于特色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增强保护意识。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的高级搜索中使用主题检索,将关键词设定为“影像+文化”并含“意象”,年限设定为“2000-2018”,来源期刊不指定以扩大搜索范围,共搜索到文献五千余篇,再将关键词设定为“影像·意象·建构”后,共搜索到8篇文献,而将主题关键词设定为“古村落”并含“影像”后,检索到7篇文献。通过对三次搜索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文化意象的建构研究停留在文学作品方面较多,有的学者尝试对某些文学作品的意象进行解析,还有学者对部分影像的意象进行分析,而试图用影像对文化意象进行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并不多,还需要站在传播学与文学交叉融合的高度探讨文学意象的建构。那么在建构古村落特色文化意象的过程中,影像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建构是接下来探讨的内容。

三、影像对特色文化意象建构的支撑

文化意象是象征着某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文化认知方式和取向的思维符号,体现着其智慧和传统文化,是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它包括外延和内涵两个部分,外延可认为是可被感知的具体形象,是文化的载体与媒介,内涵是主观延伸,是联想意义。影像传播,主要指视听信息的传播,或信息传播的视觉化,本研究中的影像特指音视频手段。

影像意义的文化意象建构包括意象的外延(具体形象)、内涵以及表现符号三个方面。文化意象的文字呈现要经过表象、语意两个阶段才能形成,笔者认为影像中文化意象的建构是在呈现表象、叙事表意的基础上通过与其关联的现存文化印记符号来实现的,意象通过符号的索引达到了人们对文化的理解。

从影像的本质来看,影像是文化历史的选择与

再现,突破了现存文化载体的时间限制,影像可真实性或虚拟性的再现特色文化意象构建的历时与共时性符号和语境,再现意象生成的表象这一基础色块;影像实现了对文化具象与抽象的平衡,意象本身的固有性质存在于该意象同它代表的具象之间的关系中,影像既能够补充因概念和抽象表达而带来的意象形成缺憾,又展示了特色文化的能指与所指,契合了传播对象的心理需求;影像的视听统合创设的与现实接近的文化情境、与实物接近的特色文化符号,生成构筑了信息、观念和情感等的传递平台;此外,影像传播有着吸引视觉听觉原始天赋的霸权力量,促使古村落文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四、影像对古村落文化意象的建构

文化意象的建构根植于差异较大的多元样式的古村落社会结构中,文化意象的外延与内涵是在各古村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借由符号意义、社会互动生成的。影像在全面呈现表象、阐释特色文化内涵的同时,藉由福建各地差异明显的古村落文化而形成的“一村一品”,打破现有主流、受者中心与共同话语叙事的逻辑,从文化的物质、精神和社会规则三个层面,构建丰富而又复杂的个性和差异性明显的文化意象叙事场。

(一)原生态文化差异性特征的深入探寻

福建的古村落文化一般都具有明显的识别性,这是其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影像意象的叙事场应首先寻找其差异化的原生态文化特征。费孝通曾提出,实现对古村落的持续保护,必须按照原真性的原则。古村落影像意象的构建就是展现古村落最有价值的所在,即原真性的建筑风貌、风俗习俗、社会规则,以及最终由此形成的鲜活文化灵魂。同时,一个古村落内生活的原住民一般都有大致相同的方言、文化记忆和相同的文化理念,而且村落内的成员之间通过形成的乡约构建起了一个井然有序、自行维持而又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这点在福建各古村落内表现异常明显,其意象的构建须深入挖掘有别于其他村落共同体的个性,依此做为影像意象建构的基础。摒弃现有古村落文化传播中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迎合观众、特征

同质化、虚假宣传、过于娱乐化叙事等传播行为。

(二)特色文化的影像意象建构途径

在古村落的差异化文化特征挖掘与提取后,沿文化特征主线,意象的影像构建按照文化的载体与内在而展开,以此与文化载体和文化内涵相对应。

1. 意象建构的基础:现存符号时空内涵的影像诠释

古村落文化意象的生成首先表现为对特有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解读,它是一个村落特有文化的抽象体现,影像建构意象的叙事中应注重对特有符号的诠释。影像呈现表象以构筑文化意象的基础,影像通过符号内涵上的延伸组成多元复合的文化意象。影像跨越时空诠释建构不在场的历史语境与符号意义。在不同历史场域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思想积淀与生活形态的不同,符号承载的意义也有所差异,对符号的意蕴表达也不尽相同。符号在一定的情境中才能确切表达涵义,也只有在一一定的语境中才真正理解其意义,根据影像叙事需要,可发挥其跨越时空呈现的优势,可将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阐释出来。能指与所指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在某个相对平稳的历史时期语境中,人们所处的社会中的各平行因素,如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这一符号的理解。^[7]福建分布于各地的古村落,大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特色文化都呈现出不同的表征,文化符号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已不存在,有些符号的所指也发生了改变或不断进行重构,对这种历时性的演变的重现正是影像的本质优势体现。具体来说应该是古村落现有文化组成的建筑、楹联、艺术作品、风俗、传说等外在的符号表现,在形成、演变及现时涵义的来龙去脉,建构特色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意象。

2. 差异文化的精神与社会规则影像意象建构:身体的表达

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限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制度、信仰等,是内化于身体这一媒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的精神和规则层面。布尔迪厄认为从习惯、社会习性、场域和实践等概念中所呈现的身体表现,是与历史契合的内化知识,意义诞生于社会互动,身体的行为阐释了文化中的人们再现世界与认知世界的架构。

客家的耕读传家、闽南的侨乡文化、闽北的“一地一俗”文化格局、闽东的畲族文化等都可以从社会化了的身体实践中寻找到逻辑。影像语言表达手段的开放性、多面性,能够较为自由的构建文化的时空语境。

古村落场域提供了身体展现的限制性结构化空间,要建构福建差异明显的古村落文化意象,就须潜心于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中探析,避免去情景化的再现。某一意象特色文化的影像构建,须深入到该文化语境中,通过创设情境或真实纪录解释当地文化意象的自行生成,摒弃传播者对文本的自我价值判断,将话语权力交还给文化中的原住民,构筑平等交流的平台,还原古村落生活的本来面目。后期制作中,充分尊重文化的原貌,选取有利于意象建构的影像组成进行叙事,同时考量传播效果与范围,加入利于传播接受的附加属性的共同文化阐释,破解地域性的方言与身体呈现的理解难题。

3. 影像生成意象的逻辑

古村落文化意象是经过受传者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形象,物象的简单影像再现并不能产生文化意象,而是以物象为载体的精神之物的艺术化再现。这就要求影像叙事要具有完整和谐与统一性,深入剖析影像的结构,保证叙事的逻辑;对各村落群体文化的真实展现与虚拟呈现,以不破坏语境为原则,建构文化存在的真实场域,对现存符号须真实呈现,对历史上出现过的符号,也依原态模拟,包括虚拟场景中的场所、人物服饰以及有声语言 and 无声语言等。

五、结语

打破现有研究的固有模式,从传播学视域中考量特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途径,影像手段成为解决现有原生性特色文化载体困境的有效替代性方案,而这种载体的转化并不是浅层次的,影像呈现的表象和在纵面上阐释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内涵,为文化意象的生成提供了基础,影像创建的情境也为理解多元文化提供了支撑,影像在多元复杂的古村落文化场域中建构的文化意象,除保存原貌的价值外,亦能唤起人们保护特色文化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5-67.
- [2] 李勤.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J].当代传播(汉文版),2005(5):42-46.
- [3] 张凤英.影视人类学影响下的客家题材纪录片创作[J].龙岩学院学报,2016,34(3):21-26.
- [4] 王金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61.
- [5] 赵凤兰.用影像抢救和保护即将消失的民俗[N].工人日报,2015-12-21(A2).
- [6] 约书亚·梅罗维巧.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01.
- [7] 贾志媛.“鼎”符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J].现代装饰(理论),2016(9):13-15.

(责任编辑:白琳)

Imag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magery in Fujian Ancient Villages

QI Pe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12)

Abstract: Fujian ancient village culture in the view of communication shows a variety of rich and complex features. In the face of the demise of cultural carriers in various cultural structur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culture system encounters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The ancient villages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models use imagery as a cultural carrier to construct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mages by longitudinally interpreting the space-time connotation of symbols and body image presentations, so as to preserve and inherit the ancient village culture and raise people's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ultural imagery; ancient villages; image spread; construction

基于教师职业生命周期理论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思考

林立达, 马莉婷

(福建江夏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教师是社会职业体系的重要构成,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教师专业化成长贯穿于教师职业成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且对职业化要求存在阶段性差异,在专业化成长的初期和衰退期阶段,职业化要求较低,而在成熟和稳定期阶段,职业化要求最高。同时分析表明,教师职业技能和知识结构基础、教师职业生涯意识培养和提高、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培育和形成、教师职业通道设计和模式创新是影响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并以此为基础,从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质、职业化培养、教师激励等多角度提出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职业生命周期;教师专业发展;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83-06

一、教师职业的角色定位

任何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教育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源于知识特别是符号化、物化知识的出现,并以此不断演进发展。从教育史角度来看,最初教育活动并不是独立的社会分工活

动,主要依附于人类日常生活中,长教幼、父教子、师教徒是这一教育活动的最主要教育形式^[1],言传身教是这一教育活动所采取的最主要教学手段,它更多体现为一种非符号化知识和人类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随着知识符号化和有形化的发展,教育分工逐渐从日常生活中独立出来,专门化的教育活动开始逐渐形成。

教师是指受过专门的系统培养、向受教育者传授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需要人才的专职工作者,承担培养社会需要的学术性或职业性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几大职能。学校是专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非盈利性组织,是教育分工和教育教学活动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职能为一体的高等教育组织。随着学校组织的出现,以学校为组织依托的正规化教育逐步取代原来的长教幼、父教子、师

收稿日期:2018-04-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1702068045);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FJJKCG17-136);福建江夏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2017A007);福建江夏学院校级课程群教学团队项目(17JXTD07);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专项研究课题(FJJKHX16-055);福建江夏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2016A001)。

作者简介:林立达(1978-),男,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商务经济研究。

教徒等教育模式,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教师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角色主体,成为职业化教师。随着教育分工的发展,教师职业成为社会职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角色一样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每一种职业都具有其自身的职业内涵和职业定位,承担着特定的职业职责和社会职能。不同职业,其内涵、责任和义务不同。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形成和积淀了符合其自身特征的职业观、职业道德、职业行为、职业意识、职业态度,承担社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随着教育内部分工的发展,正规化教育活动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活动。但是,不管是从事基础教育活动的教师,还是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教师;不管是普通高校教师,还是高职院校教师,其本质上都是教育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师作为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行为主体,其教育活动是一种高度专门化、职业化、素质化的社会活动,是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职业行为。因此,教师成长具有专业化成长的基本属性和客观要求,教师必须遵循教育专业化的基本要求。

二、教师专业化成长阶段及其职业化要求

教师专业化成长以专业化发展为目标,贯穿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全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每一个教师在专业化成长道路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相继历程,包括参与教师职业有关的各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动,职业行为态度、职业价值观、职业期望和愿景的形成和发展。

对于任何一种职业,都有其自身职业成长的生命周期。教师专业化成长也受职业生命周期的约束。根据职业成长生命周期的基本构成和特征,教师职业成长生命周期包括职业成长初期、职业成长发展期、职业成长成熟期、职业成长稳定期、职业成长危险期、职业成长衰退期,且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成长阶段,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职业要求与专业化成长的具体内容不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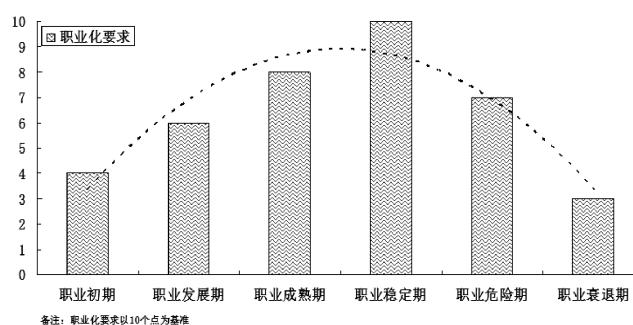


图1 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

Fig.1 The life cycl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这里选择用10个指标点作为衡量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教师职业化要求程度。如图1所示,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教师对职业化要求呈倒“U”型变化路径。在专业化成长的初期,教师刚刚步入这个职业,教师在相对长的时间里处于角色转换过程,教师职业意识和认同度不高,教学职业技能不强,所以在专业化成长初期阶段,对教师的职业化要求比较低,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新教师而言,这一阶段更重要的是加快新教师从非教师角色向教师角色转换,知识学习向知识传授转变,所以对于这一成长阶段的教师职业化要求较低;第二,教师成长须遵循专业化成长的内在规律,虽然教师在初期阶段的职业发展层级和职业化要求比较低,但这一成长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随着新教师职业角色转变的实现,职业意识和认同度得到提高,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得到提升,教师自身职业成就感和收获也越来越多,自我效能感越来越高,职业倦怠降低^[2],所以相对于教师专业化成长初期阶段,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发展期、成熟期和稳定期三个关键性阶段,对教师职业化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成熟和稳定期阶段对其职业化要求达到最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演变,致使教师知识结构需要不断优化、教学科研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同时教师适应职业素质新要求的能力在递减,所以教师专业化成长可能面临或进入到专业化成长的危险期和衰退期。当教师成长演进到危险期阶段,甚至进入专业化成长的衰退期阶

段,教师职业将面临两个发展方向:第一,教师职业发展面临职业转型;第二,教师职业生涯已逐渐接近“尾声”。一般而言,进入这一成长阶段,教师具有较为丰富教学科研经验,教学科研活动更多体现为经验活动,对教师职业化新要求会越来越低。另外,为了适应职业素质新要求,教师要通过接受培训或再培训更新原有知识,对新环境和新要求做出适应性调整。

综合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职业化要求可以发现,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初期和衰退期的职业化要求较低,而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成熟和稳定期的职业化要求最高。

三、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影响因素构成与分析

(一)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构成

教师专业化成长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和职业成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实践表明,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是多元化、综合性的,这些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考虑到教师职业对教师素质的高要求和特殊性以及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对教师的职业化要求,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教师职业技能和知识结构基础,教师职业生涯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培育和形成,教师职业通道设计和模式创新(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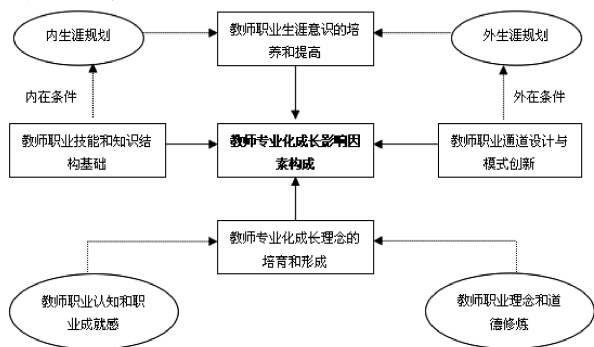


图2 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

Fig.2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二)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深度剖析

教师职业作为一种高素质化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师承担“经师”和“人师”两种角色,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3],由此教师首先须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积淀,包括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理论知识的扎实性、经验知识的宽厚性^[4];具备较高水平的科研能力或潜力、服务社会的基本能力以及具备最基本的教师职业技能和创新性教学手段。这是判断教师是否具备教师资格,能否成为合格教师的最基本要求和素质条件,是形成和发展教师人格、学识和学术魅力,履行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能力和知识基础。

教师职业生涯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为教师专业化成长指明了行为方向。教师专业化成长不仅是为了满足低层级生理安全需求满足,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得到社会认可和尊敬,职业价值和自我发展的实现。教师职业生涯意识的形成有利于教师一开始就关注整个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显然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教师的长期人生规划,它有利于弥补教师短期机会主义倾向,缓解和消除教师所面临的种种压力。^[5]

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培育是教师成长的思想动力。教师专业化成长除了需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外,还需要有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导航。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是教师发展的新理念,它不同于非职业化成长理念。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为教师成长指引方向,让教师沿着职业化发展道路逐渐成长为具有人格、学识和学术魅力的专职教师。然而,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形成受到教师职业认知和职业成就感,以及教师职业理念和道德修炼等多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为培育和形成发展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对于教师培养,就必须加强教师职业认知、职业理念的引导和培训,通过各种形式展现教师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增强教师职业成就感,提高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业魅力。

教师职业化通道设计与模式创新是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路径支持和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教师职业通道是学校或者社会(教育管理部门)提供教师成长发

展的路径安排。教师职业发展通道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了实现职业目标的发展机会和路径支持,教师可以遵循这一路径实现专业技术职称的晋升和工作岗位的轮换。教师职业发展垂直通道,教师通常只能逐级向更高专业技术职称晋升,遵循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金字塔”式的职业成长路径。事实上,除了教师职业发展垂直通道外,还有职业发展水平通道、网络型职业发展通道和多职业发展通道。教师职业发展水平通道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工作内容选择,例如教学型教师、研究型教师、教学科研综合型教师。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对教学、学术研究的选择有所侧重,这为水平型职业发展提供了可能。教师在获得一定专业技术职称的前提下还可以参与教学科研管理,成长为双肩挑型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其职业优势,增强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四、高校教师专业化成长路径思考

(一)制定和完善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教师专业化成长须以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为基础。如果教师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或者没有为教师提供一个较好的职业生涯发展外部环境包括激励和约束环境,那么教师专业化成长将受到限制和影响。组织心理学教授施恩(Edgar H. Schein,1987)提出职业生涯包括外生涯和内生生涯。^[6]外生涯是组织为员工在不同成长阶段提供一条可行的专业化成长道路;内生生涯是职业成长过程中更注重个人职业价值实现、职业成就感、自我发展。显然,教师专业化成长过程中必须注重教师生涯的内生涯和外生涯,也就是说注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教师自我提升能力的培育即教师内在因素的优化。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本身就是长期且复杂的行为活动,它贯穿于教师整个职业成长过程。特别是青年教师,由于他们处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职业化意识模糊、职业技能不强等问题,但更突出的是没有制定一个较为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

发展是模糊的,需要给予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辅导。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为教师专业化成长指明了方向,成为教师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和完善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要通过教师成长培养,改善教师内生涯和外生涯环境,根据职业生涯成长的不同阶段通过自我评估确定职业目标及其实施方式来制定出可持续性的职业生涯规划。^[7]然而,教师内生涯和外生涯环境优化需要“自我培养即自我改善”和外部条件的支持,所以一方面学校需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搭建成长平台,为教师的外生涯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教师职业认同,通过职业生涯规划辅导使教师职业认同更为清晰,职业生涯及其作用更为了解,在追求职业价值的驱使下实现教师专业化成长目标。

(二)教师职业素质提升与专业化成长协同推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努力造就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求教师以人格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规划纲要》所要求的教师素质与教师专业化成长目标相吻合,教师专业化成长目标就是教师在职业化成长过程中使其成为师德高尚、业务精湛、人格和学识魅力都很强的教育教学活动从业者。

每种职业都担负着特定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8],要成长为合格优秀的职业教师,就需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人格和学识魅力。职业道德是职业主体在特定工作和劳动中通过内心信念维系,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教师职业道德就是教师职业所应担负的特定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就是履行好教书育人的职责。教师人格和学识魅力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美,表现为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它由教师的需要兴趣、动机信念、职业价值、气质性格等多种成分组成。^[9]所以,教师专业化成长需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人格和学识魅力的培养和引导。

教师职业素质的提升是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关键。教师职业素质除了教师具备高尚职业道德、人格和学识魅力外,还要求很高的知识能力素质、生理心理素质。具体来说,教师需具备专业的教学能力、渊博的学科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教育教学手段、良好的个性修养、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教育教学主体之间关系的能力。教师职业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发展过程,通过教师专业化成长使其成为综合素质过硬、师德高尚、人格和学识魅力很强的教师。

(三) 遵循教师专业化成长培养意识和原则

教师专业化成长是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的统一。其中,职后培养包括入职初期培养、中期和后期培养。教师职业是职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培养是实现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重要举措。所以,教师培养应遵循职业化培养意识和原则,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各个阶段对培养内容、方式和评价制定相应的职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标准。还有教师专业化成长是一个持续渐近的过程,教师培养内容、方式和评价的职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标准应随着培养环境和成长阶段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

教师专业化成长需要有职业化培养,坚持全面培养和个性培养相结合的原则。成长为一名职业教师需具备综合性职业素质,显然教师职业化培养应该是宽口径和全面培养。宽口径和全面培养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职业认同、职业理念、职业道德、职业生涯规划等内容的培养,还包括角色转换,以及入职后职业技能如教育教学技能、教学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知识文化创新传承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但是,每位教师又是一个独立个体,每位教师在专业学习、知识结构、职业习惯、职业规划都有所不同。对于教师培养,应该尊重每位教师的个性发展,在培养过程中关心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心理变化,跟进教师专业化成长进度,为教师专业化成长提供持续的专业训练和职业引导,为教师个人发展提供激励机会和发展平台,以促进教师个性发展。

(四) 设立教师专业化成长专项基金,提高教师激励强度

提高教师激励强度首先要建立教学科研专项支持基金。通过建立教学教研专项基金,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科研项目研究,在参与教学科研相关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拓展专业知识,创新教育模式和手段,丰富教学内容,为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提供项目支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以指定一定比例投入作为人才引进和培养专项。例如山东大学以科研项目立项形式专门为新引进教师提供一定的科研启动资助,并制定了专门的制度安排,即《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人才引进与培养类专项)》。根据制度规定,国内新引进教师按三个等次获得资助科研启动资金:自然科学类一、二、三等分别可获得8万元、6万元和3万元;人文社科类一、二、三等分别可获得4万元、3万元和2万元资助。^[10]其次,建立教师专业化成长专业基金。教师专业化成长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入职的初期阶段,教师可通过接受岗前或入职前的职业培训,以及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学习指导教师的教育教学成功经验,并将这一经验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进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教学反思将所学的成功经验内化为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经验,从而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和实现职业化成长。随着教师专业化成长阶段由初期进入到发展期、成熟稳定期,在这一阶段,通过传帮带这种模式的导师制培养,已不能满足教师在这一阶段的成长需要。此时,需要创新教师的培养方式,其中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是在这一职业发展阶段满足职业化成长的重要途径。其中,赴国内外知名高校访学、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都是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的重要形式。所以,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应该设立教师专业化成长基金,这一基金不仅服务于教师的岗前或入职前培训,导师制培养模式下对指导老师的激励,同时还可专门服务于教师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鼓励和支持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高校访学和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为教师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提供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 [1] 王道俊. 知识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方式问题初探[J]. 课程教材教法, 2011(2):14-31.
- [2] 陈秀芹. 团体辅导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实验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6(6):69-71.
- [3] 罗国杰. 论“业师”和“人师”: 谈谈教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J]. 高校理论战线, 2013(1):15-17.
- [4] 王焕伟, 高鑫. 高校教师如何提高人格魅力[J]. 学理论, 2015(30):121-122.
- [5] 姜捷. 论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问题及其缓解对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123-130.
- [6] 李瑞星, 郑金伟. 职业生涯理论综述及对职业生涯教育研究的启示[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13(18):54-60.
- [7] 赵兰芳, 蔡永铭.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规划的调查分析研究[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148-151.
- [8] 郭强. 职业道德与职业生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150-156.
- [9] 于漪. 教育魅力: 青年教师成长钥匙[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6-90.
- [10] 山东大学人事部. 山大人字(2010)134号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人才引进与培养类专项)[EB/OL]. (2010-07-07)[2018-03-26]. <http://www.rs.sdu.edu.cn/info/1140/4229.htm>.

(责任编辑:陈 果)

Analysis of the Path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eacher Career Life Cycle Theory

LIN Lida¹, MA Liting²

(1.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eaching profess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professional system, and the teachers shoulder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ng responsibility.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goal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which runs through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life cycle of the teacher's care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initial and recession perio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is at low level, and during the mature and stable period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is the highest;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teachers occupation career, and to form and foster the idea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Channel desig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career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On the basis of this, it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reer plann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motivation.

Key words: career life cycl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path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基于语料库建设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策略与实践

黄静雯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社科公共部,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推动了社会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信息科学、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传统大学英语教学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为此,大学英语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从教学改革和动态管理等方面入手,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如何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遵循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述创建基于语料库建设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的策略,促进大学英语教学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要。

关键词:语料库建设;大学英语;分级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89-05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大量学者对语料库建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语料库语言学也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崭露头角,给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语料库的建立是基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语言,即将人类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具有典型性和真实性的自然语言按照一定的采集标准进行抽样后组成一个数据集合,也就是语料库,然后大家通过查阅语料库数据来进行学习。而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语料库的建立来改变大学英语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教师分级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查阅学习语料库内容的同时,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还可以促进学生从被动接受向个性化学习的转变,方便学生有能力从各个方面发挥英语学习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

一、语料库及其应用

语料库的建立是基于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技术

收集语料库的电子数据,在国外现代教育中,相关专家学者早已开始了对语料库的研究应用,其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了语料库的发展史、语料库语言的采集以及语料库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在国内,针对语料库的研究兴起于 80 年代中期,直至 90 年代语料库研究才受到重视,到 20 世纪相关学者开始了将语料库与大学英语分级式教学的结合。语料库的建立研究对促进英语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目前我国针对大学英语语料库分级教学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语料库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之间的关系还不多见。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较为突出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制定出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作为语料库的服务对象,语料库的建立给大学英语的阅读、写作、语法等基础教学提供语言基础和学习氛围。一方面,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根据大外学生英语的不同水平和学生学习的特点,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教学。对此,教师的教学实施方案、教材的解读以及教学内容都可以根据语料库中的内容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学生对教学语料库的查阅学习情况,然后根据学生的学习结果对学生在学习中遇到

收稿日期:2018-07-14

作者简介:黄静雯(1985-),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英语教育研究。

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并对学生的语料库学习进行策略性的培训,从而提高教师分级教学的质量。在教师分级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教学语料库可以随着教师的教学越建越大,资源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显著,从而使得语料库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确保了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有效性。最主要的是,语料库的建立有别于大型的语料库教学图书馆,它的规模较小,且是经过精心筛选后的,学生可以自行查阅,进行自主学习,在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弊端

随着高考诸多优惠政策的开放,新生入学人数逐渐增多。在此情况下,大多数学校都采用大班教学模式,将3到4个小班结合起来上课,学生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但是,由于每个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在诸多客观因素或主观因素的影响下,英语课堂学习兴趣不高,消化的知识不好。首先,在如此大规模的课堂教学中,很难考虑学生个人之间的差异性教学,因此只能采取传统的板书式教学,很难做到因材施教。英语水平往往集中在学习进度的统一上,容易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差距,可能会给学习进度较差的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障碍,学生逐渐丧失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其次,大学英语教学同传统的照本宣科灌输式教学模式有着相似之处,学生虽然接收到了知识,却无法很好的进行消化,似懂非懂,缺乏主动性和个性化学习。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对于教师的依赖性过大,缺乏自我意识,长此以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会有心理障碍和厌烦情绪。最后,大学英语教学的普及性不高,学生对音乐学习接受能力不同,所以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学习需要和结果是不同的,采取统一的教学方法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对学生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却忽略了对人文知识、文化背景和历史的研究,使得学生在学习语言和文化背景时不能完全理解英语中表达的复杂内容。如古典文学、

英美文学、人文地理学等等,只是说说专业知识,而不是利用多媒体等高端辅助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和实用能力不强。

三、分级教学模式的提出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顾名思义,是以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综合发展为基础的,在高校教师的支持下,努力挖掘学生的潜能,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教学体系。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不仅教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学生的英语基础也各不相同,老师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首先要学会因材施教,分级教学,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教学,帮助和鼓励贫困英语学习者。其次,教师要注意提高学生的英语基础,缩小学生间文化差距,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固有思想。分级教学模式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使学生能够更积极地配合教师的教学,从而为学生创造一个公平、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学生更加自信的学习。口语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迅速提高,让学生体验到学习英语的乐趣,这样,学生就能更容易地交流和学习英语,英语水平也可以充分发展,也有利于学生在课本中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应用的实际经验,可以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更多的综合性人才。

所谓“分级教学”,即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不同的特点和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要求明确规定了大学英语教学应进行分类,因材施教,提高大学生英语水平综合应用能力的实际需要。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高考英语个人能力的差距是非常显著的。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化教育,越来越多的大学英语水平较低的新生入学。大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差甚远,如果继续使用传统教学模式,意味着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学进度和统一的教学内容,学生即使拥有个性,在这样教学氛围之下也得泯然众人矣。因此,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英语水平,我们进行分级教学,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使教学更有针对性,符合当前大学生现阶段

段的基本情况。

四、基于语料库建设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策略

(一)语料库的建设

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指出,英语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提出一般、较高和更高层次的三种要求,在统一的语料库之下对其进行不同等级的划分后建立起子语料库,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对此,学者将在新视野大学英语课程(1-4卷)中使用语料库,新版本的大学英语课程(卷1-4)是通过大面积采集不同语言来源编写而成的,其内容主要涉及到了听力、语言交际、写作、阅读和翻译等,致力于对学生能力的全方位培养。就语料库的内容而言,它的范围十分的广,涉及到了多个领域,大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而又可以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并且,语料库的资料是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出现,方便大家随时阅读,如有必要自行下载纸质文档。哪有人会想它是否安全?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英文语料库的建立是基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系统软件的,给资料库信息资料的共享提供了安全保障,真正实现了语料库筛选、注释和处理,将合格的语料库输入系统的语料库中。根据项目规划,分两个阶段建设4个子语料库系统,第一阶段是创建教材语料库和答疑语料库。第二阶段从听觉和视觉出发建立起口语语料库和视听语料库。

1.语料库的收集和分类

该语料库的初始语料库是从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英语教材中进行删选出来的,包括了2007年出版的“创新大学英语”系列教学材料(9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至2009),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等,每一本教材都教育书籍编纂者的心血。首先,在选择材料时材料准备队伍要严格把关,选材难度适中,题材广泛,多样化,兼具艺术和科学的渗透,以及专业学科的自然知识。其次,写作风格涵盖了书面语言和口语语言,涵盖了所有的语言领域。再次,对语料库的难度要进行等级划分,针对不同的语言教学

对象语言学习水平的高低,有着不同选择,力求不同英语水平等级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最后,语料库的内容必须要根据不同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时间长短、水平高低、类型划分、教学特点等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并且语言的选择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原则进行划分。其中,测试语料库中初始语料库的语言来源主要包括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翻译教程》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全新版大学英语阅读教程》阅读内容和翻译内容。试题语料库中初始语料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大学英语长篇阅读教程》中的长篇阅读文中即试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大学英语分类阅读》中的阅读理解题和完形填空题、四川大学出版社《全新大学英语听力教材》中的听力训练题等。

2.语料库标注

语料库被收集后,需要清除语料库文本。通常在文本中会有各种符号和格式错误,我们使用的是侦探工具,PowerGREP实现文本的单个或批量排序进行人工复查。文本以纯文本(TXT)格式被存储,文件经过处理后都是统一的文字语言或数字,并进行了分类储存。同时,针对不同文件夹中的文件名应该更加清晰明了,使学生在进行查阅是可根据文件名快速的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对此,需要遵循以下7个原则:(1)标签代码可以删除并恢复原件,初始语料库。(2)可以分别提取注释并分别存储。(3)语料库的编者应该注明库中各代码的含义以及查阅原则。(4)针对库中的说明性内容,应加以说明注释人和注释中使用的方法。(5)应该向用户显示语料库标注完善界面。(6)注释应被广泛接受。(7)任何注释模式不能作为第一标准,在这些原则中体现尽可能多的原则。在对语料库内容进行标注的时候,通过自动标注工具PXCook,遵循Leech中提到的原则,科学、清晰的进行注解。目前,我国国内最为常用的注释语言为C语言,可对大块的程序进行注释。

注释是学生在进入语料库是最为基础的动作,通过对文章的内容进行注释来帮助学生学习和检索,标签的设计有三个层次:(1)语篇层面文本检索,即通过检索文章的篇名来检索自己想要的内容,该层次的检索通常用于大学教材的编写。在使用位置检索时,可

以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定位,并注明了文本的难易程度,清晰明了。在教材编写中要选择语言素材和高频语言现象优先原则;教具的选择通过检索,我们选择主题和体裁相关的课堂辅助学习资源,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编写试题,通过搜索后,选择中等难度的文本作为测试题。快速阅读,深度阅读,完形填空和听力文本材料。(2)段落层次语料库从段落语料库中检索。应用于:A 写作样本检索,通过检索选择写作一个高度自治的和本地的段落语料库,如特定段落描述肖像和服饰材料;b 辅助材料的选择和教案的编写;c 试题的准备。(3)句子层次,这一层检索完整的句子,可以应用到:语法教学,将从句、祈使句、倒装句等特定的英语语法贯穿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课堂之中。一般一节课中涉及到的语法内容不易过多,通常选择一种含有特殊语法的句子让学生来自主分析语法结构、含义等。编写试题,一套是体重的难易程度要适中,不能太过简单,也不能全是难题,且是体重涉及到的语法内容要具有代表性。作为语料库的语料来源和试题中的翻译问题,句子只需要手动标记语法点。

(二) 构建以语料库建设为目的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要建立在学生的不同学习水平上层次上,根据学生的英语成绩高低或学生不同技能的培养,遵循学生自愿原则对学生划分为 A、B、C 三个不同的班级进行分级教学(如图 1 所示)。教师要根据学生英语学习的水平选择相应的语料库进行教学工作,并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对学生的进行阅读、听力、交际等能力的综合测试,以学生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以及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来检测教师的教学效果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建立起语料库分级教学模式。在此种教学模式下,教师要转换角色,成为学生英语学习的引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引导学生去挖掘自己的兴趣和潜力,有目的性的进行实践学习。大学英语教师还要时刻了解学生对教材的学习进度,针对学生比较薄弱的部分要进行专项训练,以此提升和巩固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能力。教师要将实践与总结结合起来,先实践、再总结、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在世界中总结经验,再将其收录到语料库中,不仅丰富了语料库

的内容,更是提高了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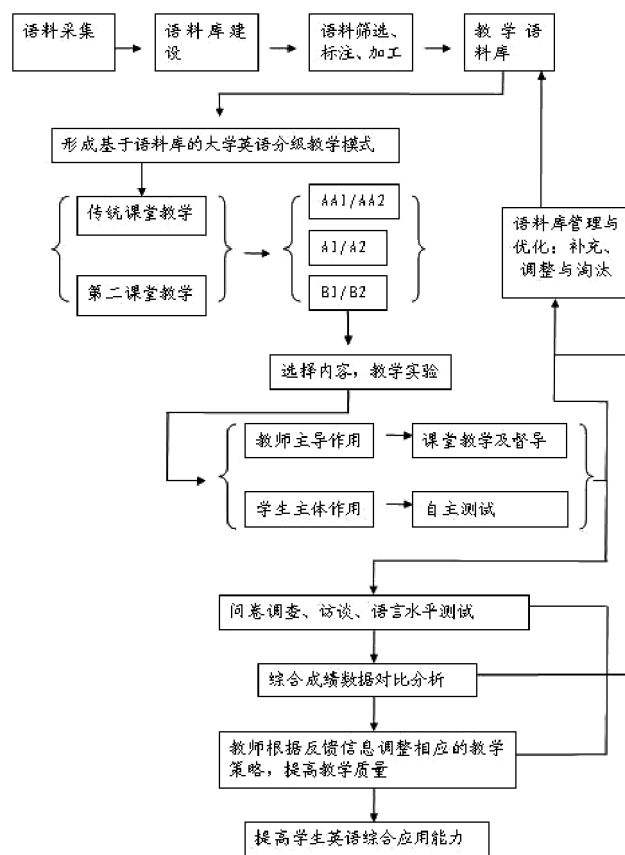


图 1 以语料库建设为目的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图示

Fig. 1 Schema of College English grad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orpus construction

五、结论

学生英语学习水平的不平衡性给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因此,语料库的构建是基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为目的,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教学心态的转换,在分级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听、说、读、写语料库的作用,对学生开展多元化教学,引导学生自主理解、总结和运用语料库的使用情况;另一方面是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进行课外自主学习和独立测试,在课堂教学和小组沟通相结合的基础上,将问题及时反馈给教师。因此,基于语料库建设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有着其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优势不管是对于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一大助力,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教学,学生更

好地学习。

参考文献:

- [1] 蒋柿红, 李广伟. 以语料库建设为目的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研究与实践[J]. 海外英语, 2014(4):73-74.
- [2] 葛诗利. 面向大学英语教学的通用计算机作文评分和反馈方法研究[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2018.
- [3] 王丽媛. 认知功能教学法背景下的大学英语“词汇深度”教学实证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 [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
- [5] 李文中, 濮建中. 语料库索引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2):20-25.
- [6] 张瑞鸿, 陈欢. 英语教学中网络语料库的运用[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5):127-131.
- [7] 董建霞. 高校英语“分级制”教学模式现状分析及优化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 2016(11):179-180.
- [8] 王东洋.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可行性研究与探索[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122-125.
- [9] 戈玲玲, 李广伟, 刘朝晖.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学平台建设及其教学模式研究[J]. 外语界, 2011(5):51-55.

(责任编辑:白琳)

A Probe into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of Graded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Based on Corpus Construction

HUANG Jingwen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need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arry out reform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twork platform,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styl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l is unable to meet the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technology into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 corpus base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l can realize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It greatly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graded teaching, and points out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College English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us, and adopts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graded teaching, course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e, new teaching evaluation model, teaching reform and dynamic management, we hop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graded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us.

Key words: corpora; College English; graded teaching

论朱子读书法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借鉴意义

——以《武夷文学读本》为例

王志阳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武夷文学读本》是一本优秀校本教材,能够满足《大学语文》教学需求,但是《大学语文》目前存有课时过短、内容过多及难以满足不同专业需求问题,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朱子读书法能够为其教学改革提供方案,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朱子读书法提供改革教学大纲的重要理论基础;二是朱子读书法提供改革考核大纲指引;三是朱子读书法能够为改革教学设计提供参考标准。通过吸收朱子读书法的精髓,运用到《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当中,一定能够使《武夷文学读本》发挥优秀校本教材的最大功效。

关键词:朱子读书法;教学大纲;考核大纲;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094-06

《武夷文学读本》是由廖斌主编,程荣和王冰云副主编的武夷学院《大学语文》校本教材,获得2017年度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本科优秀特色教材荣誉称号^[1],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武夷文学读本》遵循武夷文学发展历史的完整性,囊括了从先秦到现当代各时期的武夷文学作品,无法完全适应《大学语文》在武夷学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1.5学分,24课时的教学时间,需要重新处理,适当取舍,方能够在24课时内将武夷文学的精华呈现给学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是《大学语文》是武夷学院除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外的所有专业开设的公共必修课,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之时,也面临着各专业学生因知识结构各异,难以适应统一的大学语文教材《武夷文学读本》,而任课教师又是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或者文科专业出身的教师,难以适应各类不同知识背景的学生对《大学语文》的需求。

三是武夷学院《大学语文》课程自开设至今,全部由专任教师自主负责考核形式及考核内容,现于2017年底经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中文系会议讨论决定,于2018年上半年开始本课程按照统一时间、统一内容、统一形式进行期末考核,使《大学语文》的教学与考核按照统一标准来进行,但是文科类、理工科类、艺术类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基础,显然难以有效适应统一的考核方式,故需要深入改革完善《大学语文》教材与教学知识的讲授方法。

正因上述情况,我们从朱子读书法入手,探究解决以《武夷文学读本》作为教材的《大学语文》课程在教学大纲、考核大纲与教学设计三方面问题。

一、朱子读书法:改革《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的重要基础

武夷学院《大学语文》以《武夷文学读本》作为教材设计教学大纲,最新版本于2018年3月修订完成,基本遵循廖斌教授的理念,即“作为文化素质教育主干课程的《大学语文》应是担负学校转型发展和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对非中文学生有用、管用、适用,能夯实学生文学史知识、武夷文学、文化基础,提

收稿日期:2018-05-16

基金项目:武夷学院人才引进项目(YJ201707)。

作者简介:王志阳(1983-),男,汉族,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朱子学、福建地方文献研究。

高人文素养的教材。把《大学语文》改造为全面培养非中文专业学生人文素质、传承创新地方文化、回应与实践学校顶层设计的新课程,是学校教、学双方的迫切要求,是《大学语文》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2]。但是覆盖《武夷文学读本》的所有内容,具有完整学科知识体系,虽有详略,却缺少取舍的情况。

事实上,《武夷文学读本》作为武夷学院《大学语文》的校本教材,囊括三大类学者的作品“一是出生于大武夷地区,籍贯地理为大武夷的作者书写的作品,……二是从活动地理、描写地理看,即非大武夷籍而旅居大武夷的文人书写的关于大武夷题材的文学作品,……三是暂居或游历武夷留下的佳作……”^[3]以时代先后顺序分类,即上编部分武夷山古代文学,包括武夷民间文学、武夷山民歌谣、武夷文学的早期形态、武夷文学的昌盛——宋代华章、武夷文学继续发展、武夷岩韵文学,下编部分近现代武夷文学,包括近代武夷文学、现代武夷文学、当代武夷文学,由此形成了从上古时期到当代武夷地区文学内容,结构完整,全书达到了570千字的篇幅。^[4]这样的结构框架,完全符合武夷文学发展历史规律与现状。但是在教学大纲中,囊括《武夷文学读本》全部内容,又全部以讲授形式呈现教学内容,显然不符合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地位。如何使《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更适应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朱子读书法为我们指出了基本原则,即培养兴趣点是《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第一要义。

在教学过程中,朱子以兴趣点与趣味性作为读书治学第一要义。朱子说:

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若读之教过,略晓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看,则是于此一卷书犹未得趣也。^[5]

读书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乐趣。若能够获得书本真味,自然主动读书,若无法获得乐趣,也就厌恶读书。故在读书过程中,培养兴趣点最重要,而起始处正是让学生有成就感。朱子说:

盖人心之灵,天理所在,用之则愈明。只提醒精

神,终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穷得多少义理。徒为懒倦,则精神自是愤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6]

通过思考问题,获得义理,越发聪明,学生才能获得真正成就感。如果无法通过读书思考问题获得成就感,则懒于思考,形成自我否定的局面。故为了提升获得成就感的几率,朱子采取减法,告诫学者“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会不得”^[7]。强调集中精力于小部分内容,获得阅读内容的内涵,逐步积累读书成就感。朱子说:

某旧日读书,方其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方读《学而》第一,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方为浹洽。时下虽是钝滞,便一件了得一件,将来却又尽理会得时。^[8]

通过坚持每天阅读,理解透彻内容,实现最终的目标。这是因为内容少,能够减轻学者的思想负担,使其能够保持专注状态,激发思维活力。朱子说:

读书须纯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济事。某向时读书,方其读上句,则不知有下句;读上章,则不知有下章。读《中庸》,则祇读《中庸》;读《论语》,则祇读《论语》。一日祇看一二章,将诸家说看合与不合。凡读书到冷淡无味处,尤当著力推考。^[9]

朱子强调以纯一的状态读书,即放下功利的包袱,专注于所读内容。如果内容过多,心理负担过重,难免囫圇吞枣。故在课堂时间减少课堂内容,训练自主思考能力,让学生获得学习乐趣。正是有了兴趣点与成就感,学生自然会去寻找内涵。朱子说:

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10]

朱子在师长培养之下,对《论语》产生真正兴趣,未得真谛,自然通宵达旦寻找内涵。《朱子语类》载:

今日已觉向来说话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功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著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咏,未须大段著力考索也。^[5]

朱子反思自身治学方法存有未切合自身情况的问题,即存在为读书而读书的情况,偏离追求内圣外王的目标。故朱子反省自身不足情况,寻找适合的知识与方法。当然,朱子着力于修养心性工夫,故要求熟读《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的内容,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于各科的学习仍旧具有借鉴意义,即先详细解剖内心真实想法与理想,再查找不足之处,能够更准确掌握读书的方向性。

又因武夷地区最吸引人的资源正是武夷山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也是武夷学院大部分学生最大兴趣点,故课程教学大纲需要立足武夷山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而非受制于《武夷文学读本》的体系,方能够真正实现《大学语文》的最终目标,即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当遵循以下三方面原则:一是强化《武夷民间文学》《武夷文学的昌盛——宋代华章》《武夷岩韵文学》及《当代武夷文学》中的《散文》部分,删减《武夷文学的早期形态》《武夷文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武夷文学》《现代武夷文学》的课时,将其列入课后阅读作业部分;二是增加课程实践比例,即由目前实践课时为0的状态,增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即8课时,指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索方式获得更为丰富的武夷文学资源;三是将自主学习与独立学习作为课程最重要目标,实现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爱上学习。

二、朱子读书法:改革《大学语文》考核大纲的指引

目前《武夷文学读本》作为武夷学院《大学语文》的校本教材,其考核大纲也是遵循廖斌教授的观念,即“《大学语文·武夷文学》的编撰突出大武夷地区深厚的地方文学、理学文化和地域特色,落实学校‘传朱子理学 做武夷文章’的办学理念,肩负地方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使命,实现《大学语文》在新建地方性、应用型本科学校的转型、创新与发展。”^[2]制定考核大纲时重点强调了“五个一”人文素质培养体系,即“在授课的一个学期内,学生阅读武夷文化文学的一部读本(著作)、撰写武夷文学的一篇评论、参加一次武夷文化第二课堂活动、主持一次武夷文学文化的田野调查、创作一篇武夷文学的作品。以“五个一”的体系,突显专业能力、应用能力和审美能力等三大能力,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人文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适应南平市产业、行业的要求。”(王冰云《〈武夷文学〉课程考核大纲》虽为王冰云本人的课程考核大纲而已,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参与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学教育学院中文系《大学语文》教学任务的各位教师均是以其考核大纲作为主要内容,再简单修订成绩评定部分而已。参见王冰云:《〈武夷文学〉课程考核大纲》,未正式出版物,2018年3月。)这个体系可谓博大精深,但是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学生根本无法完成前述五大任务,因为《大学语文》仅有24课时,且属于公共基础课程,学生的重视程度远低于专业课,甚至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部分核心课程也无法达到上述考核强度,故我们需要改革考核大纲,朱子读书法正是其改革的指引。

作为长达五十年教龄的老教师,朱子对考核读书效果或者教学效果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朱子语类》载:

先生问:“看甚文字?”曰:“看《论语》。”“看得《论语》如何?”曰:“自看《论语》后,逼得做工夫紧,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养。”曰:“自见住不得时,便是。某怕人说‘我要做这个事’,见饭便吃,见路便行,只管说‘我要做这个事’,何益?”文蔚又言:“近来觉有一进处:畏不义,见不义事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识得义与不义。若不曾赌当得是,颠前错后,依旧是胡做。”又曰:“须看《大学》,圣贤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着意看。若稍自着意,便自见得,却不是自家无此理,他凿空撰来。”^[6]

这段内容是关于朱子教育陈文蔚的对话过程,其要有二:一是考核陈文蔚最近一段时间读书的效果;二是

开列陈文蔚下阶段必读书目。在对话的过程中,朱子层层提问,先问读什么书,再问收获及具体实践。在获悉学生情况之后,朱子再层层引导学生要从自己收获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即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掌握学习方向与学习的方法。综观朱子考核陈文蔚读书效果之时,并没有各种试卷或者考试,而是仅立足于一点,即学生切身体会与效果。《朱子语类》载:

学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寻究得这个道理,自然头头有个着落,贯通浹洽,各有条理。如或不然,则处处窒碍。学者常谈,多说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说广充,说体验,说涵养,皆是拣好底言语做个说话,必有实得力处方可。所谓要于本领上理会者,盖缘如此。^[5]

学生不在于学了多少,而在于掌握关键内容。这个关键内容就是结合自身情况,收获真实体验和心得体会,并落实到自身实践当中。

由此可知,在考核学生学习效果之时,不当重在考查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尤其是作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语文》,而要着重于考查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与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因为学生一旦认识《大学语文》的作用,就会主动去查找相应资料,而具备基本运用能力之后,自然能够解决各自的问题。故《大学语文》的考核大纲应该调整为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一是重在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应用。关于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我们认为重在于考查《武夷文学读本》的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运用,能够自主分析与研究《武夷文学读本》的各篇目内容,形成各自读后感或分析报告,完成课程的学习过程。《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程,其教授对象是除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外的全校学生,这意味着学生包括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艺术生,故其课程考察的重点在于指导学生运用《大学语文》所学知识服务于各自专业课程学习。故以读后感或者分析报告形式,剖析《大学语文》各篇内容的特点与内涵,掌握《武夷文学读本》基本内容,完成自主学习的过程。

二是考核大纲重在考察学生基本阅读习惯培养

情况。《大学语文》以培养大学生基本人文素养作为目标,这需要从培养阅读习惯作为起始目标,而其培养过程并不需要指定一本专著或者其他图书,而是以容纳武夷地区文学的《武夷文学读本》作为教材,完全可以满足学生培养阅读习惯的需要,正如教学大纲所设定的要求,将《武夷文学的早期形态》《武夷文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武夷文学》《现代武夷文学》作为阅读作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或者专业特点,选择一篇或者部分文章作为阅读对象,撰写一篇分析文章或者赏析文章,初步形成阅读习惯。

三是期末考核重在考察学生通过基本阅读习惯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及其基本运用,避免学生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形,故期末考试应该以开卷考的形式,重在突出学生的基本训练过程,检查学生平时训练的结果。

三、朱子读书法:《大学语文》教学设计的参考指标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事项,朱子概括说:“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6]由此可知,从格物至平天下正是中国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被概括为“内圣外王”,正如余英时所说:“如果以《大学》的八条目为北宋儒学分期的根据,则我们不妨说:第一阶段的儒学是经学,其重心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阶段的儒学则转入道学或理学,其重心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7]但是两者仍属于儒学大传统,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即“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而大盛,它所发展的则是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它赋予儒学以新貌,但并不是其全貌。就儒学本身言,理学‘鞭辟向里’,代表了一种内向的发展。但理学之所以在第三阶段获得许多人的信奉,则因为它提供了下面这个有说服力的承诺: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因此它虽似内转,却仍与北宋以后儒学的大方向保持一致”^[7]。大方向的一致性意

味着不管内在知识如何丰富,都始终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方能够验证具体成色如何!故朱子对古代士大夫参加科举考试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载:

临别请教,以为服膺之计。曰:“老兄已自历练,但目下且须省闲事,就简约上做工夫。若举业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尝知义论》,其说亦自好,但终是转量,非实见得。如今人说人文字辞太多,不是辞多,自缘意少。若据某所见,‘义内’即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便自见得义在内。若彻头彻尾一篇说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岂特一篇时文而已。”^[9]

朱子对余大雅拜别之时的赠语,强调余大雅应该少做无用之事,专注于简约方面,但是朱子又将举业作为分内事,支持余大雅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其高明之处在于将科举考试和儒家修身的圣人教育相结合。朱子将士大夫追求功名与圣人之道相结合,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文化基础与人才基础。

如果说由科举入仕为官,正是实现外王的重要途径,尚属儒家外王之事,那么从事商业活动,则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朱子却赞成从事商业活动。《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载:

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因指其门闾云:“但此等事如在门限里,一动着脚便在此门限外矣。缘先以利存心,做时虽本为衣食不足,后见利入稍优,便多方求余,遂生万般计较,做出碍理事来。须思量止为衣食,为仰事俯育耳。此计稍足,便须收敛,莫令出元所虑,则粗可救过。”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义之和也。’顺利此道,以安此身,则德亦从而进矣。”曰:“孔子遭许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进,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后德进者,君子之常。孔子遭变,权之以宜,宁身不安,德则须进。”曰:“然。”刘仲升云:“横渠说:‘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曰:“他说自分明。”^[9]

学者以从事商业经营作为谋生手段是否影响圣人之事询问朱子,朱子未简单否定从事商业经营,且举陆九渊为例,认为经营商业与圣人之道并无对立矛盾,但是朱子给商业活动划出一条红线,即以商业营生属天理之事,但因商业有利可图而生图利计较之心,则违背儒家之道。由此可知,朱子强调商业活动仅属途径,其性质则由主体的行为初衷与方式、目标来判定。事实上,朱子亦有经营印书业的人生经历,甚至构成了朱子重要的经济来源,正如高令印《朱熹事迹考》说:“文字钱是朱熹经济收入中的来源之一。此项收入在朱熹经济开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所谓文字钱,是朱熹为人撰文酬劳金和刻书售书获利金”^[10]则朱子对商业活动持赞成态度无疑,只是朱子重在强调商业营生的手段,要有利于个人的道德修养。

因此,《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需要参照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的具体情境设计应用型的内容,指导学生职业训练,回应本科高校向应用转型的目标,具体当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开发《武夷文学读本》的应用功能,如应用性文体的撰写,强化语言表达能力与普通话的训练。

在追求内圣外王的过程中,需要应对日常生活的艰辛,故在教学过程中,《武夷文学读本》需要强化语言与文化的功能。大学生在学习或者未来工作中,肯定会遇到各类合同或者协议,需要将其作为《大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融入到《武夷文学读本》的教学过程。在语言方面,通过课堂的自我介绍的训练和课堂问题,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尤其是根据专业特点和技能,撰写一份合格的自我介绍文稿,突出面试的情境,为求职准备好语言表达能力。

二是传授中国人际交往技巧,解剖中国交际礼仪的文化内涵,让学生理解中国礼仪形成背景,将《武夷文学读本》改造为具备中国文化特色交际课程。

《大学语文》历来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作为目标,但是现有课程内容不能完全承担起所有任务,且人文素养过于抽象,故我们需要契合学生未来工作情境,尤其是团队合作情境,设计合理的课程内容,使《武夷文学读本》各篇作品的中国人情文化,尤其是中国人如何处事与如何以血缘为纽带建构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的礼仪内容,呈现于学生处理各类人际关系的基本

原则当中,提高学生职场应对技巧,更好适应中国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7 年本科优秀特色教材的通知[EB/OL]. (2017-12-25)[2018-04-10].<http://www.fjedu.gov.cn/html/xxgk/zywj/2017/12/25/11b509fd-ae34-4648-8801-823139af2588.html>.
- [2] 廖斌. 转型发展背景下《大学语文》教材的校本化改革[J]. 教育评论, 2015(10):153-156.
- [3] 廖斌. 序一[M]//廖斌,程荣,王冰云. 武夷文学读本.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2.
- [4] 廖斌,程荣,王冰云. 武夷文学读本[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 [5]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3428,3431-3432,3435,3607,276-278,3600-3601,3604-3605.
-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17.
- [7]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293-294,410-411.
- [8]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29-30.

(责任编辑:冯起国)

The Research on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Chu Hsi's Reading Strategy to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Chinese ——Taking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Zhiyang

(The Centre for Shushigaku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Wuyi Literature Chrestomathy* is an excellent school-based textbook. It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Chinese, but its teaching effect is not ideal because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such as too few class hours, too much content and too difficult to meet different professional needs in College Chinese. Chu Hsi's reading method can provide a plan for College Chinese's teaching reform, which is shown in three respects: First, it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forming the syllabus. Second, it can provide guidelines for the reform of assessment syllabus. Third,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standard for reformation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f the reformation of College Chinese can absorb the essence of Chu Hsi's reading method, *Wuyi Literature Chrestomathy* can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cellent school-based textbooks.

Key words: Chu Hsi's reading method; teaching syllabus; assessment syllabus; instructional design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总结和反思

——以武夷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教学与活动为例

宋大伟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新形势下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行,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武夷学院坚持文化育人理念,强调科研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形成具有武夷学院特色朱子文化教育体系,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教育教学传统和风格,武夷学院朱子文化教育研究与实践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朱子文化;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文化;武夷学院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100-04

《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相关文件要求,加强新形势下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发挥朱子文化在深耕厚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大学生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突出、使命重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体现在教育目标过于笼统,课程设置主题不突出,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兴趣不高,相关制度和评价机制不完善。

(一)教育目标过于笼统,不够清晰

传统文化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仅仅拘泥于德育教育、美德教育、知识教育、能力教育、素质教育等可能是不够的,大学传统文化教育中推行优秀经典思想教育,回归经典本意,回归经典自身,回归经典精粹。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不仅需要传授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古代智慧和古代技艺,更需要帮助丰富和完善学生的人格,增强学生的责任感、竞争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和心胸。^[1]古人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之说,当代大学生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养成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自信的建设实践中使其成为与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民族进行和平交流与沟通的媒介,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主义精神家园,才能达到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才能真正的走向大国复兴之路。

(二)课程设置泛而广,主题不够突出

目前,很多大学素质教育中开设了不少传统文化课程,如中国饮食文化、中医、《易经》、茶艺、剪纸、酒水与酒文化、围棋文化等课程。这些课程极大地丰富了课程体系,但是这些课程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在整个文化传播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与人文教育、素质教育、基础教育相衔接、相交融,还需要不断探

收稿日期:2018-03-07

基金项目: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骨干教师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JZ170231)。

作者简介:宋大伟(1981-),男,汉族,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

索、研究和实验。

(三)学生学习兴趣有待进一步激发和提高

目前高校开设的很多传统文化课程教育还停留在为开而开,授课方式也是课堂教学为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高校是否真正贯彻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原则,做到以文化人,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尚有待进一步发挥。一些学生为学分选课,走形式,混学分,学习潜力仍有开掘空间。^[2]

(四)学校相关制度和评估机制不完善

学校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的设置,大多属于选修课,个别与专业课授课时间冲突,也不容易引起学生的重视,影响选课积极性,很多学生选而不修,来而不学,走过程,走形式现象严重。

二、武夷学院朱子文化教育的几点经验

武夷山素有“道南理窟”“闽邦邹鲁”盛誉,是朱子理学的发祥地和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武夷学院自南平搬迁到武夷山,筹建武夷学院之初即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特别是武夷山独特的朱子文化,更是研究中重点。200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在武夷学院合作设立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由此,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研究朱子学和东方文化的重要基地。数十年来,武夷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方面,薪火相传,文化研究与教育成果时有涌现,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教育教学传统和风格。概括而言,即坚持文化育人理念,强调科研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加强科研教学团队建设,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发掘和弘扬朱子文化育人传统,逐渐形成具有武夷学院特色的朱子文化教育体系,在朱子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相结合

武夷学院较早认识到文化的教育价值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在宋明理学中心成立之后,先后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在全体学生中开设“朱子理学的传播”方向课程。同时注意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相结合,在编辑教材中注意以朱子文化为基础、朱子思想精华为主干,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合教师资源,建立教

学队伍。陆续出版《武夷文化选讲》《朱熹思想与公民道德建设》《〈朱子家训〉研究专辑》和《朱熹故事精选》等通俗读本。

通过课堂文化教育,加强学生的文化习得教育,培养其文化欣赏能力,提高道德人格,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成为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优秀人才。课后教师研究,提升朱子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吸引和引入年轻教师加入朱子文化研究队伍,薪火相传。

(二)课程结构完整与重点突出相结合

在学校五大板块的课程设置和五十多门文化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夷特色文化和经典读本相辅相成。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相结合,教学相长,既锻炼了年轻教师的教學能力,又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朱子文化的传播发展。

在姚进生、张品端、郑细鸣和廖斌等教授指导下,武夷学院教务处每年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公选课程,如“中国古代史专题”“中国饮食文化”“中医·科学和现代生活”“国学与人生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三国演义》专题”“《易经》导读”“明清小说选读”“世界遗产在中国”“武夷民俗”“茶艺”“福建历史文化”“旅游民俗文化”“剪纸”“酒水与酒文化”“围棋文化”“细说闽台茶”等系列课程,每学期面向武夷学院全校学生开设4-5门公选课,每门课包括24学时,通过选修课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校园氛围营造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武夷学院在朱子文化建设过程中,将朱子文化融入学校物质文化、宿舍文化和学生课外活动体系建设,深化朱子文化的普及,充分利用校园文化的育人特性,加强校园景观建设,在学校活动区域设立朱熹雕像、朱子家训墙、朱子理学传承图等寓教于乐,富有感召力和教育意义的人文景观。在教学楼和学生楼墙面布置朱子语录、朱子生平和朱子传说故事。宿舍区、教学区命名“瑞樟”“同文”“兴贤”“屏山”,在校园内留下朱子文化的印记,凸显“朱子故里,理学摇篮”。

第二课堂形式上,它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深化、拓展和延伸,它源于课堂,又脱离课堂教学。学校大力扶植传统文化社团、书法协会、

诗词楹联协会、清风棋社、茶文化研究社、传统弓箭协会、元一社相声曲艺协会、武夷风和朱子文化研究社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朱子文化符号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优秀传统文化进第二课堂,能有效地避免单调、枯燥的教育组织形式,从而让学生在多样和谐、有张有弛的德育形式中获取最佳的德育效果。学校整合校内“朱子文化节”“武夷文化节”“旅游文化节”等团学活动资源,进行体系化塑造,凸显出学院的朱子特色。重点开展敬师礼、朱子文化戏剧节和重走朱子之路等3项重大学生活动,引领学生的第二课堂。“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走‘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从2008年开展到现在,目前已经在闽北地区连续举办了9次,朱子之路对推动朱子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校内教育与校外推广相结合

在姚进生、张品端和廖斌教授的支持下,武夷学院师生积极参加各类朱子文化活动、学术活动,收益良多。承接南平市组织的“三礼”之一——敬师礼的拍摄;2016、2017年教师节期间在全校举办敬师礼活动,二千多人参加,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基础;参加纪念2016年11月朱子诞辰886年祭祀典礼,韩国朱子文化交流团、闽北朱子后裔和社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共同参加活动。与南平市台办共同举办“海峡论坛武夷山分论坛——朱子文化与现代文明”论坛;先后举办“纪念李侗诞辰920周年暨《延平答问》学术研讨会”“第四届闽台游酢文化研讨会”“海峡两岸太极文化论坛”“朱子闽学与亚洲文化”论坛。

三、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一)讲授方式与课堂组织规范化的同时,应鼓励多样化与灵活化

素质教育与专业课相结合,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传统和传承,如果可以通过现场走访,实物参观,亲身体验,参与制作,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会有更大的帮助。^[9]朱子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结合,课下和课后互动,传统佳节重点讲授,教师节敬师礼,使课程具有学术性、理论性、趣味性与思想性,紧紧围绕人文素质展开,深化教育内涵。

武夷学院在朱子文化教育过程中,通过重走朱子之路的走访朱子故里;通过朱子文化节和朱子敬师礼让学生主动参与体验朱子文化,体验传统文化的浩瀚,不断引导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扬朱子精神,积极探讨和了解朱子文化的精髓。灵活多变的传播方式,形式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得朱子文化在武夷学院落地发芽,蓬勃发展。

(二)培养目标明晰化的同时增进质的权重

文化素质教育切忌强制灌输,应让学生自己觉醒,自我意识,这有启蒙的意义。文化自信,不是通过课堂传授可以达到,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传授,引导学生体会到中华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发现型教学,达到文化自信,走向复兴之路。^[10]

武夷学院在开学典礼期间,教师节期间,在全校举行敬师礼,教师与学生参与礼的建设,重现古代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创制和完善相关礼仪,既重视礼仪的本(精神),也不忽略礼仪的末(仪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结合起来。

(三)理论与现实结合,过去和现代的对比如

将视频与教学相结合,将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将过去与现在的发展做对比,课堂设问,引发思考,诸如:中国五千年文明为什么昌盛不衰?中国为什么能够用不到百年完成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建设历程?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课堂上,可以围绕文化经典,可选典型篇段,通过经典诵读,让学生朗读分析,尝试讲评,结合切身体会,让学生自己谈感受。通过经典片段分析,让学生参与过程,切身体会,古代先贤的治学精神,爱国热忱。^[11]通过传统故事的宣读,让学生领会故事中古代先贤的治学和治国的博大胸怀。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校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4年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武夷学院以“涵养穷索,致知力行”做为校训,以

“传朱子理学,做武夷文章”做为办学目标,打造朱子文化品牌,在大学教育中推行优秀经典思想教育,推行朱子文化,提倡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奠定基础。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姚进生.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论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4.

- [2] 李群. 关于综合运用各类载体率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普及工作的建议[J].天津科技,2017(3):1-3.
- [3] 刘佳. 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6:12-13.
- [4] 姚进生.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9):103-108.
- [5] 陈建萍. 依托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J].教育艺术,2016(1):329-330.

(责任编辑:陈虹)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 Case Study of Zhu Zi culture Research, Teaching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n Wuyi University

SONG Da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t is imperativ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take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ut in reality,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and problems abou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not only insists cultural educating concept, emphasiz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but also unites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es the first classroom and second classroom. Therefore, it forms the system of Zhu Xi's cultural education with Wuyi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able and unique traditional educating style. The Zhu Xi's 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of Wuyi university provides a new path selec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Zhu Xi's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practice

福建省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 试点运行现状分析

李 林

(福建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 要:以福建省近三年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对比其运行情况,发现不同试点现代学徒制运行上尚存招生差异性大,现代学徒制概念理解不透、运行措施不到位、产教深度融合不足、机制尚待健全等问题,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几点建议。

关键词:福建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运行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8-0104-06

2014年8月25日教育部教职成出台《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2014]9号),2015年,教育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标志现代学徒制项目由点至面在全国以国家政策层面全面实施。2015年,为了进一步加强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福建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日发布《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闽政[2015]46号),提出要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2015年9月17日福建省教育厅积极响应,启动省级示范性现代学徒制建设项目,引领带动建立校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使现代学徒制成为我省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1]为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建立具有福建独特模式校企二元主导的现代学徒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2016年2月4日《福建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二元制”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的通知》,在全省遴选校企合作基础好的二元制专业试点。截至目前,已经遴选了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与两批二元制试点。

一、福建省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及二元制试点招生情况分析

2015年至2017年,福建省旅游类专业申报现代学徒制及二元制试点共17项。从表1数据可见,2015年至2017年,福建省旅游类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设置专业从少渐多,由单一专业转为多专业并报。参与院校逐年变多,公立学校9个试点,私立学校8个试点。2015年只有1个酒店管理专业,2016年拓展到旅游管理与导游专业3个专业。试点专业主要集中在酒店管理专业,共10个,占62.5%。旅游管理专业有5个,位列其次占比29.41%,导游专业1个占5.87%。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2017年成为唯一一个既有现代学徒制点又有二元制点学校。从每年招生人数看,2015年,只有漳州职业技术学院1个现代学徒制点招生29人;2016年,3个现代学徒制点共招141人,平均每个点47人;3个二元制点共招生46人,平均每个

收稿日期:2018-06-03

基金项目:福建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GA2017010)。

作者简介:李林(1961-),男,汉族,高级教师,主要从事教育评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表 1 福建省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及二元制试点班一览表

Tab . 1 List of tourism major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binary system pilot of Fuji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年份	院校名称	试点名称	招生人数	合作企业	院校属性
2015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29	1	公办
2016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导游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25	1	公办
	莆田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74	4	公办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42	1	民办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14	1	公办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13	1	民办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19	1	公办
2017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22	1	民办
	莆田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70	4	公办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64	1	公办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点	89	1	民办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14	3	公办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3	2	民办
	武夷山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12	3	民办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52	3	公办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23	2	民办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点	18	3	民办

点招生 15 人强。2017 年,招生专业点递增,4 个现代学徒制点共招 256 人,平均每个点达 56 人强;二元制点 6 个点共招 122 人,平均每个点招 20 人强,最低招生点泉州理工职业学院只有 3 人,最高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高达 52 人。三年来招生人数与试点数呈递增状态,从 2015 年只有 1 个试点 29 人,2016 年 6 个试点 187 人,上升到 2017 年 10 个试点 378 人。从合作企业数看,三年 17 个试点合作企业数由少变多,第一年至第三年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数除了莆田学院 4 个之外其余试点全部只有 1 家合作企业,2016 年二元制试点都只有 1 个合作企业,2017 年 6 个二元制试点合作企业至少都 2 个以上。这说明原有合作企业已经没法满足二元制招生需求,合作企业范畴逐年扩大。

二、福建省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与二元制试点差异性

以上三年招生数据表明,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人数远远大于二元制招生人数。那么,是什么导致此招生差异性?

2016 年福建省教育厅实施二元制试点,其本质是实施二元主导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是我省现代学徒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举措,其本意是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实施校企联合双主体育人机制。但是,2016 年开始实施的二元制与 2015 年起实施的现代学徒制点在招生对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其一,从招生角度,现代学徒制点招生对象为参加高考的高考生与中职生,学员一般高考招生入学后,在自愿报名基础上,与试点合作企业、校方签订三方协议,实施由学员到学徒,又由学徒到企业员工三角角色转换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而二元制学员是与企业已签订至少半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员工,在自愿基础上报名,由校企联合招生后签订三方协议,成为二元制班学员,入学后举行拜师仪式,实现既是学徒又是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

现代学徒制点学生入学后已交了学费,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既能让学生享受员工一样待遇,又能获得零距离企业技能服务学习的优先权,对于大部分经济一般的广大专业学生甚至贫困生吸引力大。“二元制”试点班生源来自企业员工,符合条件的员工人数囿于合作企业符合条件员工,远远低于高考录取生人数,有些企业员工既要上班,又要接受提升型专业学习任务安排,面对增加学习压力挑战,再次,有些合作企业没有为员工提供学费,对于原本在企业最基层工资待遇又不高的员工而言是笔多出来的开支,这无疑成为影响企业员工积极申报二元制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从实践教学角度,两者人才培养思路一样,但是实施方式不同。二元制班学员采用工学交替循环教学模式。每周实施不少于50%岗位工作任务后,安排若干时间进行理论学习。而现代学徒制学生采取的主要是三阶段或者四阶段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大部分实施第一学期到企业进行短期认知,第二学期到第五学期到企业跟岗实习若干周,最后一学期到企业顶岗实习的工学交替模式。

三、福建省高职旅游类现代学徒制实施主要形式

从三年试点实施情况看,17个试点采取集中型与分散型并举两种方式。

集中型组织主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且有一定规模

合作企业实施。从表1中近三年数据显示,现代学徒制8个试点除了莆田学院连续两年与4家旅游企业实施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外,其余有6个点实施集中型组织;二元制共有9个试点,其中2016年3个试点采用集中型组织形式,2017年6个试点全部采用分散型组织形式。如漳州职业技术学院2015-2016年现代学徒制与二元制两个试点都是酒店管理专业与漳州宾馆合作。集中组织实施的好处是人才培养方案可以统一修订,组织管理方便;分散型组织主要针对接纳学徒能力有限的中小或小微合作企业实施,从三年试点合作企业可以发现,有些试点不仅单位不同,甚至连地点和类型都有所不同。如2016年莆田学院与莆田三迪希尔顿逸林酒店有限公司、厦门国际航空港佰翔花园酒店、厦门扬邦国际旅行社、深圳远方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四家旅游企业实施旅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2]。有些试点地点相对集中,但是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或者没有在统一集团旗下,如2016年武夷山职业学院与武夷山悦华酒店、武夷山大红袍酒店、尚客优连锁酒店三家联合举办二元制试点,闽西职业技术学院与洲际酒店集团厦门区、龙岩皇冠假日酒店联手举办二元制试点^[2]。2017年厦门南洋职业技术学院与厦门希尔顿逸林酒店、厦门罗约海滨温泉酒店、厦门罗马假日酒店三家二元制试点^[3];有些学校虽然与多家企业合作,但是这些企业都属于同一家集团旗下。分散型试点因为单位分散,若又非同集团或者同类型旅游企业,其项目实施所面临分散教学管理挑战会比单一合作伙伴或者同一集团旗下合作伙伴分散性教学管理挑战更大。

四、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 各地政府资金与配套支持政策力度参差不齐,制约校企参与积极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关注通过现代学徒制解决劳动力问题,校方关注职业能力与素养并升,人才培养中校热企冷。究其原因,大部分地市政府没对二元制

企业实施拨款补贴,制约企业发动员工报名的积极性。其次,二元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招生,本来其收费就比正式录取高考生低得多,加之招生占学校总指标,不利于提高试点积极性。目前,只有 11 家高职院校参与到现代学徒制项目中,只占全省 52 家高职的 21.15%。

(二)“二元制”本质解读不同导致招生受限

二元制招生本质乃“招生即招工,招工即招生”。对象既可针对企业员工,也可是愿与企业签订合同的高、中职毕业生。16-17 年“二元制”招生环节,本省招生审核关注已经与企业签订合同半年以上员工,把很多愿意与企业签订合同的高、中职毕业生源挡在门外,只实现“招生即招工(变成‘招生只招工人’)",没法实现招生即招工。

(三)项目实施执行师资队伍理念有待开拓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地市政府重视的院校,项目实施进展顺利,在积极地探索接地气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在这方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尤为突出。该校 2015 年酒店管理专业与漳州宾馆联办“现代学徒制漳州宾馆班”,遴选招收在校生 27 人。目前,该班人才培养方案已完成 2 年培养计划,分四次到企业完成合计共 31 周的认知性见习和跟岗跟师学习。本学期进入人才培养实施最后一学期,该班学生全部在漳州宾馆进行酒店基层管理轮岗实训和酒店顶岗实习。2016 年与漳州宾馆开展省级“二元制”试点班,2017 年,二元制班合作伙伴拓展到旅投集团旗下漳州芴江酒店与漳州大酒店,成立“漳州旅投二元制班”。二元制班目前学生数 32 人,皆为与合作企业签订正式劳动用工合同的在职员工;2016 级按照第二年人才培养方案,本学期继续在漳州宾馆跟岗训练酒店服务核心技能,同时完成学校职业核心课程理论学习,校企双方共同实施人才培养。2017 级已快完成一年培养阶段。二元制试点已逐渐完善项目管理机制。截止目前,该校已经在多年校企合作中践行“双炼炉、三阶段、四导师制酒店管理专业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并在福建省 2017 年度二元制推进会中作为典型发言,在 2018 年获得福建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的佳绩^⑤。然而,部分重视度不足

的院校几乎形同虚设,没有规范的管理,校企之间只停留在用工实习阶段,更谈不上校企合作深融度。如同企业员工花钱买张文凭,在校生等企业用工旺季需要直接到企业顶岗,彼此之间的合作仅停留在满足企业用工,或者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而忽略了现代学徒制的核心点在于校企双主体育人,从人才培养模式制定,校企双师育人都需要校企联手协商安排。

五、福建省高职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运行几点建议

结合省内外比较成功的现代学徒制案例,笔者提出以下有效运行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政府主导的项目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校企联合协商的运行机制。由旅游、教育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搭建平台,加强现代学徒制政策宣传,促进产教深融。其次由财政拨补贴“二元制”学生一定学费,提升企业参与技术技能培养积极性,员工也会因此享受学费减免待遇提高报名积极性。再者,二元制招生单列不纳入招生总计划,提升学校试点积极性。最后,扩大二元制招生对象范畴,把愿意与企业签订合同的高、中职毕业生作为招生对象,实现真正“招工即招生,招生即招工”。

(二)校企高度重视,政策资金保障

校企高度重视“二元制”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提供政策、经费确保试点得以成功运行。从校企顶层设计出发,安排分管教学副校长、企业常务副总经理全程负责现代学徒制、“二元制”的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项目能够接地气实施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校方将省厅试点拨款专款专用并配套资金,企业可发放学徒奖学金、岗位实践发放津贴,确保“二元制”试点项目得以顺利运行。

(三)建立校企共商共建共管人才培养模式

1. 校企共定双主体育人合作协议

制定纲领性合作协议作为校企双方项目实施的依据与指导。校企双方能够通过协议明确双主体责任

与分工,共筹共宣招生、共制招生试卷、共定人才培养方案、共拟培训教材与考核评价机制,可以积极有效探索接地气“校企双主体”育人、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导师”教学的“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2. 建立健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管理机构

试点工作管理机构是深入推动现代学徒制试点成功实施的重要抓手。学校和企业领导共同担任试点机构负责人,其他人员由校企共同遴选确定,负责试点工作运行管理,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管理机构人员应该分工明确,职责到人。机构主要职责是确保项目运行科学决策,做好与教育部门与行业企业的沟通协调,保障现代学徒制项目健康持续推进。实行双“辅导员”制度,设立学校辅导员和企业辅导员,可以有效做好学徒在校企学习期间的日常管理。

3. 建设“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为推进旅游类“现代学徒制”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内涵建设,加强实践教学指导,提高校企合作育人成效,可成立旅游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教学指导委员会,聘请院校专业带头人及企业专家为其成员,依托专委会开展专业建设调研,积极推动项目师资教研能力提升。

4. 建立行业标准项目监督机制,助力项目运行提升

建立由企、行、校专家共同参与研究制定学生实习标准,探索建立实习标准动态更新新机制;成立督查工作小组,建立试点督查工作新机制;成立专家考评委员会,由行、企等第三方组成的专家考评机制。

5. 立足岗位需求,校企共编实训教材

根据旅游企业岗位实际与行业服务需求,科学提炼岗位核心技能,校企合作开发旅游类特色教材及实训任务指导书。将提升员工职业素养,获取教学与实践、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内容纳入教材等教学资源建设中,形成特色鲜明,接地气的校企合作教材与实训内容。

(四) 立足岗位,创新教学模式

1. 推行工学交替授课模式

根据企业岗位实际需求,着力改革,采用循环式

工学交替模式授课,学生每周集中完成1-2天的专业理论学习和3-4天的岗位技能学习。由校内专业教师完成专业理论教学工作,由企业有经验师傅手把手传授岗位技能。

2. 校企共建“二元”课程体系

对接旅游企业岗位需求,将每个岗位分解成若干个职业核心能力,形成旅游类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共同开发核心课程资源,制订课程标准,共同编写特色系列教材。“现代学徒制”班课程既有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专业课程、职业素养等理论课程,又有企业开设的专业技能课程。教学计划、专业课程教学标准。以真实工作地为教学主要场所,实施以实践为主线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促进知识学习、技能实训、工作实践融合,推动教、学、做统一,实现学徒全面发展。制定岗位实训考核标准,建立以团队型学习小组、项目式实习模式为主的实践课程教学体系。

(五) 加强现代学徒制校企师资培训

请进来送出去,加强校企双育人理念提升。项目实施质量好坏,关键在于实施者。请进现代学徒制项目专家进校讲学,送现代学徒制项目教师赴德国等现代学徒制典型国家或者省内外现代学徒制示范点交流学习,加强其理念培训,可有效提升项目质量。

现代学徒制项目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人才培养模式至今尚处探索实践阶段。其组织模式因地因校不同而呈现分散型、集中型等多种模式;因各地政府执行力度不同而产生不同实施效果,因校企合作深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管理成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加强校企双方协商共建意识,明确双方职责,在教学模式、教学资源、教学条件、投入资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因地制宜,互补互惠,才能实现校企生共赢的校企深融效果,真正为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服务。

参考文献:

- [1]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闽教职成[2015]41号)[EB/OL].(2015-

- 09-21) [2018-04-1].<http://www.fjedu.gov.cn/html/xxgk/zywj/2015/09/21/06436d90-f678-4d82-b98e-c1d278c059b8.html>.
- [2]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二元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的通知(闽教职成[2016]10号)[EB/OL].(2016-02-24)[2018-04-01].<http://www.fjedu.gov.cn/html/xxgk/zywj/2016/02/04/af5a271e-59fb-4db7-bbef-01774b3e95d4.html>.
- [3]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7年“二元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EB/OL].(2017-03-20) [2018-04-02].<http://www.fjedu.gov.cn/html/zfxxgk/xxgkml/zcwj/zdgkwj/2017/03/20/5b8b7f14-182f-41d1-a77b-19355efd3c21.html>.
- [4]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福建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通知 [EB/OL].(2017-07-01)[2018-04-02].<http://www.fjedu.gov.cn/>.
- [5]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2018年福建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拟获奖项目的公示 [EB/OL].(2018-04-04) [2018-05-04].<http://www.fjedu.gov.cn/>.

(责任编辑:苏娟娟)

An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Oper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for Tourism Major in Fujian Province

LI Lin

(Fujian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uzhou, Fujian 350003)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tourism major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chool in Fujian, such as different pilot enrollment,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lack of clear key solutions, lack of close and integrat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schoo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s some advice on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binary system with Fujia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uji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urism major; modern apprenticeship; analysis on operation status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No.8 Vol.37, Aug., 2018

- Chu Hsi' Studies of Yi and Poetics HUANG Xian(1)
- The Wuyi Tea in Zhuzhici YE Guosheng, CHENG Xi(5)
- The Influence of the Caste System on Indian Democracy HE Yaosen(9)
-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in Quanzhou ZHANG Yahong(15)
- The Consequences and Overcoming of the Bad Game Played in the Dismissal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s of Tax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U Yuting(21)
- Mechanism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Contextual Ambiguity LIU Tiantian(29)
-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s Related to Modal Verb “Must” LIAN Yanhua(33)
- The Multiple Writing of Guo Songfen's Novels TANG Mingkang(37)
- Identity and Family Education—On Gus Lee's *China Boy* and *Honor and Duty* WANG Qian(44)
- Goto Shinpei and the Japanese Women's Group in Taiw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 NI Xia(50)
- Research on the Jiang and Huang States CHEN Yalin(56)
-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Shared Economy and Tourism TIAN Ying(60)
- On the Body Language and Plurali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tercolor Painting LI Zhenchao(66)
-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Taiwan under Paradigm View
..... CHEN Wenhua(73)
- Imag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magery in Fujian Ancient Villages QI Peng(78)
- Analysis of the Path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eacher Career Life
Cycle Theory LIN Lida, MA Liting(83)
- A Probe into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of Graded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Based on Corpus Construction
..... HUANG Jingwen (89)
- The Research on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Chu Hsi's Reading Strategy to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Chinese
——Taking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Zhiyang(94)
-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 Case Study of Zhu Zi culture Research, Teaching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n Wuyi University
..... SONG Dawei(100)
- An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Oper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for Tourism Major in Fujian Province
..... LI Lin(104)